

PHOENIX WEEKLY

鳳凰週刊

JAN 2016 | 第1期 | 總第566期

朝鮮手腕

牡丹峰樂團撤演內幕

地方政府的吉尼斯衝動 | 反腐風暴席卷金融界
重度采暖霧霾何日散去？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www.ifengweekly.com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亚马逊电子刊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世界遗产地理官方微博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0755-25934567/北京010-65281005/
香港00852-22008790 传真0755-25934579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酉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镛
钟大年 段敏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艺
主编 师永刚 周宇
副主编 崔世海 段文
总编室主任 魏恭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兼)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漆菲
主笔 叶润洋 段宇宏 袁凌
主任编辑 晓波 李光
编辑 徐伟 陈祥
首席记者 钟坚 张弛
主任记者 孙杨 曹鼎 吴如加
记者 谢彦辉 徐佳 王琰 李克难 马军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派记者 李想(华盛顿特区) 蔡源(墨尔本) 田晶(巴黎)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编辑部编辑 马茹均 莫文辉 韩丰泽 康亦玮 钟新星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李莉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法律顾问 王霖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编辑部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00852-22008790
社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00852-22008888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楼 邮编518001
电话86-755-25934567(订阅热线)/25934558/25580179/25934597
Email: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100005
电话86-10-65281005/65281006(订阅热线)/65211745(办事处)
Email:cui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501室 电话010-85112781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200042 电话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峨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楼(邮编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25934597 传真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摘编。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2016, 变革时代需要调适社会预期

□ 周兼明

我们祝福新年,是因为梦想与信念长存。梦想付诸行动,才会变得神圣;信念坚定不移,才能创造奇迹。新年的神奇就在于,这一刻人们似乎超越了流逝的时间,来到一个崭新的起点。这种时间的循环感,赋予每个人以新的激情与动力,我们可弥补和反省过去的痛楚与谬误,我们可彰显那被遮蔽的真理和光荣,我们可重塑自己和国家在未来的命运,我们可唤起每个人心底对世界的爱与信任。

过去的一年,深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了,在国企、金融、农村土地等领域都显示出中国政府破釜沉舟的改革决心,粤闽津三大自贸区已挂牌启动;反腐肃贪的步伐加快了,从郭伯雄到数十位省军级以上官员落马,反腐风暴席卷金融、高校等领域,越来越多的禁区被突破,治标又治本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核心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过去的一年也有不少灾难与隐忧,“8.12”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震惊世界,瞬间夺走了173条生命;数度来袭的股灾让千股跌停,一级市场投融资进入寒冬;以雾霾为主的环境危机仍在持续恶化;差距过大的贫富悬殊并无明显改观……诸多新老问题使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夹杂着一股不安与焦虑的情绪。

这确是剧变的年代。

中国面临的是一场与危机赛跑的变革。要想平稳过渡,就必须调适社会预期——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阶层,都要认清现实,主动或被动进行“调适”。这不是无的放矢的假说,而是一种“心态土壤”的培植。这对2016年尤为重要。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国民财富以几何级数扩

增,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多元、利益分化和贫富悬殊等事关权利、公平、公正的根本性问题,以及最大程度地消解了这些问题可能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冲突。然而,到2015年,在国际国内综合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或将从2016年起次第显现——而民众对此似乎并未形成共识,并未广泛做好应对准备。

新常态下,最可能出现的情况,不仅如前所述的诸多问题难再遮蔽和消解;新产生的问题还可能被加倍放大,例如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实际掌控力与民众的普遍认知之间的落差,可能引发诸多“坏事全赖政府”的抗议事件增多,以及各阶层或将面临的安全意识危机和就业压力困扰等——进而在许多预料不及的地方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的产生和烈度。

当下社会预期的复杂、高标准和不稳定性,尤其需要政府、媒体、知识分子、企业家群体警觉,未雨绸缪。一个社会的成长与进步,必然要借助中坚阶层的成熟与理性。

举例来说,民众对“大国崛起”的预期不宜太高、太不切实际。中国人口太多,底子太薄,历史欠账过重,发展极不平衡,环境承受力早已超过极限。这样的基本国情下,即使再过二三十年,中国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经验和综合国力,距离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还差得很远很远,远不足以影响或改变国际秩序。因此,对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坚持韬光养晦、务实苦干的基本国策和自我评估不能动摇,不能动不动就强调“亮剑”精神,给执政者制造虚幻的假象、增加压力或导致误判误动。历史上,左倾思维祸国殃民的事情屡见不鲜,需要一代代人时刻警惕。

对个人收入大幅增加、物质生活条件

的快速改善预期也不能过于迫切和高企。如“家家有房有车”,即便是发达国家也难以实现;而医疗、社保、教育等实现城乡资源共享的诸多问题,是一个需要花费巨额资金的系统工程,更不能有过高标准的期望值。包括对污染治理的预期,都不宜过高、过急,否则,极易使政府跟民众一起急功近利——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对其所造成的后果必须算好综合账,在还没算清、没有形成全民共识的情况下,急功近利的心理预期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和经济的效率,增加社会风险,还会长远地损害民众的行动力和创造力。

对反腐“唯恐官不高”的预期也要适度降温。反腐败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民众把反腐的预期瞄准“盯住大官”、瞄准“人”,仅仅满足“杀气”“解恨”的情绪,还容易被别有用心、政治势力利用,如文革中投入“斗批改运动”的狂热群众,对社会进步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一个强烈的社会预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人们对法治中国的期待增多了,这是非常难得的社会共识。法制的重要功能,就是在不确定中给人以确定感。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能充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安全感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底线,人们对未来的命运只有有了安全感,生活才会越稳定、越有秩序感。政府部门要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将四中全会依宪治国的精神加快脚步落实。

总之,经济换挡与社会转型期,合理地调适社会预期非常重要且迫切。积极、务实、合理合情的社会预期会带来乐观的心态,推动人们锐意进取;而消极的、过高过分的社会预期则会引发悲观、失望、失落的心态,降低人们在生活中的幸福感。对于意图突破的中国来说,不能不审慎对待。●



20 金正恩的“核逻辑”

COVER
STORY

朝鲜近年大搞外交攻势，除了中国，更向欧美、东南亚、中东乃至非洲方向用力，但在核问题的裹挟下收效甚微。传统的中朝关系在金正恩上台之后屡次遇冷，“牡丹峰乐团撤演”事件即是一例。

卷首语 Editorial

3 2016，变革时代需要调适社会预期

现在时讯 Trending

6【瞬间/封面/台港澳/中国观察/环境&科技/阅读/军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18 朝鲜手腕
20 金正恩的“核逻辑”
30 “平壤之春”来了么？
38 缺少色彩的朝鲜二线城市

时事 Current Events

46 中共反腐风暴席卷金融界
50 地方政府的吉尼斯冲动
54 重度采暖雾霾何日散去？



72▲ 大陆引进 苏-35歼击机内情

可以预料，苏-35主要被中国用来平衡邻国陆续服役的“4+”代水平的战机，并在某种程度上抗衡即将在周边扩散的美国F-35隐形战斗机。

56 一台空气净化器艰难进校之路

59 中国在吉布提追求什么？

62 被忽视的死亡杀手——结核病

观察 Observer

64 迈向治理型法治
66 《慈善法》：内地开门立法典范

国际 World

68 韩国“打虎”总统金泳三的成败人生

军情 Defense

72 大陆引进苏-35歼击机内情

财经线 Business

76 国企改革2015：谨慎前行
78 高层驱动 中国IPO注册制乘风而来
81 财经资讯

图谋天下 Galleries

84 苏联往事

历史档案 History

90 宋哲元集团夹缝求生记

94 微史记

文化 Arts & Culture

96 导演徐皓峰：用电影还原真实的武林

99 中日恶性互动的前车之鉴

三地书 Books

102 “世界秩序”的基辛格之道

资讯前线 Advertorial

17 让爱在团聚中升温

“多一克温暖”寒令营在京举行

45 印象绍兴

82 兴边富民 共赴小康

——红云红河集团兴边富民工程

对口帮扶工作纪实

P74

南京·再生长

——南京系列报道

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凤凰周刊》，将用15期的系列报道，揭秘后青奥时代的南京在城市空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改变，向读者展现一个生枝向上、充满活力、潜力无限的当代城市。

68▶

韩国“打虎”总统

金泳三的成败人生

无论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朴正熙维新政权，还是在血的教训中推进民主化改革的全斗焕政府，都是金泳三带领民众斗争的对象。



46

中共反腐风暴 席卷金融界

中共反腐风暴已刮向政商关系盘踞的中国金融界。金融反腐是习近平发起的中国反腐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股市暴跌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针对金融业进行整肃是中共高层的既有布局。

导演徐皓峰：

用电影还原真实的武林

徐皓峰曾闭门八年写作，前后出过十本书，都在武术、武德、武林和武行上用力，包括《大日坛城》《道士下山》《武士会》和电影《师父》的短篇原著，皆为故事好看，人物饱满，儒、释、道兼收。

96▲



中国在吉布提追求什么？

大陆海军需要有海外战略支撑点，以适应国家海外利益拓展与遂行反海盗、海外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需要。

59▲

广告目录

新媒体 / 第一跨页 周刊征订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 封底
《凤凰周刊·生活》 / 13

MOMENT

瞬间

英国 2015 / 12 / 18

英国最后一座深井煤矿Kellingley煤矿关闭，工人走出矿井。Kellingley煤矿的关闭，意味着过去300年作为英国工业命脉的煤炭产业彻底告别历史舞台，它被悲情地称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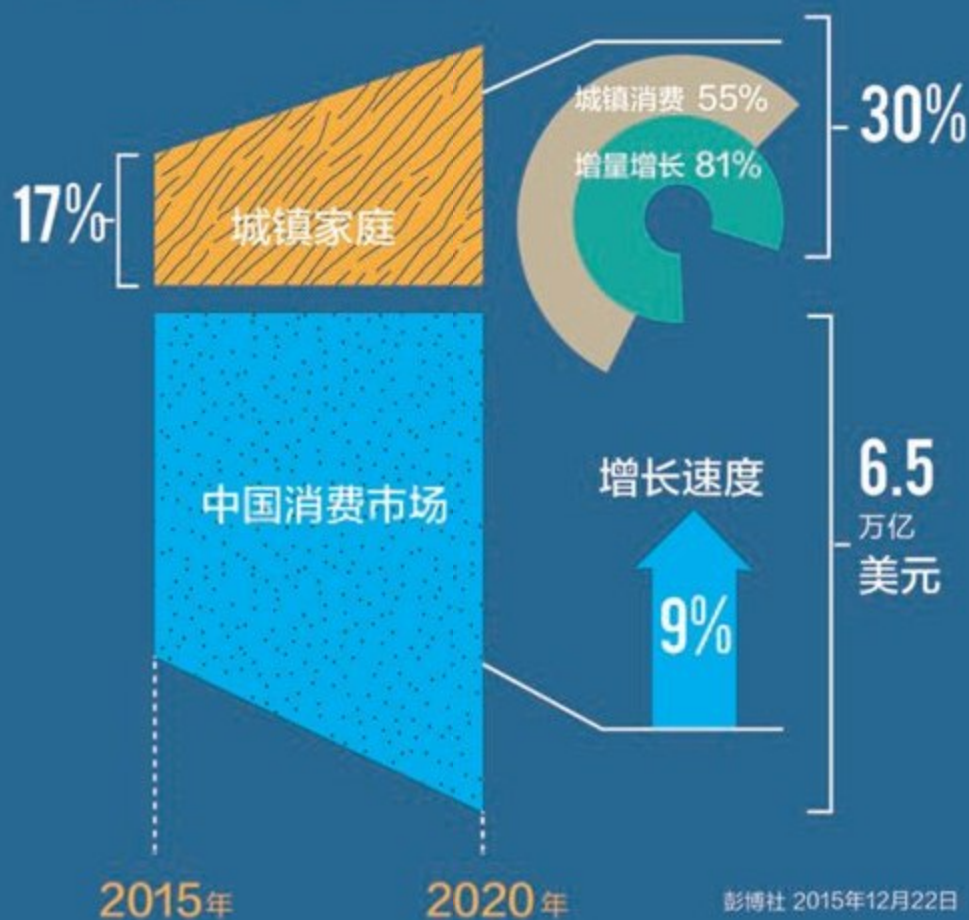




中国中上层及富裕家庭数量 2020年过亿

波士顿咨询公司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中上阶层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2.4万美元到4.6万美元之间，富裕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则超过4.6万美元。到2020年，这两类家庭的数量将合共超过1亿，并将占全部城镇家庭的30%，目前仅占17%。

报告还乐观预计，到2020年，中国中上阶层和富裕消费者将贡献中国55%的城镇消费和81%的增量增长。到时，中国消费市场将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达到6.5万亿美元的规模。



1

路透社

2015/12/19

2

法新社

2015/12/21

全球难民人数创新高

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被迫背井离乡的人超过6000万。现在世界上每122个人中就有1人是逃离家园的难民。2014年，这一数字为5950万。德国移民和难民事务局(BAMF)统计显示，其中约有100万难民进入德国。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数据则显示，2015年仅在地中海就有3695名难民丧生或是失踪。面对持续不断的难民潮，欧盟各国做出决定，将在六个月之内出台一份共同的边界和海岸保护协议。

中国减速将致全球煤炭消费增速放缓

国际能源署(IEA)最近公布了中期煤炭市场报告，预测今后五年煤炭的消费量增幅将大幅下滑。2014年煤炭消费量为55亿吨，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年的煤炭消费量为58亿吨，较上一年预期减少了5亿吨。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减速，煤炭用量大幅减少。据IEA统计，2014年中国煤炭消费量比上年减少2.9%，降至39亿吨，创下自1999年以来最大减幅。而由于美国推进页岩气，预计将来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煤炭消费量会大幅减少。

新德里：首都的惩罚

●《今日印度》/ 2015.12.28

→

近年来，几乎所有机构的调查都显示，印度首都新德里已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危险的雾霾在新德里，诸多人群中又属街边小贩受害尤甚——他们深受汽车尾气、建筑粉尘的危害；不远处还有一座火力发电厂。疾病和死亡正在逼近，儿童、老人以及有呼吸疾病的人们也成为受害者。

2012年，中央污染管理局支持的两项研究显示，新德里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和四分之一的儿童患有严重呼吸疾病，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毋庸置疑，新德里急需采取严厉措施治理污染。如今执政的人民党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获得了司法部支持。但一些关键问题仍然存在：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它为何变得如此具有威胁性？抗击污染的钟声已经敲响，但瞄准的目标对吗？

要了解新德里污染的主要问题，首先要了解新德里这个城市。新德里是一个内陆城市，像一个充满烟雾的大锅，且被有更多烟雾的周边城市包围，没有沿海城市那样的天然的换气口。过去20年新德里的人口增长迅速，如今人口已经增至2000万。新卫星城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首都区，由各种道路联系起来。

由于没有明确的居住和工作区域划分，新德里的公共交通体系很难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新德里的公共交通既不舒适也不方便，既无法省时又无法省力。于是人们更多选择私家车，如今新德里拥有880万辆汽车，且以每个月平均1400辆的速度增长。

新德里政府应该首先从政策层面解决，以一揽子的方案代替零散举措来处理城市污染问题。首先要赋予中央污染管理局执法权。其次，城市规划和公交规划要结合，建立协调联运的高效公交体系。最后，给使用公交的民众提供公交系统附近的廉价住房。对新德里来说，这个冬天预示着历史性的改变，正视面临的问题，无知的乐观主义时代过去了。



新德里政府应该首先从政策层面解决，以一揽子的方案代替零散举措来处理城市污染问题。首先要赋予中央污染管理局执法权。

→

马云收购《南华早报》引发香港热议

• 《金融时报》，节选 / 2015.12.28

→ 为什么中国科技业首富想要投资一家受业界敬重，但经营困难的报纸，并且这家报纸还位于一座经济和政治问题层出不穷的城市？马云旗下的中国电商集团阿里巴巴同意收购有112年历史的《南华早报》（下称南早）之后，香港各界对此类问题议论纷纷。

阿里巴巴收购南早的价格是2.66亿美元，略高于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2013年收购《华盛顿邮报》的价格。与香港本身一样，这家曾在默多克旗下的英文报纸长期被视为理解复杂中国的门户。虽然《南早》曾是全球最赚钱的报纸之一，但在报业广告收入下降和发行量缩减的双重问题打击下，这家报纸如今经营状况不佳。现在《南早》日发行量大约10

万份，2015年上半年营收同比下降8%。

鉴于阿里巴巴资金实力雄厚、精通互联网，同时马云与中国官方关系密切，《南早》被阿里巴巴收购可能促成各方面的改变。如今此事关乎的是马云的声誉、香港这个半自治地区出版自由的未来以及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威望的抱负。香港的记者和编辑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此前已有一些记者和编辑遇袭。

将来可能会有更多同类情况出现：马云的得力助手蔡崇信呼吁《南早》从更正面的角度展示中国。尽管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蔡崇信誓言要维护《南早》的采编独立和“客观、平衡、公平”的报道原则，但他批评西方记者说：“（他们）可能都不认同中国的管治体



系，这影响了他们报道的取向。”

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问题专家班志远表示，蔡崇信此番话可能是为了打消北京方面的忧虑，即这样一位商人收购《南早》可能会削弱政府对媒体的控制。

阿里巴巴列出了它眼中收购《南早》的商业逻辑。它表示将彻底推倒《南早》的付费墙，以吸引全球读者，从而让人们更了解中

国，并最终促进阿里巴巴核心业务的发展。蔡崇信宣称：“我们觉得，如果人们更了解中国，他们就会更了解我们的公司。”他还说，媒体“对阿里不好的地方的关注太多了”——人们曾批评阿里巴巴允许假货在其平台上销售。当然，如果马云打算尝试让《南早》更加劲爆，他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商业挑战。（本·布兰德）

从天母没落到千万观光客来台

• 台湾《联合报》，节选 / 2015.12.23

→ 在台北市天母地区开业十九年的诚品书店，最近吹了熄灯号，引起当地居民一阵感慨。早年因国际人士聚集而享有时髦、繁华盛名的天母商圈，近年因外商、富人外移而变得没落；诚品分店的歇业，则是又一记心理重击。

事实上，区域的兴衰常随着时空环境异动而变迁，新的商圈兴起会导致旧的商圈没落，包括房价过高、人口外移、交通不便，都是影响天母商圈荣枯的因素。但相对而言，没落社区透过形象重塑、创意设计或不同经营开发理念的引进，也能带动区域

的再生和转型，北部山城九份即是一例。

天母没落的关键点是2007年。当时陈水扁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两岸政策，让台湾作为外资经略大陆及东亚的营运中心计划难以实现。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作为“世界工厂”的形势崛起，在台美侨和欧侨商会几度向政府建言不成后，定居天母的外侨、台商、企业经理人遂大量出走，写下天母光环褪色的转捩点。从这个观点看，天母的兴衰，确与台湾整体经济的变化有着约略相同的轨迹。

若进一步观察，大潮流之中

也有例外，2015年观光客来台突破千万人次，即是一个值得咀嚼的例子。一千万人次的观光较扁政府时代的三百多万人次，多出近两倍，这是以台湾的观光资源和条件难以想象的事。如此大幅成长主要得益于两岸关系的改善，使得来台陆客急速增加，而岛内观光旅游资源的开拓，又进而吸引邻近国家旅客前来。

天母的没落，是由于外商和台资因大陆的磁吸效应而“出走”；但来台观光客突破千万，却是境外旅客因台湾的文化、观光魅力而“走进来”。这一出一进之间，不仅是台湾对经济环境变动的调整和适应，也是我们发掘及测试自身潜在能力的过程。尽管有民众抱怨，外来观光客过多，某些程度影响到台湾居民岛内旅游

的乐趣；但这些变动原本就是一个社会必须随时面对并设法解决的问题。

不可讳言，台湾近20年来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拉扯，已经严重扭曲了岛内的经济发展。更有甚者，由于“四小龙”时代的辉煌记忆过于强大，使人们迟迟不愿正视台湾经济日渐失去光芒的现实，更拒绝承认中国大陆的崛起。如此一直蹉跎下来，直到我们发觉强弱形势互易，已时不我与。天母的没落，不是一日造成的；台湾经济的式微，舆论界十几年来一再提醒，但主政者的调整步伐何其缓慢。在这种情况下，观光能创下千万人次的纪录，当然是值得庆幸的突破；遗憾的是，有些人连这点进展也视若无睹，甚至必欲阻止。



如何应对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联合早报》/ 2015.12.22

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一直在影响和主导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这种定义权也一直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内部秩序。西方是近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地，从原理上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在实践层面则相反，西方的主权国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同化”其他建立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上的“主权国家”。

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在这些方面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国际秩序的定义权是美国外交力量的核心部分。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

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

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主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面

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目前来看，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具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区域责任来谋求区域共同发展等。不过，中国必须向外界（美国）表明，这种所构建的新区域秩序，并不是要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补充。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

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

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

（郑永年）

一线地价狂飙 小城库存高企

• 《南华早报》/2015.12.22

→ 少数一线城市的地价疯狂飙涨，大量小城市的库存居高难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两极化正让这个世界上最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加。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房地产投资占了全国总额的11%，但其楼市的疯狂远不足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复苏，反而增添担忧。

大和资本市场的地产分析师Jonas Kan说：“一线城市的项目整体上保障了需求以及平均售价上升的空间，但对于开发商来说，并非所有一线城市项目都利润丰厚，而且一线城市项目对管理水

平要求更高。”

官方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中国地价的增幅远超房价的上涨。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包括进取的豪宅发展商融创中国，都曾表示过担忧。然而，全国平均数字掩盖住了一个更令人担心的事实，那就是部分小城市的土地市场，包括江苏无锡，都已经凝滞了。开发商为供应过度所累，没有补充库存的动力。即便他们想这样做，银行也不会批出贷款。Jonas Kan说，2015年11月末三线城市消耗库存平均需要19.6个月，同期二线城市需要11.2个月，一线城市需要

8.9个月。

一线城市地价火箭式上升，而小城市则库存沉重，这压缩着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净利润空间。据上市开发商的中期报，这个空间已被压缩至不足10%，为历史新低。

惠誉银行业分析师Grace Wu指出，中国的银行面临的重大威胁是房市下行，因为这些银行都非常依赖地产物业作为抵押品。Grace Wu估计，以物业抵押借出的贷款，包括住宅按揭和公司以物业抵押贷款，占了中国整体贷款的40%，如果将未获得正式银行批出贷款的借款人所作的非贷款融资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个比例甚至可高达60%。

银行高度暴露于楼市风险

中，这意味着一旦地价开始下跌，并拉低楼价，银行那些加快累积的坏债，将会快速飙升。这也会让那些以物业作抵押贷款的人陷入困境。土地出让金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一份国家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金偿还了37%的欠债。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物业贷款余额占整体21.9%。过去四年这个比例一路攀升，虽然主要银行一直在讲要减少楼市对其业务构成的风险。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科说：“这意味着一直通过非银行渠道——包括P2P平台进行投资的私人投资者，正在离场。但银行必须批出更多贷款，因为政府不希望楼市崩溃。”

内地“大妈”做投资像在市场买菜

• 《华盛顿邮报》/2015.12.20

→ 手里攥着大把可用于投资的闲钱，中国“大妈”们近年来屡登头条新闻，例如2013年一窝蜂地跑去疯狂购买金子，生生让全球金价从疯狂出清转入了稳定。

这一众金融知识有限的中国妇女一直是那些将目光瞄准前途一片大好的银发市场的理财经理和房产中介眼中的香饽饽。

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9%，而现在这一比例是15%。大妈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股票交易所、银行和房产中介，她们做起投资决定来就好像在商场挑衣服、菜市场买菜一样。

58岁的江西赣州退休妇女于丽萍（音）说：“虽然我不了解具体业务，但我手里有好多企业的股票。我的投资方向都是我朋友推荐的，而且我觉得应该随大流，

既然有很多人买这个东西，那它就是应该买的。”

于说，她所有的朋友亲戚，凡是这个岁数的，都投资；只有那些岁数特别大的才会把钱存在银行里。2014年8月，于跟着朋友买了湖南一家竹纤维企业的股票，现在正眼巴巴地静待该公司在澳大利亚上市。别看于说到这15万元投资的时候特别起劲，她也讲起了2015年初拿出10万元投给在民

间集资开办网络商城的深圳安子集团的一段伤心事。

2015年7月，《南方都市报》爆出安子集团非法集资，其创始人被警方刑拘调查的消息。于至今都没收回她的投资。于还说，2014年股市行情看涨的时候，她入了38万，如今缩水到只剩8万了。这位大妈把她的投资失败归咎为新技术新理念，例如人人贷（P2P）理财、信托和众筹等。“我

网络使得不太溜。”

即便如此，于和她的伙伴们还在考虑要不要入金融公司的VIP。那些个理财经理在和她们保持良好关系上可谓不遗余力。据曾在上海黄浦区招行分行当过理财经理的伊万李介绍，他的400个客户中至少有一半是大妈，她们购入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额度达到50万元。针对这一客户群体时，销售员工的“销售技巧”比专业知识要来得重要。

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的最新全球理财知识调查显示，在手持信用卡的中国成人中，63%的人都是理财文盲。该调查通过对一些理财概念——如风险分散、通货膨胀以及复利等的理解情况来衡量一个人的理财知识水平。调查显示，全亚洲超过70%的人都不能充分理解这些关键的金融概念，超出了全球66%的比率。



中国打假为何这么难？

●德国《世界报》网站 / 2015.12.20

→ 亚历克斯·泰尔在中国寻找造假者。几年前，他在一个偶然机会中了解到为什么很难抓到造假者的原因。他无意间收到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而且是从一个刚刚发现的汽车配件造假者手中。但这来得太晚了：这笔钱原本应当用来避免被抓到。

如今泰尔知道，这种贿赂并非例外，在中国一直存在腐败问题。人们一般知道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其他大牌产品的仿冒品，但假冒问题几乎涉及所有行业，有

些情况下未经检查的仿造品也很容易成为安全隐患——尤其在机械制造或是药物行业。

迄今为止，中国打击盗版的战略几乎没什么作用，因为这些行动针对的大多是小工厂，幕后的网络几乎未受影响。在打假专家泰尔看来，这个问题能蔓延这么严重，西方企业也有责任。很多企业把产品造假视为在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从事经济活动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企业甚至会付钱给误以为是调查人员但本身参与非法业务的人，或

是通过贿赂维持该体系的运转。

距离上海约450公里的温州，一条浑浊的河边，电子配件店铺一眼望不到头。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铜线，任何东西在此都能找到。好多商贩则毫不遮掩地同时拿出真假商品展示。作为特殊服务，客户还可获得一个帮助报关的人的电话。一家店主称，没有贴牌的安全开关，但可以贴上ABB的标并出口。

随着近年来检查加强，假冒商品网络采取了应对措施并针对大环境进行了调整——比如将非法生产转移到改头换面的小企业。加上这个行业碎片化程度本来就很高，于是所有参与者的风险就降低了。而想对这个体系采

取司法行动也变得极其困难。

泰尔最初为知名安保评估公司平克顿工作，后来成为通用汽车的检验员。在中国工作期间，他见过造假者、官员和调查人员同时出现在某次盛宴上。在中国阻挠造假者也十分危险。有次泰尔委托某个人揭露一个仿冒和销售通用汽车品牌火花塞的网络，结果这个人遭到绑架，被打致重伤扔在街头。

2008年泰尔离开通用汽车，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进行一种新式打击产品剽窃的活动。在中国大多数企业会把这一任务交给私人调查者，根据被没收产品数量支付报酬。泰尔说，这一体系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因为几乎没有监管而存在很大的欺诈行为。

津巴布韦将鼓励使用人民币

●《金融时报》，节选 / 2015.12.23

→ 津巴布韦将鼓励使用人民币来支付从食品到旅游纪念品的各种商品。穆加贝总统的政府日益求助于中国提振疲弱的津巴布韦经济。在宣布中国已同意取消2015年到期的4000万美元债务后，津巴布韦财政部长帕特里克·奇纳马萨表示，他希望增加人民币的使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

长期掌权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近年来越来越寄望于北京方面帮助支撑该国经济。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西方国家自本世纪初以来基本上对穆加贝抱有敌意，因为他的政权强制没收白人拥有的农场，并侵犯政治反对派的人权。

人民币在2014年初加入津巴布韦法定货币的名单，但迄今使用不多。该国估计有85%以上的交易用美元进行，而邻国南非的

货币兰特也被广泛使用。

哈拉雷方面在2009年放弃了本币津巴布韦元。在那之前的恶性通胀时期，随着通胀飙升至创纪录水平，就连央行发行的100万亿津巴布韦元面值的纸币也很快失去价值。分析师们表

示，试图增加使用人民币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姿态。奇纳马萨列举了中国游客能够在该国使用人民币的例子。

“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设施，”奇纳马萨对国有报纸《星期日邮报》表示。“在收集这些货币后，我们和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做的是拥有一个清算体系，使我们能够接受用人民币支付津巴布韦的服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对津巴布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91岁的穆加贝称：“我们十分赞赏中国展示的理解和灵活性。”在那次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双方达成了价值40亿美元的交易，涵盖众多领域。但有人表示担心，中国的资金将增加津巴布韦沉重的债务负担，其中许多项目已经被讨论多年。

津巴布韦官员经常声称，中国是津巴布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最新的外贸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份额落后于南非、新加坡和莫桑比克。“购买津巴布韦”首席经济学家Kipson Gundani表示，他不认为人民币即将获得广泛使用，奇纳马萨所宣布决定的效果将“接近于零”。

哈拉雷方面试图增加人民币使用之际，津巴布韦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在哈拉雷方面允许美元被用作主要货币后，津巴布韦经济最初有所反弹，但自那以来已经下滑，面临重新陷入衰退的风险。



2015世界最有影响力声音 汉语圈影响力大

●《赫芬顿邮报》网站，节选 / 2015.12.17

→ 《世界邮报》和苏黎世戈特利布·杜特魏勒研究所日前公布了2015年全球思想领袖榜，这是一项“集体智能”分析结果，通过分析绘制出互联网上全球话语图，并评出最有影响力的声音。

这个排行榜2015年除了评估在全球居主导地位的英语数字信息圈外，还首次评估了西班牙语和汉语圈以及德语圈。几个榜单加在一起，一共对将近400人进行了排名，这些人都是在网上被提及，讨论最频繁的人；从全球榜单来看，既有教皇方济各（排在第1位），又有土耳其小说家奥尔

汉·帕穆克（第4位）、爱德华·斯诺登（第5位），还有大提琴家马友友（第9位）。其他值得注意的、具有重要话语地位的人还有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第78位）、中国小说家莫言（第83位）、古巴博主约安妮·桑切斯（第99位）以及印度小说家切坦·巴加特（第136位）。

中国的“境外”榜与全球榜有一定相似度，因为香港和台湾的居民几乎完全使用维基百科、推特和谷歌。不过，在中国“境内”榜上——百度指数对话语地位的评估是最准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里巴巴的马云

排在前面，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排在第8位，共产党理论家王沪宁排在第10位。

全球话语图值得关注，它所构成的思想版图同样值得关注。就思想传播平台而言，YouTube是全球巨无霸。相较于封闭、局限为“朋友”圈的脸书网站，推特对思想的传播广泛得多。

在德语圈与西班牙语圈中，排行榜前面被常见的国际声音所主导，与英语的全球排行榜存在重合，知名度一般没有超越所属语言圈的人则集中出现在这两个排行榜的后半部分。反映出思想在互联网上大致处于自由流动状

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语圈很少使用推特，显然是隐私偏好起作用。

汉语圈的分析呈现出“一种语言、两个信息圈”的局面。由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组成的汉语“境外”圈排行榜显示出与其他语圈类似的影响力模式，那就是前面存在一个“国际层”。不过在中国“境内”，使用百度指数得出的排行明显不同——在通过百度搜索访问的逾7.4亿网页中，非汉语声音寥寥无几。邓小平前翻译、该项目的参与者张维为说：“鉴于中国互联网人口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的体量和规模，互联网上的汉语圈已经自成一家。在很多方面与互联网上的英语圈平分秋色。中国的阿里巴巴已经比亿贝和亚马逊加起来还要大。”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人类新历史! SpaceX火箭发射回收成功

● 综合外媒报道 / 2015.12.22

→ 美国东部时间2015年12月21日20时29分, SpaceX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发射并回收Falcon 9火箭, 并在升空后10分钟成功完成第一级火箭回收任务。这是人类第一个可实现一级火箭垂直回收的轨道飞行器。此前, SpaceX的火箭发射暂停了6个月时间。

此次发射是SpaceX2015年6月以来首次执行发射任务, 该公司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当时在飞往国际空间站的途中发生爆炸。此次返航回收任务创造了历史——之前没有任何一枚火箭像“猎鹰9号”一样进入深层太空后垂直返航着陆。

不过, 这并非首次有火箭实现垂直着陆。2015年11月, 杰夫·贝佐斯的民营航天公司Blue Origin宣布完成了类似的任务。不过, 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比Blue Origin的New Shepard更加复杂: 它的任务是进入更远的宇宙空间, 速度也更快。

此外, 马斯克的SpaceX不



仅成功回收了一级火箭, 还完成了将11颗人造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任务。“猎鹰9号”火箭可以进入124英里(约合200千米)的高空, 它拥有9个引擎, 可以产生150万磅(折合6670千牛顿)的推力。其设计具备可送多颗卫星进入轨道的能力。而Blue Origin仅能进入100千米的高空, 不具备卫星发射能力。

SpaceX火箭成功发射并回收意义何在? 第一, 这是人类第一个可实现一级火箭垂直回收的轨道飞行器, 极大地降低火箭发射成本; 其次, 过去SpaceX每次发射费用为6000万美元, 实现火箭回收技术后, 发射价格有望降低至每次600万美元。

在此之前, 所有进入轨道空间的火箭发射后都会毁灭或丢失,

因此每次航天任务都需要使用新的火箭, 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如果SpaceX能够定期重复使用火箭, 便可为后续任务大幅降低成本。

SpaceX曾在2015年1月和4月尝试过两次类似的着陆任务, 但均以失败告终。所以, 此次成功着陆可能源自两次失败后作出的一些调整。最明显的调整就是将着陆地点从海面的漂浮平台改到陆地。此外, SpaceX还推出了升级版“猎鹰9号”火箭, 将其非正式名称命名为“猎鹰9号”1.1版全推力火箭。这个版本的火箭对结构进行了改造, 还升级了发动机, 可提供更大的推进力。

如果SpaceX能够定期回收火箭, 就有可能迫使整个民营航天行业展开变革。该公司CEO马斯克指出, “猎鹰9号”火箭的制造成本为1600万美元, 但燃油成本仅为20万美元。而减少1600万美元的费用可以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因此, SpaceX的竞争对手必须开发类似的火箭才能与之争夺未来的合同。

地球“内内核”形成比预想早30亿年

● 美国《科学新闻》网站 / 2015.12.18

→ 地球的最深处可能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老数十亿年。最新地球形成模拟实验表明, 地球内核的最深处在地球成形后不久便固化, 而不是约30亿年后与内核其他部分同时固化。

东京工业大学地球物理学家乔治·赫尔夫里奇说, 尽管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相信这一新说法, 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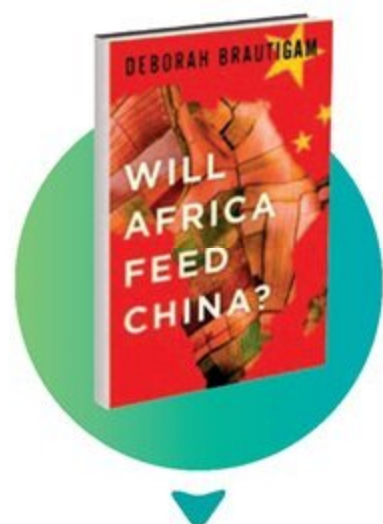
该说法能让人深入了解地球和火星等其他岩石行星的早期状况。2015年12月17日, 赫尔夫里奇在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的秋季会议上公布了研究结果。他说: “事实上, 这个早期内核可能是整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固态物体之一。”

地球内部分为数层: 富含铁的固态内核、由熔化的铁构成的外核、粘稠的地幔和坚硬的地壳。地

震波在地球内部的传播方式让科学家得以管窥地球的构造。

2002年科学家发现, 直径2440公里的内核也分层。内核中铁的走向取决于铁固化时的环境。科学家可以通过观察地震波在不同角度的传播速度来测量铁的走向: 地震波与铁的走向一致时传播速度较快。地震波告诉人们, 内核中心部分(一个直径约1200公里的区域)铁的走向不同于内核其他部分。内核出现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成为地球物理学界的未解之谜。

赫尔夫里奇和东京工业大学另一位地球物理学家拉蒙·布拉瑟进行模拟实验的初衷并不是要解开这个谜团。他们原本想要研究地球早期的表面是如何形成的。起初, 地球是一个由熔化的岩石构成、不断增大的球状体。该研究小组模拟了约45亿年前巨型岩石撞击早期地球, 从而使地球质量增加的过程。这些岩石提供的材料后来成为“内内核”: 这些撞击的岩石带来的金属落入地球内部, 下落过程中释放的能量转化为热量。



非洲养活中国？

• “中外对话”网站 / 2015.11.28

→ 美国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是研究中国在非洲活动的顶级专家，她的最新著作以学者式的严谨，探讨了关于“圈地”及未来非洲农业发展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对于所有那些关注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人来说，这本书都非常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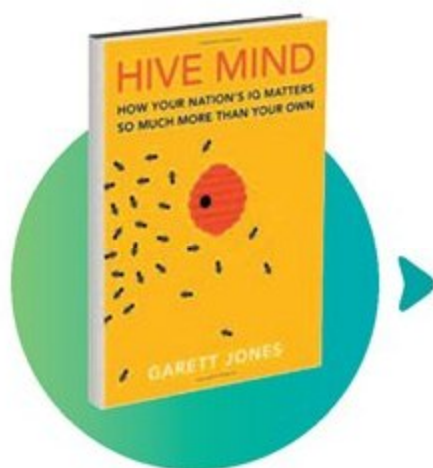
布罗蒂加姆的这本书不止是“终结流言”，还对中国投资者所经历的种种艰辛进行了描述，更广泛地体现了中非关系。首先，这本书纠正了媒体、NGO报告和某些学术文章中广泛流传的关于中国在非洲农业投资的四大传言：中国在非洲农村地区已经获得面积广阔的耕地；这场“圈地”运动是中国政府的战略优先事项，通过国有企业和国家政策性资金精心策划；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是为了给本国提供粮食；有大批中国农民计划移居非洲。

布罗蒂加姆和她的研究团

队经过数年艰苦的实地调查，收集了翔实的证据，揭示了所谓中国在非洲“圈地”神话的事实，并描绘了中国在非洲活动中那些真人真事。布罗蒂加姆以娴熟的笔触发出了中方的声音，同时也从多个非洲视角反映了当地社区、体力劳动者、NGO和政府的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故事。同样地，布罗蒂加姆也探讨了枯燥的政策问题——中国政府是否计划把非洲变成自己的粮仓，为此她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无数政策变迁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

书中有三点尤为值得注意：非洲各国政府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商业社会内部千差万别；中国企业为什么会在非洲做出错误的投资设想和决定。

布罗蒂加姆详细阐述了非洲各国政府在投资协议达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莫桑比克为例，与中国和其他农业投资者进行接洽的是该国农业部的最高官员。一项新研究表明，国家和地



方的政府精英在大型土地收购中发挥关键作用，布罗蒂加姆在书中指出，在与中国相关的土地收购中情况的确如此。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的现有投资形式多种多样，从对外援助到技术援助，从国有企业到私营投资者，书中强调必须对中国的行为主体进行详细区分。非洲的决策者和民间组织也应该运用针对性的策略来与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打交道，以保证其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积极影响。

最后，从中国在非洲投资者的期待和挑战中，读者开始认识到一个非常明显又常常被忽视的问题：许多中国投资者天真地认为非洲的投资环境和中国一样。如果说中国企业表现出一种对土地权利问题相对较低的意识，只是因为这在中国国内“根本不是事儿”，强大的地方政府会把土地移交给企业，几乎看不到任何农民反对。同样，布罗蒂加姆还指出，中国投资者在非洲把农村“废地”变成肥沃农田的热情，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土地复垦运动的折射。

（翁晓雪）

邻居聪明很重要

•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 / 2015.12.08

→ 我们知道，个体层面上的智力至关重要，它影响到一个人在学业、工作和生活中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个人智力水平不及你所居住国家的平均智力水平来得重要，你会怎么想？而这正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加雷特·琼斯在其新书《蜂群思维：全国平均智商何以远比你自己的更为重要》中所谓的“智商悖论”。

W·约埃尔·施奈德是在研究智商与收入的联系时发现这一悖论的。他在接受采访时描述了可能产生积极附带效果的三个关键途径：智商与耐心、合作性及团队执行力之间的关联。而第四条途径是你周围人们的生产率，它可以让你另外三条途径的影响成倍增强。比较聪明的人更有可能具备更大耐心，从而推迟对自我的满足并愿意为获得奖赏而等待。琼斯这样解释其中的联系：“当你更有耐心的时候，你会储蓄更多的钱。如果你拥有比较有耐心的邻居，未来你将能够借用他们的一部分钱。”

此外，更高的智力预示更出色的双赢、扩大利益和亲社会的行为。琼斯解释说：“更有耐心的人更在乎他们的声誉，他们更在乎通过建立合作模式而获得的长远利益。”在琼斯看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团队努力，由于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价值是通过团队任务创造的——在工程企业、医院手术室、好莱坞大片中莫不如此，因此任何能够促进团队生产率的东西对于经济的总体健康很可能都至关重要。

琼斯认为，从中得到的教益就是，置身于聪明人当中要比你自己聪明来得更为重要。

中国抨击美国对台军售 但惩罚措施或有限

●《华尔街日报》，节选/2015.12.18

→ 中国猛烈抨击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18.3亿美元武器装备的举动，但对参与武器销售的美国企业，中国可以实施的惩罚措施十分有限。不久前宣布的对台军售交易是奥巴马政府四年来首次授权的对台军售，这个消息很快引发北京方面的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美国企业参与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将不会同任何此类企业开展合作和商业往来。

但中国政府能够影响美国防

务供应商的措施有限。美国政府禁止这些供应商对华出售军火。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可能会试图通过攻击美国供应商的民用商业利益来给这些供应商施压，不过这可能引发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报复。

参与最新对台军售的主要承包商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均在中国有商业利益。洛克希德最新收购的西科斯基飞机公司在中国销售民用直升机，而雷神则在中国销售民用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和提供咨询服务。这次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尚不清楚。根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其成员可引用“基本安全利益”作为实施贸易限制的理由。根据一位美国海军官员此前撰写的报告，中国政府可凭借这一规定，在未经过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前提下，停止从美国公司的进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家崔凡说，中国也可能实行非贸易措施来惩罚美国公司，比如限制他们参与双边投资的能力，拒绝其公司高管入境或不鼓励中国公司与其合作等。崔凡说，鉴于中国并不是WTO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约国，因此相关机构还可以阻止美国承包商参与政府招标。

另一种选择是停止从美国公司购买民用飞机。但这样的举动也将损害中国航空业利益，因中国航

空业仍高度依赖于引进技术。帮助设计中国首架喷气式客机ARJ21支线飞机的已退休航天工程师周济生(音)表示，美国制造商为中国制造的民用飞机供应关键零部件，包括电子系统和发动机，中国不太可能惩罚这些供应商。

然而一些分析师表示，无论所提出的威胁是否导致制裁目标遭受经济损失，中国的利益仍然可以满足。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曾锐生表示，从中国角度来看，这样的警告已对美国产生威慑作用，将阻碍他们向台湾出售大件武器，如先进战斗机和现代潜艇。“中国知道无法完全阻止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他们想做的是限制那些销售并使它们保持在最低水平。”(Chun Han Wong)

南海东海争端刺激亚洲各国购买潜艇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2015.12.22

→ 位于伦敦的战略国防情报局(DSI)表示，由于对南海和东海争端的关注度上升，亚洲国家加快在军事硬件建设上的投资，其国防开支增长居于世界前列，而位居榜首的是各国在潜艇上的开支。

DSI的分析人员认为，当前亚洲潜艇市场总值已超过70亿美元，2025年将达到110亿美元。这意味着亚洲将超越欧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潜艇市场。DSI分析员Sruvan Kumar Gorantala称，印度、澳大利亚及韩国是潜艇的主要买家，它们购买潜艇主要是出于对南海、太平洋、印度洋潜在的海上冲突与威胁的担忧。Gorantala认为，南海争端以及其他国家潜艇部队的现代化导致了印度、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潜艇的需求。

其中，日本已经着手向国外出售武器，包括“苍龙”级潜艇。泰国正在寻求采购三艘柴电潜艇，以对抗越南海军的相应能力。2009年越南着手购买三艘俄制“基洛”级潜艇，此后在总价值达26亿美元的军购案中又订购了三艘。

不过，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潜艇市场，未来十年其总开支预计将达1020亿美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防务分析员Carl Thayer认为，越南应对可能冲突的战略是“迫使敌方尽可能远离越南海岸”，南海冲突启动了“越南海空军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进程”。

就潜艇而言，越南的“基洛”级潜艇装配有反舰及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不过，Thayer认为，越南不会寻求常规战争或局部战争，而是

寻求烈度低得多的短促冲突，但越南同样试图拥有威慑能力以及对敌方造成有效杀伤的能力。

新加坡S. Rajaratnam国际研究学院联合研究伙伴Collin Koh认为，建设潜艇部队有利于“提供以弱对强的武器”，因此近期东亚地区服役的潜艇比过去服役的吨位更大，武器装备也更强。Koh认为，未来各国海军需要克服若干难题，包括潜艇作战相关的财政、技术、后勤及人力问题，现在购买潜艇的各国必须掌握水下作战的技艺。

在启动购买三艘“基洛”潜艇之后，越南已经向印度寻求帮助，在一所先进水下战学校为500名潜艇艇员提供训练。Thayer认为，越南的问题是缺乏作战经验以及针对假想敌的有效训练。不过他表示，现在越南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即将“基洛”级潜艇派出并进行猎潜演练，从而学习潜艇的搜寻与定位。



越南海军“基洛”级潜艇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来自南卜子村小学的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让爱在团聚中升温 “多一克温暖”寒令营在京举行

2015年12月12日至13日，由海澜之家联合网易平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暖流计划”、凤凰网和优酷土豆共同举办的“多一克温暖”寒令营活动在北京举行。该活动是继10月30日的启动仪式和12月1日的羽绒服捐赠仪式后的第三场主题活动。

在本次寒令营活动中，来自河北省赤城县南卜子村小学的7位学生代表在“多一克温暖”团队带领下，参观了天安门、故宫和清华大学等地标建筑。此外活动还安排7位学生与在北京打工的父母见面，并一起进行了形式丰富的亲子互动，整个活动充满了惊喜和感动。

由于父母长时间在外打工，7名学生从小与老人留守在家，亲情缺失成了他们成长中的一大问题。“多一克温暖”寒令营旨在关注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以轻松有趣的活动拉近两代人的距离。

感受首都风土人情

对于从未出过山区的学生们来说，大城市的一切都新鲜有趣。12日，连日雾霾终

于散去，北京迎来了晴朗的一天。天刚亮，孩子们整齐地穿好海澜之家特别定做的羽绒服，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带领下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我）是第一次来北京天安门，非常激动。”参加本次活动的学生候日华在前往天安门途中难掩兴奋。据了解，7名学生中有5名是第一次离开南卜子村来到北京。而随后故宫悠久的历史 and 尘封的故事也让学生们不断驻足，从他们的眼神中能看到对知识的渴求在悄悄萌芽。

造访梦想学府

身在山区的学生们都有一个求学梦。“多一克温暖”团队为了让学生们与梦想近距离接触，带领他们参观了清华大学，感受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希望给学生增加学习动力，树立改变现状的信心和勇气。此外，活动还走进国内门户网站之一网易的总部，让学生了解媒体人的工作环境。

玩闹是孩子的天性。在校园里一番打

闹追逐后，孩子们也希望自己能有一天来到这里上学：“我争取以后考上清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家人团聚 留住感动

与长时间分离的父母团聚，是本次寒令营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妈妈我好想你，今天我来北京玩得很开心，下午我看见爸爸了，因为你工作忙我没有看见你。祝妈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候日华在明信片上写下了对妈妈的深深思念。据候日华爸爸说，他们夫妻两人都在北京打工，平时为了多挣些钱，几乎没有假期。这次多亏海澜之家，能在北京见到儿子十分开心和感激。

为爸爸挑选冬衣也是本次亲子互动的重要环节。12月13日下午，学生们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海澜之家旗舰店，亲手挑选羽绒服作为礼物送给爸爸，由“多一克温暖”主办方为学生们的礼物埋单，帮助他们实现心愿。温晨昊看到店里的杜淳海报，激动地拉住爸爸：这个大哥来过村里给我们送衣服，还和我们一起吃生日大蛋糕，还带我们放纸飞机！

而在寒令营最后的亲子互动中，7名学生与父母一起进行了互动游戏，活动现场笑声不断。

游戏结束后，学生和家长对今年的“多一克温暖”活动做了总结。“昨天下午4点见到他以后特别激动。我每天都在想他，但又觉得宁愿不见，见了再分开会伤心。”温晨昊的父亲在说自己的感受时声音有些哽咽。对于未来，他说“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心灵健康、身体健康的人，其次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多一克温暖”的寒令营活动成功让南卜子村的7名学生与父母团聚，希望在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和情感需求方面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反响。同时他也表示，今后的“多一克温暖”公益活动将继续通过羽绒服捐赠来惠及更多留守儿童，把温暖带到更多的地方。





朝鲜手腕

2011年12月1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突然病逝，三子金正恩被拥戴为新的最高领导人。与外界对其资历、能力的质疑不同，四年来，这位年轻的领袖不仅牢牢掌控政局，还推出诸多新措施。

对内，政治上的整肃延续至今——来自韩国的消息说，朝鲜109个核心职位中有79个职位更换了首长。经济上则释放出了市场化气息，连朝鲜外务省的官员都直言，“改革就是改革了，有什么不能提的。”

对外，为获得有核国家地位，朝鲜大搞外交攻势，除了中国，更向欧美、东南亚、中东乃至非洲方向用力，但在核问题的裹挟下收效甚微。传统的中朝关系在金正恩上台之后则屡次遇冷，“牡丹峰乐团撤演”事件即是一例。总体而言，或显“手腕”有余，成效不足。

铁幕依旧，改革深浅难辨，朝鲜仍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度。《凤凰周刊》特约两位数次赴朝的作者，分别从作为政治窗口的平壤和远离中心的咸镜北道带来最新鲜的独家体会。尽管是“盯防”下的旁观，但仍能捕获诸多细节，帮助窥见金正恩治下四年来朝鲜的变与不变。

2015年10月10日，朝鲜平壤举行劳动党建党70周年盛大阅兵活动，徒步方队中的核弹背包方队引人关注。

牡丹峰乐团撤演背后 金正恩的“核逻辑”

记者/漆菲 陈祥

平壤大同江畔，有一座海拔仅95米的山峰，由于远看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而被命名为牡丹峰。这座山峰被赋予开启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核心统治的意义，因此而命名的牡丹峰乐团则成为年轻领袖的最佳外交名片。

这群年轻的姑娘造型前卫，她们的音乐风格活泼，并常融入现代元素，让外界嗅到了一丝朝鲜“开放”的气息。用朝中社的话说，“金正恩正是怀着在朝鲜新的100年掀起文艺革命的远大构想，亲自组建了符合新世纪要求的牡丹峰乐团。”

万众瞩目之下，牡丹峰乐团却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放了一次“大招”。2015年12月12日，中国国家大剧院发布一则演出取消消息——原定当日起一连三日进行的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和牡丹峰乐团首场赴华演出，“因工作层面沟通衔接原因，未能如期进行”。

原本认为此次演出有助于修复似见冷却的中朝关系，更有不少人认为其有可能作为“金正恩访华”之铺垫，却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戛然而止，一时间舆论哗然。“这件事情将中朝关系的脆弱性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即双方对彼此的戒备感都很强，”一位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国学者向《凤凰周刊》记者坦言，取消演出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经过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才能下达，而中方仅简要提及“沟通问题”，其实反映出中国高层对朝方的不满。

撤演引发猜疑

对中国耍脾气并不是金正恩的独创，

但相比起前辈，程度却严重很多。据上述深谙朝鲜事务的中国学者介绍，1966年4月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来华访问时，据称谈得也不太愉快，待其回国后中朝双方各自发文数落对方，“但不至于当时摆脸色”。还有一次是2010年5月，金正日来华访问，当时正值朝鲜国家级艺术团血海歌剧团创作的歌舞剧《红楼梦》来京演出，他却在演出当天下午不到4点就离开了，传言也是由于“跟中方谈判破裂”而没看演出。

这一次，这群妆容精致的姑娘在北京吃了烤鸭，参观了故宫、颐和园之后，不声不响地坐上飞机离开，让不少倾心的中国粉丝无比失望。由于此前商定的演出并不对外售票，对此感兴趣的普通民众只能隔着车窗冲着心目中的“女神”挥挥手。

对此最敏感的当属韩国媒体。“虽然原因至今不明，但我们的整体感觉是松了口气，简直可以庆祝了。”韩国某驻京媒体记者向《凤凰周刊》记者笑言，此前大部分韩媒都认为，如果牡丹峰的演出顺利进行，金正恩2016年年初访华可能性就增大了，在京韩媒将不得不一直绷紧神经。

韩国政府当局人士推测，“朝中政府层面推进的演出突然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遭到取消，可能会引发外交问题。站在中方的立场上，会认为朝鲜此举属于外交失礼，朝鲜则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无视，双边关系不可避免会冷却一段时间”。

韩国《中央日报》以快讯形式最先报道了演出取消一事，中国和日本媒体也紧随其后。12月12日下午4点50分左右，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表情僵硬地来



韩国方面推测，朝中政府层面推进的演出突然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遭到取消，可能会引发外交问题。站在中方立场，会认为朝鲜此举属于外交失礼，朝鲜则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无视，双边关系不可避免会冷却一段时间。



◀ 2015年12月9日，朝鲜牡丹峰乐团和功勋国家合唱团准备从平壤乘专列赴华演出。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己男、中国驻朝鲜大使李进军等为访问团送行。

♥ 2015年12月12日，原定举行的朝鲜牡丹峰乐团和功勋国家合唱团演出突然取消，牡丹峰乐团成员从首都国际机场乘飞机回国，使得外界议论纷纷。

到酒店大厅，拒绝了记者们的采访，乘坐汽车匆匆离开。在乐团成员乘坐飞机离开后，留在酒店的朝鲜负责人和男合唱团团员于晚上乘坐火车返回朝鲜。

“我们也深感遗憾。”准备撤离的一位朝鲜政府人士对在场记者表示。紧接着，各种臆测乃至“阴谋论”不绝于耳。

在韩国方面看来，撤演事件可能源于针对观看演出的中方高级干部的级别问题，“双方意见出现了分歧”。也有报道称“当初双方协商由政治局委员们出席观看，但金正恩委员长发表持有氢弹的发言后，中方立即将级别降至副部长，于是朝鲜取消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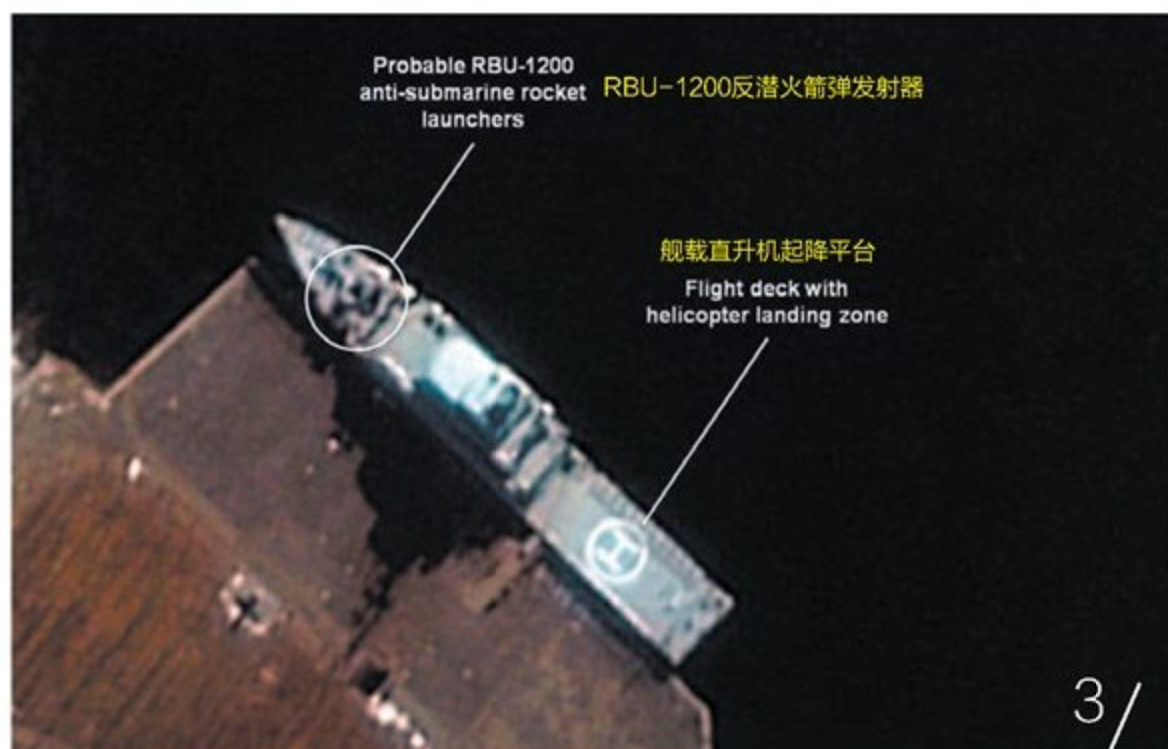
演出前的12月10日，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视察平壤平川革命遗址时称，“我们的祖国是拥有自卫核弹和氢弹的核持有国。”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道：

“希望有关各方能多做有利于局势缓和的事情”。但有中方学者向本刊指出，中国批评朝鲜核问题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以此为借口取消演出，有点说不过去。

更多的揣测是由于中方对演出内容的不满导致演出取消。韩国《朝鲜日报》记者安勇炫向《凤凰周刊》表示，“据称，中方人士表明立场说，不能在艺术中混入思想，并要求从节目中撤掉《死也不能放弃革命信念》《我们谁也不怕》等曲目。”据透露，中联部长宋涛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努力说服朝方，但仍未能挽留演出团，最后“中联部通过删除网站上朝鲜演出团领导的照片，表达不满”。

英国路透社则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原因是彩排预演中的“反美”歌词通不过中方的审查。据悉，演出中有一句歌词将美国比喻为“野心勃勃的狼”，还有其他歌词歌颂朝鲜战争。





- 1/ 2015年12月9日，美国智库“北纬38度”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东仓里西海卫星发射场三年的升级工程已近尾声，发射台和发动机试验台都已完成。这意味着到2016年第一季时，若朝鲜领导层决定进行此类发射活动，应已准备就绪。
- 2/ 2015年10月25日，商业卫星拍摄的影像显示，朝鲜咸镜北道丰溪里核试验场有明显的建设迹象。新挖的坑道提升了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能力，不过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即将进行试验。
- 3/ 2014年1月17日，商业卫星拍摄的影像显示出朝鲜东北港口罗津的一处造船厂。从功能上看，这款新型战舰采用了可搭载直升机的设计，装备有反潜火箭弹发射器，用途似乎可用于反潜和渔业保护。这是朝鲜25年来制造的最大水面战斗舰艇。

对此，一位常驻朝鲜的外媒记者向《凤凰周刊》表示，以中方的习惯做法来说，不太可能有所谓审查和临时改歌词一说，因为无论是称颂金正恩还是斥责美帝，在朝鲜歌曲中都很常见。“感觉（这些是）不同人怀有不同立场的揣测。”

目前的公开信息中，可信度相对最高的，是曾看过牡丹峰乐团演出的韩国朝鲜问题负责人对《中央日报》的分析，“牡丹峰乐团演出现场大多以导弹发射场面的影像等为背景”，“11日彩排时中国发现了这一问题，再加上金正恩的氢弹发言，中方认为存在问题并要求删除，但朝鲜没有接受”。上述外媒记者对此也表示认同。据他猜测，中方此前从未将演出一事与核武器、氢弹相联系，如此被“摆了一道”自然不悦。

“而朝方也没有料到中方会坚持不同意这样的布景，因而直到金正恩下达命令才敢取消。这也是为何直到演出前三小时才最终取消。”

“氢弹宣言”的绝妙时机

“两位领袖曾为一支支武器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现在发展成了捍卫党和革命、祖国和人民的茂密的枪林。由于有金日成同志在此打响的历史的枪声，如今朝鲜成为放出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自卫的核弹、氢弹爆炸声的强大核国家。平川革命史迹地可谓是先军枪杆子的故乡。”2015年12月10日，在视察改建的平



川革命史迹地时，金正恩的一番发言震惊世界。

就在这天上午，朝鲜两大知名文艺团体牡丹峰乐团和功勋国家合唱团抵达北京站，开始原定期5天的演出行程，朝鲜驻华大使馆和中方有关部门代表到车站迎接。当大陆民众热烈讨论漂亮姑娘们的演出时，突然传出朝鲜宣布拥有氢弹的消息，显得颇为突兀。

事后看来，朝鲜选择在这一天宣布拥有可能并不存在的“氢弹”，或是精心算计的结果。不少分析认为，借演出强行让中国为其“氢弹宣言”背书、造成中国默认其有核国家的既成事实的意图较为明显，亦让外界见识到朝鲜多年来与整个国际社会周旋的高超手腕。

光复后不久的1945年10月，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在平川选址，确定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家兵工厂。站在祖父一手创立的朝鲜军工业的发源地，金正恩信心满满地说：“只要我们发挥解放后一切都很艰苦的条件下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冲锋枪的那种精神，朝鲜就能进一步变成任何敌人不敢冒犯的强大国家。”

氢弹借助核聚变原理，需要由原子弹来引发核聚变反应，威力可达几千万吨级TNT当量。而只有在成功爆炸原子弹的基础上，才能研制氢弹。按照常理，威力远高于原子弹的氢弹一旦进行爆炸试验，震动波和空气中的放射性颗粒必然会被检测到，因此韩国情报机构并不相信朝鲜已成功研制出氢弹，认定这是金正恩发出的新恫吓。

“从公开时间点来看，该发言可能是

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政府间会谈上掌握主导权，同时向朝鲜居民展示国防实力，稳定体制。”韩国朝鲜研究学会会长赵成烈如此表示。2015年12月11日-12日，朝韩双方在开城举行副部长级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就草草结束，氢弹言论看似未能起到任何作用。韩国提出离散家属生死确认和书信往来、非军事区(DMZ)世界生态和平公园、开城工业园“三通”(通行、通关、通信)等议案；朝鲜要求韩国在2016年3-4月重启金刚山旅游项目。

更深远来看，2016年5月平壤将召开时隔36年来的首次劳动党全体代表大会，因此韩方有部分专家认为“氢弹说”是金正恩为了政绩而制造的假象。

美方同样不相信金正恩拥有氢弹。专门研究朝鲜动态的网站“北纬38度”的运营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乔尔·威特断

言,金正恩提及氢弹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目前技术上未开发成功。“如果朝鲜在适合大型爆炸试验的其他场所开始进行试验场修建工程,这将成为暗示朝鲜将开发氢弹的线索。”他解释称,“目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行动。”

但威特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让朝鲜克服目前的技术难题,朝鲜或有能力在2020年前后开发出1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

就在金正恩抛出“氢弹说”的同一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宣称:“联合国安理会计划将朝鲜人权问题作为正式议题。”外界推测,朝鲜需要夸大言辞来应对这一波压力。韩国东国大学朝鲜学系教授高有焕提出类似观点:“最近美国加强对朝制裁、不断施压,朝鲜此举既是在表示反抗,也是想通过展示核开发能力来胁迫签定和平协定。”

早在2015年9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就曾宣告:“美国和中国绝对不会承认朝鲜是核持有国,两国在敦促韩半岛实现完整且可验证的无核化这一问题上相互团结的,两国反对朝鲜进行威胁地区稳定及各国安全利益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开发。”

不管朝鲜是否成功研制出氢弹,金正恩的“氢弹说”无疑让朝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僵硬、恶化。但一个逻辑已经清晰呈现,平壤的策略是先不惜一切代价掌握核技术,然后逼迫国际社会承认它是有核国家,此后才转移工作重心至改善外交和经济合作上,待国库宽裕后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有核国地位。

用“雷声”进行万全准备

1991年4月,得悉称宁边核开发园区的科学家们取得打开核开发突破口的成果时,

金正日兴奋地对负责军需工业的全炳浩说:

“今天是我得以实现终生夙愿的日子!”但他的父亲金日成却回应说:“开发出屠杀同族的核武器,真是让人无法想象。”

以上这段话,是67岁的前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资料研究室副室长、跟随黄长烨一起“脱北”的金德宏于2015年10月接受韩媒采访时所披露的“内情”。

祖孙三代的“核武梦”延续了半个世纪,在金正恩时期得到“像样”的成果。“朝鲜的核武器小型化能力或已达到相当水平。”韩国在2015年初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提及朝鲜核武器时表示,“据推测,朝鲜通过五次远程导弹发射,已具备了可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这是韩国首次在两年一度的《国防白皮书》上评价朝鲜核武器。

只是,走在漫长核武发展路上的朝鲜发现,自己早与南方的国力差距悬殊。2015年,朝韩双方国民总收入相差44倍,贸易额相差144倍之多。这也直接导致双方战斗力的巨大差距,朝鲜在常规军事上越是落后,反而越依赖核武器所形成的威慑力。2014年,朝鲜政府在平壤大同江畔建造了两栋46层的公寓,专门奖励核开发技术人员,与核武器有关的人员成为“平壤的宠儿”。

“我们已做好随时用核爆炸的‘雷声’

朝鲜选择在牡丹峰乐团演出前宣布拥有“氢弹”,或是精心算计的结果:即借演出强行让中国为其“氢弹宣言”背书、造成中国默认其有核国家的既成事实,亦让外界见识到朝鲜多年来与国际社会周旋的高超手腕。

进行回答的万全准备。”朝鲜原子能研究院在2015年9月15日宣称,宁边核设施已经重启,产能大增。“雷声”是朝鲜官方文宣对核弹爆炸声的爱称,平壤方面在第三轮核试验时便主张“自主研发的核爆炸发出畅快的‘滚滚雷声’”,而“滚滚雷声”使得朝鲜在国际社会上日益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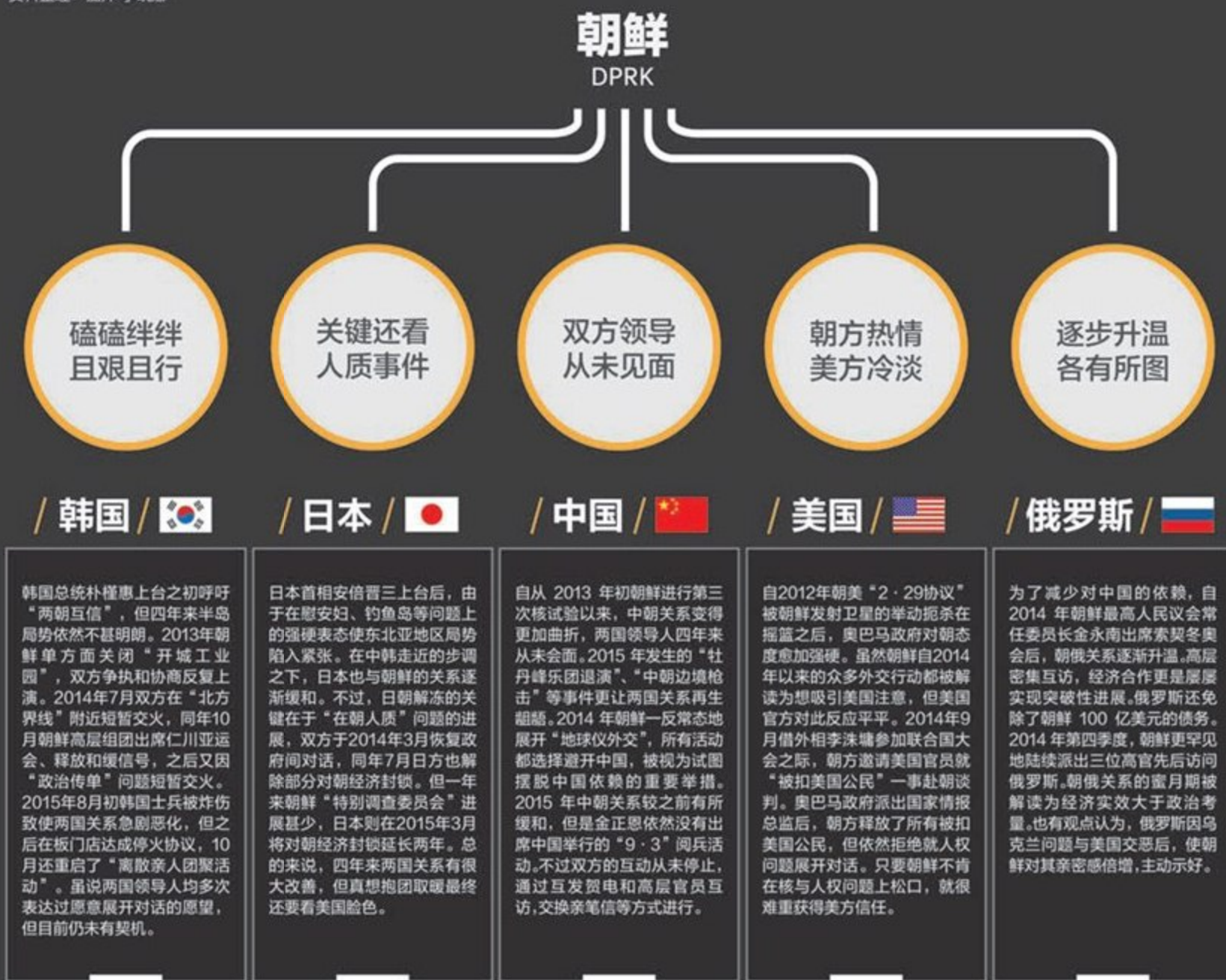
不过,朝鲜却永远是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豪壮样儿。金正恩的演说、劳动党的文宣态度强硬自不必说,外交官也发表充满浓厚火药味的言辞。“朝鲜已准备好迎击美国选择的任何一种战争。60年前朝鲜战争时,我们用手枪对抗美军,如今我国已充分具备利用核武器应对核威胁的能力。”2015年9月30日朝鲜驻英国大使玄鹤峰在伦敦公开声称,将以核弹反击美国的进攻。

然而,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在投射时必须借助运载工具,比如战机挂载或导弹携带。朝鲜人民军的空中力量形同虚设,如今也没有资金用于外购新式军机。所以,朝鲜只好将运载核弹的希望寄托在精确度不高的弹道导弹上。

为此,在2015年11月2日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谈上,美韩双方公布了一旦韩半岛发生紧急情况时就破坏朝鲜核武器与导弹的“4D作战计划”。该计划以“不容忍朝鲜一切形式的侵略和挑衅行为”为共识,并批准了关于探测(Detect)、扰乱(Disrupt)、破坏(Destroy)和防御(Defense)朝鲜核导弹和生化导弹等导弹威胁的“同盟综合导弹应对作战概念及原则”行动指南。具体预防措施包括通过军事卫星、“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机等监视和侦察设备,密切监视朝鲜的弹道导弹基地,并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利用韩美军队的精密打击武器予以破坏的概念,同时将朝鲜的固定发射装置、陆上移动发射平台和

朝鲜与“六方会谈”各方关系图

资料整理：嘉沐 李晓娜



潜射导弹一并列入打击对象中。

“统一大战完成年”

2015年12月17日是金正日逝世四周年的纪念日，作为领导人的金正恩零时便前往锦绣山太阳宫，向父亲表示崇高敬意。这天一大早，朝鲜驻华大使馆门口也陆陆续续有朝鲜民众排队献花。前去围观的一位中国记者向《凤凰周刊》透露，大部分朝鲜人态度非常恶劣，有人甚至一把推开门面带善意的中国人说：“拍什么拍，没话跟

你们说！”

该追悼仪式只进行了不到十分钟，与2014年相比参与人数明显减少，也没有降半旗表示哀悼。这让围观外媒纷纷臆测，这是否意味着金正恩时代的正式来临。

在金正恩的时代，其治下朝鲜最大的变化首先来自于人事变动。韩国国防部、统一部和情报当局对朝鲜的人事调整动向进行调查和资料分析，发现四年来朝鲜109个核心职位中，共有79个职位更换了首长，人事更换率高达72.5%。针对朝鲜党、政府、

社会团体等的94个职务和军队的15个首长职务进行分析后，发现军方15个核心职位中有12人被更换，人民武力部长在过去四年换了6人，平均在任时间不到8个月。

如此频繁的人事变动之下，韩国庆南大学政治外交学教授金根植得出一个稍显乐观的结论：2012年执政第一年，金正恩军方之外的94个职位中更换了36个职位（38%），2013年更换了26个（27.4%），2014年更换了21个（22.1%），2015年以来共更换了18个（18.9%），呈递减趋势。但“脱北”的



“精英”人士则从2013年的8人增至2014年的18人，再到2015年的至少20人。

细心的韩媒还注意到，随着陪同金正恩出访人员的频繁替换，实权人物的年龄也比四年前大幅下降了。2012年前十位紧密随行人员平均年龄为68.6岁，2015年核心随行人员前十位中，除年龄未被确认的人民武力部长朴英植外，其他9名的平均年龄为61.1岁，年轻了7.5岁。

四年来，金正恩继续坚持“先军政治”的基本政策。韩国国防部2014年底发布的《朝鲜及周边国家军事实力现状》显示，截至2013年底，朝鲜军队总兵力为119万人，与2012年持平。其中陆军由102万人减至101万人，空军由11万人增至12万人。但空军的技术装备增长有多少，外界皆不看好。

与核恫吓类似，金正恩将2015年定为“统一大战完成年”，朝军为此将前线兵力

2015年10月10日，原定于平壤时间10点开始的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阅兵式因下雨原因不得不推迟到下午举行。图为朝鲜士兵在观礼台下避雨。

部署整体向南推进50公里，在距离三八线100公里范围内部署了70%的兵力和80%的火力。尽管朝鲜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十分落后，但如此规模的兵力部署，对韩国而言仍是极大隐患。

这种情境下，朝鲜从国际上获得的援助也不断减少。2004年朝鲜从海外获得3亿美元的援助；2014年仅为5000万美元。联合国2015年4月还宣称，朝鲜2400多万人口中有1800万人无法获得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和营养。

不过从大的数据上看，朝鲜连续三年实现粮食增产，即便在国际社会减少对朝粮食人道援助、加大对朝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其经济仍在逆境中呈现出缓慢复苏、市

场化元素渐强的态势。《凤凰周刊》记者曾从朝鲜外务省人士口中听闻，这几年朝鲜恢复了配给制，普通成人每天的粮食供应是700克，其中并非完全是大米，还有玉米等杂粮。此前，朝鲜曾经一度大力推动种植土豆，以此作为主食的替代品。

金正恩上台后还推出了诸多经济改善措施，无论是2013年正式颁布“关于确立朝鲜式的新经济管理体系”的“6·28”方针，还是融入了更多市场要素的“5·30”措施，抑或设立新的经济开发区（如今朝鲜境内共有24个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都被认为给当地经济带来更多积极的变化和希望。

但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库斯·诺兰德看来，朝鲜经济的复苏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和中国企业需求增加的影响，而非得益于金正恩的领导能力。“在国家无法完全控制经济的情况下，

市场化是发自社会深处的一种力量，就像小草从泥土里破土而出一样，是自发性的，不是政权所能控制的。”

“市场经济开始萌芽已经成为现实，接下来得观察朝鲜官方如何定性，即官方是否承认并继续发展这一模式。”日本《东京新闻》编委、《金正男传》作者五味洋治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如今朝鲜出现了400多个小市场，近九成居民的生活依托于这些市场的交易。在他看来，2016年5月朝鲜将召开第七次党代会，估计金正恩届时会提出“努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等大而化之的经济方针，规避政治上承认“市场经济”的风险。

为了走出经济困境，朝鲜还不断加大海外劳务人员的派遣规模以赚取外汇。往返于平壤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高丽航空客机每周有两趟航班，多数乘客是朝鲜劳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尚咏梅不久前撰文称，目前朝鲜已向全世界45个国家派出劳动力，据推算，总规模高达6万至6.5万人，集中派往俄罗斯、中国等16个国家的劳动工人超过5万人。朝鲜海外劳工平均月收入1000美元，其中850至900美元作为“忠诚金”献给国家，剩余100至150美元由个人支配。

如此计算，朝鲜每年通过劳务输出可赚取外汇达15亿至23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韩国因天安舰事件采取“5·24”措施、中断朝韩贸易而遭受的损失。

金正恩尚难访华

2013年年初，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10月处决一向与中国亲近的前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成泽后，导致双边高层会谈全面中断，中朝关系急转直下；直至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

美国学者马库斯·诺兰德认为，朝鲜经济的复苏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和中国企业需求增加的影响，而非得益于金正恩的领导能力。

席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纪念仪式后，两国关系才迎来解冻迹象，但乐团撤演事件无疑导致双边关系再次冷却。

同一时间，有外媒称“朝鲜当局以间谍嫌疑逮捕了生活在平壤和其他城市的100多名中国华侨”，对此，中国驻朝鲜使馆发言人回应称，旅朝华侨违法犯罪属于极个别现象，根本不存在所谓“间谍”，所谓“百名华侨被逮捕”更是子虚乌有。但种种谣言如此滋长，无疑也是由于双边关系不佳所致。

前述外媒驻平壤记者告诉《凤凰周刊》，“关于中国切断对朝石油的报道时有发生，但其实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自2014年开始就是空的。中朝之间的贸易额的确有所下降，但主要是由于中国对煤炭资源需求的减少。援助部分其实并没有变化。”

在传统“盟友”渐行渐远的情况下，朝鲜近两年也发起了“外交突围战”。其外相李洙墉自2014年4月上任后连续访问了中东、非洲、东盟诸国，还赶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大会。此前，朝鲜外相已有15年缺席联合国大会。几乎同一时期，朝鲜内阁副总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分管国际事务的书记姜锡柱于9月接连访问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蒙古等国。正当外界惊呼朝鲜要打破外交僵局时，由于其不弃核的立场，使得这些努力化为泡沫。

谈到目前朝鲜的对华态度，按照部分中

国学者的说法，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这么一个判断：若中朝关系不好，损失更多的是中国。“当中的逻辑是，中国崛起以后的主要目的是跟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特别在亚洲，有核国家朝鲜站在哪边，哪边就取胜。所以，只要冷淡中国，中国一定会屈服投降。”

如果真是这样的奇特逻辑，当然是一厢情愿、不顾实际的痴人说梦。如今来看，北京态度愈发坚决。

2015年5月20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宣布朝鲜的核打击手段正式进入小型化、多样化阶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第二天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了中方立场：中方一贯主张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一次，在朝鲜两大乐团抵达北京、即将开始预定演出之际，针对“氢弹宣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申中国“一贯主张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的主张，并呼吁各国应共同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大局，为推动早日重启六方会谈作出建设性努力。显然，即便朝鲜“手腕”再高超，时机安排再巧妙，中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底线仍然不容突破。

撤演事件发生后，有外媒传出消息称，朝方仍然在为金正恩的访华做努力，而牡丹峰乐团也可能会推迟到2016年年初再次赴华演出。但在2015年11月韩国议员团访华时，据《中央日报》报道，刘云山在与其会见时曾明确否认了外媒称2016年4月将举行中朝首脑会谈的报道。

受访的数位中国学者也认为，目前来看金正恩访华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这次撤演事件的本质是，朝鲜想借乐团演出的机会想让中国为其拥核立场而背书，通过演出布景造成既定事实，继而承认其为有核国家。只要中方不接受此底线，就不会同意金正恩的访华计划。”

美国



访问朝鲜

2012 07/30-08/02

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美国前新墨西哥州州长威廉·理查德森·美国国务院就谷歌公司代表团访问朝鲜一事阐明立场，称两人的朝鲜之行缺乏考虑、不合时宜。

朝鲜访问

2014 09

外相李洙暹
1998年之后朝鲜外相时隔15年后首次率团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

俄罗斯



访问朝鲜

2014 09/11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亚历山大·托尔申
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泰福会面，并向金正恩赠送了礼物。

2014 10/20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亚历山大·加卢什卡
与朝鲜内阁总理朴凤柱会面，并签订了两国政府间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会谈纪要。

朝鲜访问

2014 10/1-10

外相李洙暹

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

2014 11/17-24

金正恩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崔龙海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交了金正恩的信，讨论双方关系一系列迫切问题，包括相互经贸协作积极化途径、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局势。

2015 05/09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访问俄罗斯，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

古巴



访问朝鲜

2015 09/07

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

这是金正恩自2013年7月以来首次会见高级外国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向金正恩转达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问候，还向金正恩赠送了礼物。

英国



访问朝鲜

2013 04/22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办公厅主任、国际仲裁机构最高执行官乔纳森·鲍威尔

以乔纳森·鲍威尔为团长的欧洲政党政治家代表团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访问。

埃塞俄比亚、南非、科威特、卡塔尔、瑞士

朝鲜访问

2014 05-06

外相李洙暹

2014年5月24日，前往埃塞俄比亚、南非、科威特和卡塔尔进行访问，6月20日抵达瑞士，并停留一周多。据韩媒推测，此访可能是为了整理金正恩在瑞士的银行账户。

德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蒙古

朝鲜访问

2014 09

劳动党分管国际事务书记、政治局委员姜锡柱

这是姜锡柱2014年4月上任以来首次出访。访问期间他表示，朝韩双方应落实过去达成的协议以改善关系，六方会谈当事国应无条件地重启会谈。分析认为，此次访欧旨在开展“政党外交”，摆脱外交

叙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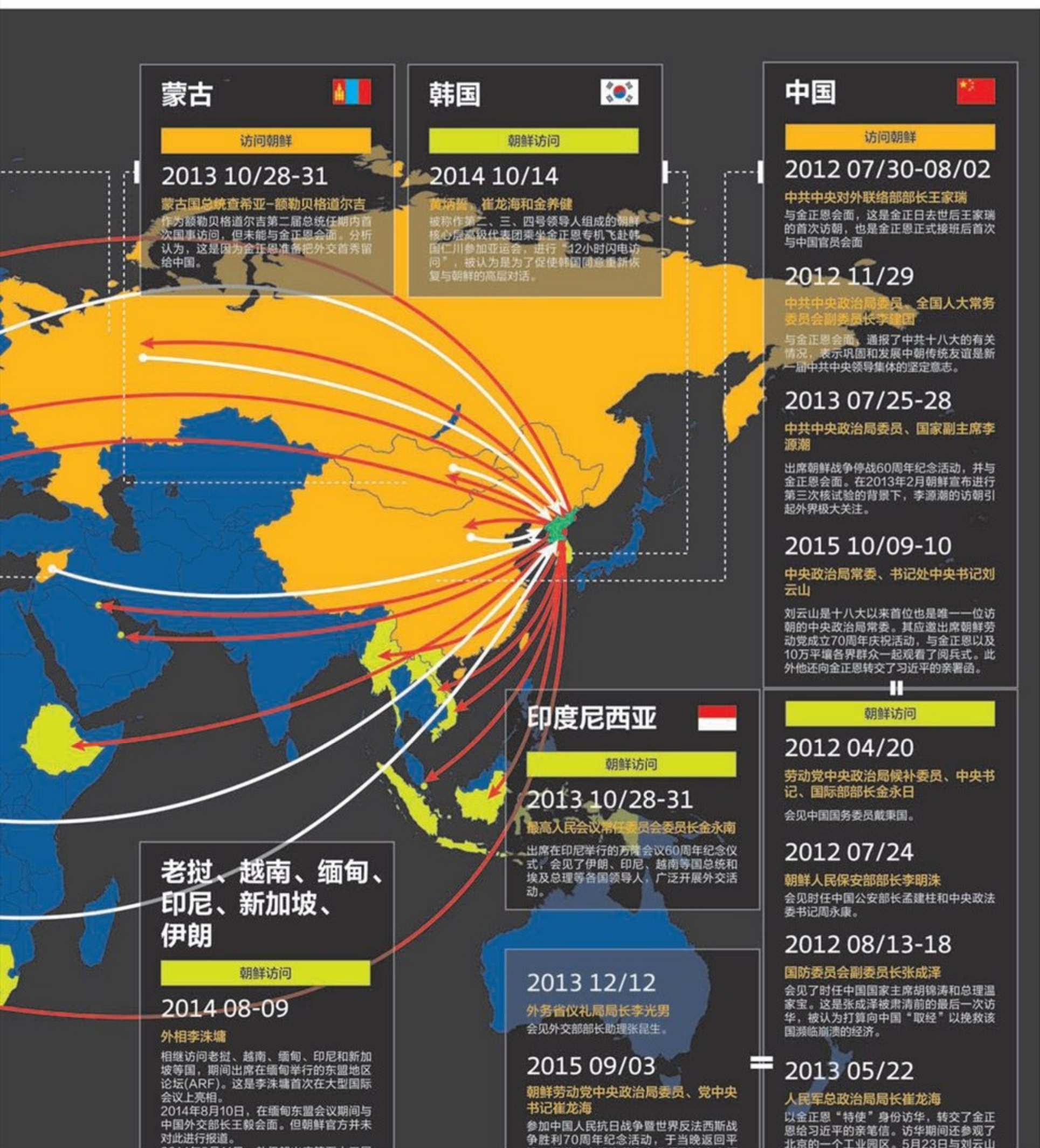
访问朝鲜

2013 07/24

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副书记阿卜杜拉·阿赫马尔

以乔纳森·鲍威尔为团长的欧洲政党政治

金正恩时代下的朝鲜外交



“平壤之春”来了么？

从负责接待的年轻外务省官员脸上，能感觉到他们对国家逐渐走向正轨的期待与信心。而在十几年前，我听到的更多是“苦难行军”、“勒紧裤腰带”之类的话。

特约记者/晦存（发自平壤）



2015年10月9日，在路透社记者的镜头中，一名朝鲜男子笑着在平壤地铁站内比出“胜利”手势。

傍晚时分，站在平壤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路口，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造型感极强的高楼发出彩色的光，恍惚间会有种在北京国贸商区的错觉。位于大同江畔的未来科学家大街于2015年10月刚刚竣工，被称为朝鲜劳动党时代的“仙境大街”。

但回过神来就会发现，这在平壤的18个区中并不常见，大部分地方仍没有路灯。而马路中间的交警多半会穿着带有小灯泡的安全背心，手拿一根闪闪发光的指挥棒。夜晚最为明亮的，除了街边昏暗的小店，就是远处大楼前被射灯照亮的金日成和金正日巨幅画像。

经常出入平壤的欧美人士近年来感受到“市场”元素在此扩散，还创造了“平哈顿”一词，意将“平壤”和“曼哈顿”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眼中，年轻的领袖给朝鲜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似乎“平壤之春”已经来临。

十多年前，因缘际会我曾在平壤生活过一年，2015年10月应朝鲜外务省之邀再度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劳动党创建70周年阅兵及纪念活动。在平壤这个精心修饰过的展示窗口，我仍然得以窥见朝鲜近年来尤其是金正恩上台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第一次从朝鲜官员的口中听到了“改革”的字眼。

比亚迪出租车背后的经济学

重回平壤，第一个感觉是道路上的汽车增加了不少。尤其出租车，时常从眼前晃过。有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平壤共有1500余辆出租车。市内一些主要干道，居然出现堵车这种“新生现象”。要知道，在过去，汽车对朝鲜来说可是稀有事物，一般顶多只能看到各单位的公车 and 外国使馆的车辆，更别提出租车了。

如今在马路上疾驰的出租车，大都是中国产的比亚迪。我乘坐过几次，价格由

1.5美元到5美元不等。与中国不同的是，出租车上虽然有计价器，但很多时候司机并不打表，而是到目的地后报出一个价格。有一次，我从距离酒店几百米的地方打车，居然被收了4美元。类似多收费的情况屡有发生，甚至在五星级酒店订车也会如此。我猜想，通过这样他们能从外国游客那里获取国家急需的外汇，一定程度上的“加价”也必然得到上层的默许。

朝鲜的外汇制度一直以来存在两种牌价，一种是官方规定的，1美元兑换100朝币，1元人民币大约是16.7朝币，这是在涉外宾馆或外汇商店的兑换比价；另一种则是市场牌价，1元人民币兑换1200朝币左右，价格虽然会有波动，但和十几年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在平壤的出租车可以使用欧元、美元和人民币付费，朝鲜本地人则可以使用朝币。不过，据陪同我的朝鲜外务省官员李同志介绍，司机的这些收入必须上交国家，如果收取朝币，也必须在货币兑换所换成美元上交，因为“（朝鲜的）汽油是进口的，必须用外汇支付。我们给你们（中国）朝币，你们收么？”

李同志来自外务省条约司，毕业于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后来继续在金日成大学法律系深造。外形俊朗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平日里他会穿一套深色西装，胸前像每个朝鲜人一样，别着一枚领袖徽章。

“中国我很熟啊，陪着商务团去过好多次。以前还能到处逛逛，现在你们搞八项规定，我们谈完事情就要回来。”李同志笑着说，自己曾访华数十次，参观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对中国情况相当了解。

尽管街道上的出租车很多，却并不能“招停”，只能到酒店固定停车处乘坐。我刚到平壤时在没有陪同人员的情况下外出过两次，后来被朝方接待人士提出警告，并

准确报出我曾去过的地点。可见，监控无处不在。

出租车的增加，除了标志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出朝鲜原油供应的改善。由于石油在朝鲜的工农业体系中举足轻重，原油供应的改善对于提高工厂开工率和农业产量都有显著影响。

“逆向开发”的电车与“未来大道”

相比富裕阶层使用的出租车，公交和地铁依然是普通市民主要的交通工具。在这方面，平壤并未显现出过多发展。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平壤地铁依旧只有两条线路，公交车、有轨电车上则密密麻麻塞满了人。

不过，新型无轨电车的出现倒是为单调的街道增添了一抹亮色。据李同志介绍，这些电车是朝鲜引进外国电车后“逆向开发”的产物，“不过，我们并没有中国无轨电车那样自储电的功能”。此刻，这位访问过中国数十个城市的朝鲜官员才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中国的赞美之情。

虽然平日里的他风趣幽默，尤其爱跟女同志开玩笑，但与我还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会在一些“重要”时刻适时打断。

朝鲜“逆向开发”的对象不只是无轨电车。据介绍，上世纪90年代起因缺乏石油，陷入困境的朝鲜机械化农业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新型农机后，经过“自主改良”应用于农业生产，使朝鲜一度退回到手工业的农业重新开始了机械化进程。

此外，自2015年5月以来，平壤各条街道也陆续开设自行车专用道。据新华社报道，自行车道从原来的人行道中分离开来，铺上一层新柏油，并画上自行车符号和行进方向。朝鲜民众说，这是在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指示下，朝鲜大力推广自行车的新举措，预计未来朝鲜自行车使用率会不



朝鲜摄影

断提高。

除了数量增加的交通工具，国家建设的复苏也是极为明显的。2012年起，朝鲜先后建成马息岭滑雪场、祖国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胜利纪念馆扩建工程等重点工程。据我观察，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的展览水平甚至超过许多中国地方城市的纪念馆。而在大同江上，不少挖沙的船只在江面作业，亦可显示出平壤近来城市基建工程的增加。

其中，未来科学家大街是其中最为瞩目的一项。金正恩2014年5月视察金策工业综合大学教育工作者住宅楼时，提出要在该住宅楼周围建设现代化科学家小区，并将之命名为“未来科学家大街”。

这条双向四车道的大街是朝鲜为庆祝劳动党建党七十周年修建的“标志性工

程”，耗时一年零三个月，在10月10日到来之际竣工，也是如今平壤最前卫的大街。目前该小区安置3000多个住户，有150多处服务设施，约2.5万人居住，居民主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道路两侧的高层建筑一改朝鲜原有建筑方方正正、色调单一的特点，在样式和色彩上都比较新颖。仔细观察，其中不少建筑还用玻璃封闭了阳台，这在平壤也是比较少见的。夜间亮起灯之后，尤其炫目。不过，这些建筑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写字楼、CBD等概念并无关联，均是统一分配的住宅楼。

据李同志介绍，相比室内照明用灯，路灯非常费电，因此平壤正在推动将所有路灯换成太阳能路灯，一边是车道灯，一边是较矮的人行道灯。“不过，这还需要时间。”

距离不远处是著名的羊角岛大桥。作为

连接羊角岛和市区的通路，由于桥面无灯，坑洼的路面让行人和机动车都变得谨慎。我抵达时，桥的南侧不时传来整齐的脚步声，唱着歌的人民军大踏步列队前行，后来得知，他们当时仍在为未来科学家大街的建设而日夜赶工。

街头的售货亭与朝鲜人的“双重生活”

城市建设可以说是朝鲜的“形象工程”，平壤市民的生活才更值得关注。

街头与出租车一起悄悄增多的，还有星罗棋布的售货亭。这些大多标着“清凉饮料”的简易房里，出售着从瓶装汽水到膨化食品的各种小商品，甚至有炒蘑菇这样的小菜。这些售货亭往往设置在国营商店前的人行道上，营业时间甚至到夜里11点，和早



崔金成/摄

早就关门了的国营商店颇有不同。

据李同志介绍，这些售货亭是国营商店的附属机构，由国营商店派出营业员实行倒班制度，所以能长时间营业。另一位同样来自外务省的朴同志补充道，这些店铺很多都承包给个人，向国营商店交一笔费用后就可以自主经营，按时向国家上缴利润抽成就可以。不过由于朝鲜不鼓励私营经济，朴同志神秘地说，承包费用“你听了会吓一跳的”。

当问到什么样的人承包这些售货亭时，得到的回答是“之前做生意有了一些积累的人吧，一般是已婚妇女”。看到我惊讶的样子，他笑着解释：“男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嘛！”

此前西方媒体多次报道过，目前在朝鲜很多人都过着类似的“双重生活”，一方面在国营企业里领取微薄的收入，一方面通过参与半公开的市场活动获取较高收益。

◀ 2015年10月9日，平壤最前卫的未来科学家大门口，灯光永明的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与新潮建筑同时存在。这条双向四车道的大街是朝鲜为庆祝劳动党建党70周年修建的“标志性工程”，耗时一年零三个月。

▲ 2015年10月9日，平壤街头手持指挥棒的女交警。在受邀参加劳动党建党70周年阅兵仪式期间，记者利用极其有限的自由机会记录下街头巷尾的平壤。

平壤市内一些主要干道，居然出现堵车这种“新生现象”。在过去，汽车对朝鲜来说可是稀有事物，一般顶多只能看到各单位的公车 and 外国使馆的车辆，更别提出租车了。

即使在国营商店，商品的供应也比过去更加丰富，各种饮料和零食显得“琳琅满目”。在平壤街头的一家商铺，我看到一瓶矿泉水是2000朝币（一元多人民币），一个柿子是500朝币，一个鹌鹑蛋是1000朝币，一小盒炒鱿鱼的价格是1.6万朝币。倘若兑换成人民币，比北京略便宜，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很贵的。

在平壤街头考察时我希望买一瓶矿泉水，当时手中没有朝币，此时附近一名妇女凑上来说自己身上有10万朝币，但不愿说出换多少人民币，让我喊价。这时路边一名警察走了过来，对其呵斥着“出去”，然后便把她带到一旁“教育”去了。据朝方人士介绍，朝鲜名义上实行外汇管制，对涉外工作的人手中持有的外汇有一定的数量限制，而市场上买卖货币的做法严格来说是

不合规定的。

对于2015年刚刚兴起的电子商务系统“玉流”，据说由于物流配送跟不上以及消耗手机流量过多等原因，没能得到大规模使用。很多平壤老百姓只是听说过这一平台的存在，很少有人使用过。此前据朝媒报道，朝鲜人民服务总局负责掌管该电子商务系统，用户可以用电脑或手机搜索预购产品，通过电子结账，并要求送货上门。如今想见，互联网购物的时代距离朝鲜仍然遥远。

“改革就是改革，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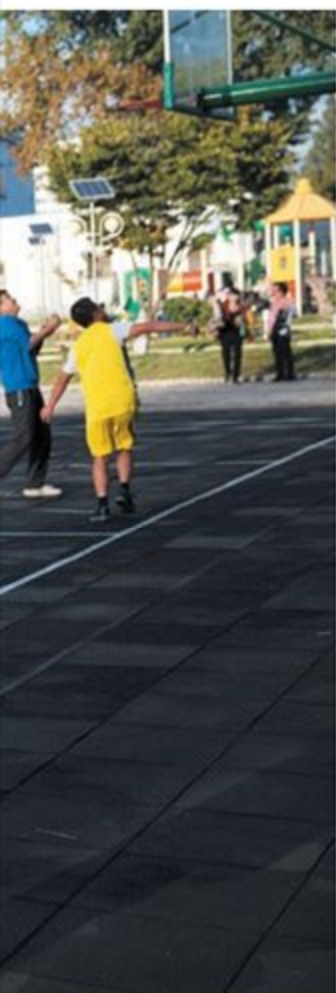
相比于商业方面的放松，朝鲜工农业政策的改革更具有根本性。上世纪80年代，朝鲜采取和苏联一样的大型集体农庄为主的体制，农场的作物除少量留给农民作为口粮外，全部上缴国库，再由国家统一划拨给农场用来购买农业机械等物资。90年代大饥荒后，国家的划拨在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纸空文，有的农场因此只好偷偷截留部分收成，使国家无法掌握真实的产量，扰乱了国家计划的实施。

自2013年起，朝鲜开始切实执行“三三制”分配方式，农场的收成按国家、集体、个人分成三份。由于多劳能带来多得，农业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产量也随之上升。李同志说，过去国家经常发动大学生、公务员、军人下乡“支农”来完成农场的生产任务，现在的情况是，这些人向农场申请后，对方根本不接受。“因为农场能够靠自己完成生产任务，也就不必把收成分给来‘支农’的人。”

与农业类似，朝鲜在工厂中也实行了类似的分配方式，而且允许工厂自主定价，参与市场竞争。因此，经营良好的和经营不善的工厂，工人收入差距“已经很大”。

从几位陪同的外务省官员口中，我了解





1/ 2015年10月11日，一对夫妻抱着孩子在平壤中心的公园附近散步。常驻平壤的外媒记者说，如今平壤街头民众的笑脸比过去增加了。

2/ 2015年10月11日，几名年轻女子在平壤新开的柏松江百货公司旁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单反相机、手机、时尚女包一应俱全。

3/ 2015年10月11日，年轻的女孩们在篮球场前摆出俏皮的姿势拍照，后面是打篮球的小伙子。

4/ 2015年10月11日，带孩子的男子摆弄起刚刚在柏松江百货公司购买的无人机玩具。

到,一名朝鲜科员的月薪是2400朝币,一名科长为3000朝币,而这些在副食店只能买到一瓶矿泉水。不过,外务省除了有粮食配给外,每周还有食用油、蔬菜等副食品发放,而中午的工作餐只要5朝币,因而不会显得过于捉襟见肘。

相比之下,在经济部门工作的人收入就高得多,一名在国营企业总公司的管理人员月薪可以达到37万朝币,但这些单位并没有类似公务员的副食品发放。

不过,朝鲜仍然忌讳谈及“贫富分化”的情况。我向两名外务省人士提到朝鲜形成了一个从事贸易致富的“钱主”阶层时,朴同志连忙否认,表示朝鲜收入差距很小,并没有所谓“钱主”阶层的存在。但据韩国媒体2015年11月披露,朝鲜新兴富裕层的“钱主”们的影响力正急速扩大,他们通过集市扩充巨额资本后,正逐渐把手伸入流通网络和房产领域。

从负责接待的年轻外务省官员脸上,能感觉到他们对国家逐渐走向正轨的期待与信心。李同志的妻子是其大学同学,现在在一家国有商社工作,管理下属十几家公司。两人恋爱十年才结婚,育有一子一女。每次谈到家人,他都是一脸幸福状。

而在十几年前,我听到的更多是“苦难行军”、“勒紧裤腰带”之类的话。随着核武能力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朝鲜开始推行“核武与经济并重”方针,也逐步调整金正日时代的“先军政治”下过度向国防倾斜的做法,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是金正恩能够站稳脚跟、并对政权高层进行一系列剧烈调整的根本原因。

对于朝鲜的改革,海外一直有一个普遍说法,即朝鲜从来不承认自己在搞“改革”,

2015年10月12日,几名朝鲜导游在一家餐厅聚餐。自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陆续开发多款旅游新产品,并加强对国外游客的宣传力度。近期更加快步伐推出多款朝中边境旅游新产品,以此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摄影 刘行磊



2015年10月9日,平壤街头出现了许多出租车。这些出租车乘坐价格由1.5美元到5美元不等,车上虽然有计价器,但司机大多并不打表。而且这些出租车也不能“招停”,只能到酒店固定停车处乘坐。

只承认在进行经济“调整”,以此与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中国式“改革开放”拉开距离。不过这一次,我清楚地听到了从外务省人士口中听到“改革”这样的说法,对方还大方地说:“改革就是改革,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手机频段的隔离,严密的政治管控

不知从何时开始,朝鲜官方对于推行经济改革的口径开始发生变化。不过,相对于“改革”,“开放”仍是一个敏感词汇。“朝鲜这么小,不像中国,一下子开放,冲击

和风险太大。”李同志小声提醒。

虽说如此,一些面上的控制还是有所放开的。根据我的经验,以前即使是朝鲜人在国内也不能自由旅行,必须持有通行证。目前这种限制已有所放宽,除非新义州特区等地,一般城市之间可以往来。此外,随着“农贸市场”的出现,目前平壤郊区的农民白天可以到平壤的自由市场进行交易,晚上再回农村。

更加开放的通行政策背后,是金正恩执政以来国家对经济控制的适度放松。而随着经济趋于活跃,财富也开始积聚,这反将进一步为朝鲜原本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带来可贵的资本和消费能力。

随着经济的搞活,人们的思想意识也



↑ 2015年10月11日，一名朝鲜人民军战士正在观看烟火表演。当晚的温度跌至5摄氏度，大多数人都席地而坐，为这场耗时三小时的晚会拼命鼓掌欢呼。

目前在朝鲜很多人都过着所谓的“双重生活”，一方面在国营企业里领取微薄的收入，一方面通过参与半公开的市场活动获取较高收益。

开始发生转变。我试着和陪同的外务省人士几次聊起一些相对敏感的政治话题，比如询问此前被传“失踪”的李英浩和玄永哲等人的去向。有些意外的是，对方并未直接回避这一话题，而是很自然地回答说：“他们年纪大，退休了。”

金正日时代的手机和网络是绝对禁止使用的，但现在，这两样新生事物在平壤已经相当普及。只不过，政府将外国人使用的电话号段与本地人完全隔绝开，两者间不能通话。但与经济领域的变化相比，朝鲜在政治领域的控制仍然严格，或说是采取了更为精细的管理方式。

朝鲜人无法使用国际互联网，只能使用朝鲜的局域网——光明网。日常生活中，

来朝的外国人依然与朝鲜人完全隔离，不允许和“外事窗口”以外的本地人接触。本来生活在同一个时空的人一直被这样严密地隔绝开来，就好似你不曾到达过一样。

考察进入尾声时，外务省为大家安排了最后一场歌舞表演。偌大的舞台被搭建在大同江边，正后方是标志性的建筑——主体思想塔。夜里温度跌至5摄氏度，大多数当地人都席地而坐，为这场耗时三小时的晚会欢欣鼓舞。舞台上的背景里，轮换着出现三代领导人的画面。结束之际，几朵烟花突然蹿到夜空中绽放开来，一名身着军装的朝鲜人民军战士抬起头，望向还未消散殆尽的烟花。他那消瘦的脸庞，在夜色中忽明忽暗。🌀

平壤之外： 缺少色彩的朝鲜二线城市

特约记者/王强(发自会宁、清津、镜城、明川) 记者/吴如加

金正恩上台之后，很多从平壤回来的人告诉我，朝鲜出现了些许开放迹象。比如，现在可以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入境了，并且能走出羊角岛酒店所在的那座孤岛随意观光，甚至能用手机拍照了。

然而，这样的宽松待遇，我在2015年10月末的朝鲜之行中并未感受到。我选择的咸镜北道与中国接壤，从入境时起，接待方的警惕之心便显露无遗——入境检查时在机器扫描后，朝鲜海关人员还盘查了所有随身物品，甚至连衣角都细细捏过一遍。接着我被明确告知，绝对不允许拍摄除规定景点之外的地方。所有拍下的照片需经朝方人员检查，并需要删掉他们认为不合适的照片。

回想起五年前去平壤时，因为盯防不严，还是偷拍到不少朝鲜普通民众及军人真实劳动的场景，并幸运地将影像带出境。这次的朝鲜之旅在被“严格”审查后，相机里只剩下空无一人的景点、整洁的广场和高耸的领袖铜像。

或许政治中心的“改革新风”还没吹到偏远的咸镜北道，这里与五年前的那个朝

鲜相比，没有丝毫变化，仍是封闭落后、没有色彩的城市与乡村。

罕见的机动车

此行中的会宁、清津、镜城、明川四地均位于咸镜北道，其中会宁与对岸的吉林省龙井市隔江相望，是我们入朝的第一站。从会宁到清津，从清津到镜城，再由镜城前往明川，四天的行程中，感觉到了诡异的寂寥。

大多数时间，我们的旅游大巴是路上唯一的机动车。每当经过盘山公路的弯道时，司机执著的鸣笛总显得多此一举——因为从没有其他车辆与我们相向而行。我猜测，鸣笛或许是为了警示行人，而不是为了会车需要。

作为外国人，要适应的第一件事是无止境的颠簸。这里的基建设施极差，各个城市之间由砂石路连接，但由于公路缺乏必要养护，以至于从会宁到清津短短91公里的路程耗费了两个多小时。

公共交通的缺位，导致普通朝鲜民众出行的方式非常原始。无论是国道或盘山

公路，沿途随处可见骑着自行车，或背着沉重包袱的当地人艰难行路。

相比于中国东北人迹罕至的乡村公路，朝鲜的城际公路反倒显得热闹。清津与镜城之间的国道上，几乎全是骑车和步行的朝鲜人，想找到一个无人之处停车颇为不易。公路两旁是贫瘠的农田，水稻田和玉米地里没有任何农业机械，无论是耕种、收割还是运输全部由人力完成，连畜力车都寥寥无几。

在朝鲜，那些承担有限农业运输任务的牛车和手推车处境尴尬。由于橡胶的缺乏，它们往往无法配备充气轮胎。我曾无数次地将目光停留在那些不幸的轮子上，通常只有光秃秃的轮毂和钢圈，至多在外面贴着薄薄一层胶皮。

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同样缺乏，这与如今的平壤截然不同。作为咸镜北道首府的清津，虽说是朝鲜的第三大城市，中俄两国在此分别设有领事馆，但正常运行的公交车辆同样罕见。清津市区内双向四车道的主干道鲜有车辆经过，没有任何交通指示灯——因为根本不需要，人们出行依赖自行车或步行。



2015年10月20日，中方视角下的朝鲜南阳全景图，画面左侧河流为图们江。此处隶属于咸镜北道，图们江对岸是中国吉林省图们市。

清津是朝鲜国内除平壤外唯一有轻轨的城市，“轻轨”指的是老式有轨电车。清津人颇以此为傲，导游特地介绍，这是清津市的标志之一，欧洲来的游客会乘坐有轨电车游览市区。很可惜，我在行程中并未遇见有轨电车，只有老旧的铁轨和沿街的电轨证明着它的存在。

油料的短缺在这个国家显而易见。朝鲜路上为数不多的“机动车”中，不少是在他国已成历史的木炭汽车。我对其运作的原理不甚明了，只见其后箱的一端装着一个直径50厘米左右的大桶，应是特制的炉子，上面的烟囱一直吐着浓浓的炭灰。这种古老的机动车除了需要司机之外，还得有另一人在旁不时加炭、点火，若动力不足，还需其卖力鼓风。

从会宁到清津的路上，我们的大巴停在古茂山矿泉水厂旁休整。我注意到路边停着一辆抛锚的木炭汽车，车后箱的炉子里喷出滚滚黑烟，遮天蔽日。或许是害怕引来导游的不快，同行的朝鲜族朋友劝我“最好别盯着看”。

精挑细选的窗口

在朝鲜地图上，咸镜北道位于东北方位，以图们江为界，与中、俄隔江相望，东临

日本海，被称为关北地方。迄今为止，朝鲜的三次核试验均在此进行。

如果说平壤是朝鲜的政治中心，距其最远的咸镜北道则是名副其实的苦寒之地。李氏王朝时期，触怒君王的臣子往往被流放至此，类似于沙俄的西伯利亚和清朝的宁古塔。古老的流放传统延续至今，据韩国专门报道朝鲜新闻的DailyNK网站披露，朝鲜人民军前总参谋长李英浩在2012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后，就软禁在咸镜北道的一所将军疗养院里。

由于环境恶劣，咸镜北道的人多是金字塔底的庶民阶层，最无权力，饱受支配。直到现在，出生在咸镜北道的朝鲜人仍被认为是民族中意志最坚者。

**咸镜北道的城市都分享着
同样灰色的气氛与景致——
空旷的街道、单调的建筑、衣
着黯旧的行人。
城市里唯一鲜艳的色彩
来自歌颂领袖的标语，
数量之多，足以让不谙韩语的
人能分辨出歌颂的对象
究竟是金家的哪一位领袖。**

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一书中曾记载，上世纪90年代的大饥荒中，咸镜北道比朝鲜其他地区更早地断绝了粮食供应。韩国民主劳动党对2003年抵达韩国的1281名朝鲜人的调查显示，在朝鲜12个道和直辖市中，来自咸镜北道的“脱北者”占了71.9%。

20世纪初，咸镜北道人烟稀少，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日据时期，大型炼钢厂在首府清津港兴建，直至金氏主政后，它仍是朝鲜境内最大的工厂。日本人还开发了清津南部的罗南地区，那里棋盘式的街道与大型现代建筑多是日据时期的遗产。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津市人口持续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90万，成为朝鲜第二大城市；但在经历了90年代的“苦难行军”之后，这座城市的人口据信已下降到50万，排名被咸兴超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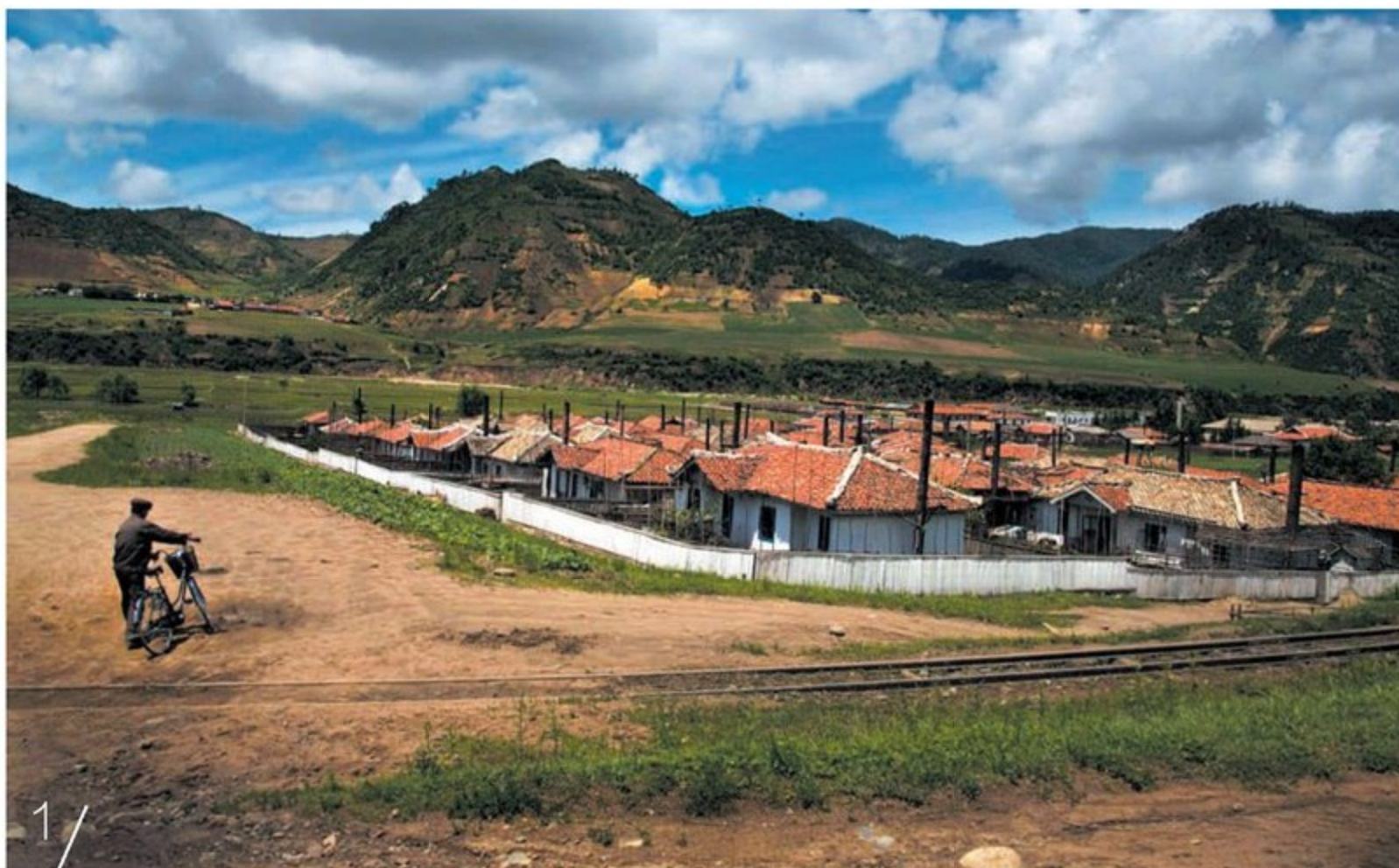
时光在清津倒流，日本人遗留下的炼钢厂近20年来处于彻底停工状态。高耸的烟囱大多沉寂了，使得一度是朝鲜污染最严重的清津，伴随着荒凉，再次回归到天朗气清的田园时代。当我下车时，这里的空气好得完全不像是工业城市。当然，对清津而言这绝非幸运之事。芭芭拉在书中提到，饥荒时期工厂的管理者曾组织工人拆卸机器，



1/ 2014年6月19日，咸镜北道，一名当地农民推着自行车回到村里。在缺乏机动车的朝鲜，自行车是极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2/ 2014年6月20日，咸镜北道，一群朝鲜儿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帮助当地村民填补坑洼。

3/ 2014年6月20日，咸镜北道的一座村庄，朝鲜人坐在铁轨上休息。朝鲜的铁路大多年久失修，火车行驶速度缓慢。由于燃料短缺，大多数的火车也处于停运状态。



4 / 2014年6月20日，咸镜北道金策市，几名当地人走在河道边，两名妇女头顶杂物。一些位于朝鲜东海岸的城市，例如煤矿城市吉州以及相邻的金策曾经充盈着大量钢铁厂，如今这些厂房都陷入了骇人的沉寂。这些曾经的工业城市成为了朝鲜国家版图上的一条锈带，被单调的灰色所覆盖。



然后运到边境贩售，用卖掉设备得到的现金为工人购买食物。这或许可以间接地说明清津是一座富有进取心的城市。

据信早在2005年，清津的水南市场就成为朝鲜最大的市场，商品种类之丰富远超过分拘谨的平壤；2008年，商贩甚至敢于公开抗议政府对市场的限制性政策，以至于这座城市一度被比作旧日的美国西部。

只可惜，市场绝不可能被列入我们的行程之中，我在车窗内看到的，只是一座黯淡之城。

咸镜北道的城市，无论会宁或者清津，都分享着同样灰色的气氛与景致——空旷的街道、单调的建筑、衣着黯旧的行人。城市里唯一鲜艳的色彩来自歌颂领袖的标语，数量之多，足以让不谙韩语的人能分辨出歌颂的对象究竟是金家的哪一位领袖。

相比起沿途破旧简陋的民居，会宁口岸可算得上富丽堂皇。其海关室内装修考究，配有大屏幕的液晶电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卫生间，堪称豪华，质地精良的卫生洁具不亚于国内大城市的酒店。即便是专门招待外宾的平壤羊角岛特级酒店，其设施在会宁口岸面前也只能相形见绌。此后我在朝鲜所见的卫生间都十分简陋，甚至没有自动冲水的马桶。这不是马桶的罪过，而是没有持续的自来水供应。

在前往明川郡民俗村的路上，车窗外掠过一座村庄，那里的房屋低矮、简陋，似乎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与美丽的海滨格格不入。但当我们的车跨过一座小桥到达民俗村时，俨然来到另一个世界。二三十栋朝鲜民居错落有致、建筑精良、宽敞明亮，每座民居就像是海滨别墅。这是朝鲜官方乐于向外界展示的幸福朝鲜，那个玻璃橱窗里的乌托邦。每个家庭都是一座旅馆，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工作——向来自世界各地



↑ 镜城观光分社餐厅外的纪念品柜台，商品种类比过去有所增多。此处的七宝山旅游线路图售价为人民币15元。

的游客展现朝鲜民众的幸福生活。

驶过那座小桥时，我们被告知，这里是民俗村的边界，绝对不允许跨过这座桥。接着导游专门提醒，此前看到的那座破落村庄名为“狗村”，因为村里的狗特别多。似乎借机暗示我们不要试图跨越地界，走近那个村庄。

居住在这里的人显然被精心挑选过，无论男女都衣着入时，营养良好。青少年也和国内普通中学生别无二致。或许对于一桥之隔的“狗村”里的人，这里便像月亮一样遥不可及。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社区，我们获得了唯一自由活动的机会。既能随意转转，也可以去村前的海滩散步。不过导游再次提醒我，拍摄街道可以，但不允许拍人，即使是

村里的人。

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窗口，依旧免不了停电和断水。在咸镜北道，停电是稀松平常的事，接待外国人的旅馆也无法幸免。在民俗村，每家必备一种节能型LED灯和手电筒，夜间城市路灯照明根本不存在，许多公共场所也没有照明系统。我们抵达镜城的温泉澡堂时，天色渐晚，澡堂内一片漆黑。我在墙上摸索了许久电源开关，一抬头，发现天花板上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灯泡。而由于没有持续的自来水供应，无论是旅馆或民俗村，人们都习惯用水槽或水桶储水。

我住在民俗村的一户人家中。一日起来，这家人正用影碟机播放韩语字幕的《功夫熊猫》，两位大人和孩子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哈哈大笑。意外的是，他们并不知

♥ 会宁的金正淑铜像。会宁是朝鲜“国母”金正淑的故乡，金正淑是金日成的第一任妻子，也是金正日生母。1949年其因难产而死，死后在朝鲜备受尊崇。相比之下，金日成的第二任妻子金圣爱的待遇就差多了，1998年之后她的名字在朝鲜几乎再没出现过。



顺出 徐晓

道这部动画片来自美国，而很自然地认为是“中国制造”。

不变的领袖崇拜

如果说，平壤与平壤之外的朝鲜有什么地方完全一致，那就是对领袖的崇拜与敬仰。当我们通过图们江上那座公路桥、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便无法回避领袖们的印记。

在会宁口岸的院子里，竖立着一座画有金正淑英雄形象的纪念碑，色彩鲜艳，画工精美。会宁的特殊之处也在于此——这里是朝鲜“国母”金正淑的故乡。作为金正日的生母，她的形象和对她的赞颂处处可见。

和平壤金日成万景台故居一样，会宁的金正淑故居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虽然那只



↓ 清津市中心的广场上，一对朝鲜新人在金家父子铜像前举行婚礼，这是朝鲜人结婚仪式的重要程序。



↑ 咸镜北道东部的明川郡，民俗村中的一户人家正在用餐。这里是当地唯一向游客开放而且允许游客居住的村落。游客可以随意进入居民家中，与他们交流，并观看他们出海捕鱼等生产生活细节，晚上还能住在居民家中。

→ 民俗村村民家中的2015年版挂历，画中餐盘里是喷香的猪蹄，据称是朝鲜名菜。

→ 清津市幼儿园的儿童正在表演节目。开放旅游的朝鲜城市有不少专供游客参观的幼儿园，儿童表演也成为其中的必备项目，有时台上表演的儿童甚至比观赏的游客还多。



是间草屋，却一尘不染。我刚踏上门口石阶想看看房内的情形，却被告知石阶是不允许踩踏的。一切细节都营造出圣地的氛围，所有和领袖及其家庭相关的事物都显得无比神圣。故居后面的山上伫立着巨大的标语：“向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学习！”

每路过一个稍具规模的城镇，都能看见高高伫立的永生塔，上面刻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导游说，这是金正日将军下令修建的。为了表达对领袖的热爱，这样的永生塔遍布朝鲜全境，每年金日成的祭日与生日，朝鲜民众都要向永生塔献花。

同样遍布的还有领袖的铜像。根据最常被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境内的领袖铜像共计有34000余座，它们耸立在每个

城镇的广场。活着时，他们权柄独操，去世后，他们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神灵。

清津市中心的广场上，同样伫立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巨大铜像。铜像建于2014年，目测连带底座有十几米高。这两座铜像是青岩幼儿园之外，我们在这座城市参观的唯一景点。作为游客，下车之后被告知必须向领袖的铜像献花，每束花要价20元人民币。

领袖们慈祥的目光下，是空荡的街道和老旧的建筑。当地青年男女正在铜像前举行婚礼仪式，他们穿上最别致的衣服，在高大的铜像前拍照纪念。

如今掌权的年轻领袖金正恩，虽不似祖父与父亲那样拥有自己的铜像，却也在街头巷尾的标语中被歌颂着。许多巨大的横幅被挂在建筑物顶端或刷在外墙上，上

与平壤截然不同，咸镜北道的城市公共交通极度缺乏。清津虽说是朝鲜的第三大城市，正常运行的公交车辆同样罕见。其市区内双向四车道的主干道鲜有车辆经过，没有任何交通指示灯——因为根本不需要，人们出行依赖自行车或步行。



面写着：“为了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豁出性命战斗吧！”

我们一行共有六人，随行的朝方人员却多达三位，一位司机、一位专职导游，还有一位被称为服务监督员。朝鲜导游对游客的监视之严格，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五年前去平壤时，除了导游之外并没有专事盯梢的监督员。当年那位导游曾经骄傲地告诉我，朝鲜是个自由开放的国家，早就取消了盯梢制度。

导游和监督员的首要职责，是防止我们走到不该走的地方，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拍下不该拍的照片，除此之外才是对景点的介绍。即便一路上，窗外的朝鲜人多是衣着灰黄，面有菜色。在导游的口中，不断创造

2014年6月，清津通往咸兴的公路上驶过的木炭汽车。外国记者的镜头不被允许对准木炭汽车，这是一张难得一见木炭汽车结构全貌的照片。

高度和体积纪录的铜像和纪念碑成为朝鲜渴望成为强盛国家的注脚。他不允许我拍摄窗外那些低矮的房屋，却指着山上赞颂金正淑事迹的巨大标语自豪地说：“你知道吗，那些字每个都有三层楼那么高！”

平心而论，这位导游是一位真挚而热情的年轻人，面庞棱角分明，显得生气勃勃。攀谈中得知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沿途赶路的黑瘦朝鲜人显然属于不同阶层。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中国文化亦多有涉猎，聊起三国人物如数家珍，说话时总爱在句末加上一句“难道不是吗”，以此渴望

获得积极回应。一路上他对我多有关照，服务亦十分敬业，若以导游的职业标准去考量，实在不应受到任何诟病。尽管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删掉了相机中那些在他看来有损祖国形象的照片。

在会宁，我们的大巴路过一处名为“饮食一条街”的地方。据导游介绍，在领袖的亲自关怀下，新建的饮食一条街别具特色，汇聚了冷饮店、杂碎汤馆、兔肉专馆、豆腐脑馆、玉米食品专馆、炸酱面馆等各种餐馆。

一眼望去，街道干净整洁，两侧亦不乏精美的建筑，唯独缺少行人。车窗内的朝鲜年轻人接着说：“现在经济发展了，我们才能尽情地享受生活，难道不是吗？”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印象绍兴

文 / 冯建荣

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在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有一座独具魅力的城市。她的名字，叫绍兴。

绍兴是充满韵味的山水城

绍兴山明水秀。山的代表，有在先秦典籍上排位中华九大名山与四大镇山之首的会稽山，有唐代大诗人李白由梦游而四游的天姥山，还有峰峦叠嶂、层林尽染的四明山与龙门山。

水的代表，有以东汉时孝女曹娥命名的曹娥江与千百年来多颂歌的浦阳江，有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组成部分的绍兴运河，有筑于东汉时期、堪称当时中国最大人工湖泊的鉴湖。

绍兴真不愧为典型的江南水乡。8279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密布了总长10887公里的6759条河流。其中的绍虞平原，有水面107平方公里，占了平原总面积的13%。

绍兴也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与中国桥乡。中心城区的水面，竟占了14.64%。清朝光绪年间，8.32平方公里的府城内，有37.07公里长的河道与229座石桥。而今，全绍兴尚存古桥703座。

这真是一方山水相融、城水相依、人水相乐的风水宝地。难怪一千六百多年前，书圣王羲之发出了“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赞叹；也难怪18世纪法国传教士格罗塞发出了“使人感到宛如在威尼斯一样”的赞美；更难怪当代桥梁大家茅以升先生发出了中国古桥“几尽见于此乡”的赞誉。

绍兴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早在一万年前，这里便已经栽培水稻，是中华稻作文化的发源地。

四千年前，立国始祖大禹在这里治水成功，会稽诸侯，安葬长眠。大禹陵由此而成了历代中华儿女的祭祖朝圣之地。

两千五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这里卧薪

尝胆，筑城强国，终于成为春秋霸主。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在越地设立了会稽郡，还不远千里，巡越祭禹，留下了不朽的《会稽刻石》。

汉晋南朝时期，这里因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而成为书法圣地，因诞生了越窑青瓷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还是江南的佛教传播中心与全国的铜镜铸造中心。

隋唐五代时期，这里是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好地方。《全唐诗》的2200多位作者中，有400多位慕名而来，流连忘返。

南宋时，宋高宗赵构曾将这里作为临时首都，1131年又将自己的年号赐给这里，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而始。

元明清时期的绍兴，一直是江南的人文荟萃之地，还诞生了闻名全国的两大剧种——婉转缠绵圆润的越剧与高亢苍劲激昂的绍剧。

如今，绍兴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处。数量之多，殊为全国罕见。

绍兴是群星璀璨的名士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誉这里“士比鲫鱼多”，毛泽东主席称绍兴为“名士乡”。

从中华商圣范蠡，到东方哲圣王充；从书圣王羲之，到诗圣陆放翁；从三不朽王阳明，到民族魂鲁迅；从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可谓才俊辈出，数不胜数，绍兴俨然成了圣人、伟人、名人的摇篮。

整个科举时代，绍兴走出了2238位进士，其中文武状元27位。有清一代，以绍兴命名的特殊人才群体“绍兴师爷”，遍涉中央朝廷到地方衙门，以至于形成了“无绍不成衙”的美谈。时至今日，绍兴籍的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有69位之多，在全国地级市中独占鳌头。



这些名人，是时代天空的彩虹，历史长河的砥柱，社会公众的偶像。他们属于绍兴，属于中国，甚而属于世界。

绍兴是物阜民安的伊甸园

越地是丝绸文化的发源地与纺织之乡。而今，绍兴化纤面料的年产量与纺织品的出口额，均占了全国的近十分之一；印染布的年产量占了全国的近三分之一，领带的年产量更是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九。

这里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便已酿出了堪称国酿、天下独绝的黄酒，是中国黄酒的故乡。而今，每年的立冬，还会举行隆重的“黄酒节”。

这里在东汉时便开始产茶。而今，绍兴茶叶远销海内外，年出口量占了全国的近三分之一。

这里生长的数万棵千百年树龄的香榧，既是绍兴的市树，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绍兴还是中国春兰的故乡。养兰品兰，弘扬兰文化，已经成为绍兴人的日常生活。兰花因此而成了绍兴的市花。

绍兴还有新昌“小京生”花生、嵊州小笼包、诸暨西施豆腐、上虞松厦霉千张与章镇小酱瓜等。

这些既充满独特地方风味、又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特色产品，是绍兴人奉献的物华天宝，正在越来越成为消费者的尤物。

山水信是会稽美，无穷胜景君难绘。晋唐心印遗风在，逍遥越中不须回。

绍兴，真好！



中国证监会总部入口处一景。

中共反腐风暴席卷金融界

中共反腐风暴已刮向政商关系盘踞的中国金融界。金融反腐是习近平发起的中国反腐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股市暴跌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针对金融业进行整肃是中共高层的既有布局。

记者/张弛

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掀起的反腐风暴已持续三年，现在正刮向政商关系盘踞的中国金融界。截至目前，包括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在内，至少有20位监管高官落马，多家基金公司被突击搜查，上百位证券公司高管被限制出境。

2015年7月的股市暴跌，引发了由中国证监会主导的政府救市行动。在此之后，中共反腐行动重心便转向金融领域。根据大陆官方宣布的调查结果和警方行动情况，调查对象是一些个人和小型基金，之后逐渐升级到券商高管、政府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信证券、中国证监会以及《财经》杂志相关涉案人员的调查均由大陆公安部门负责，但2015年9月16日张育军被查，则是由中纪委直接介入。有评论称，继完成对政治、军事和石油等领域的强力整肃后，中共已狠下决心，要啃金融这个硬骨头。

2015年10月底，中纪委巡视组正式进驻“一行三会”，开始打击股市“投机势力”。11月10日，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在习近平47字对股市的表述当中，强调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市场监管”。

金融业是公认的国家经济命脉，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只在其他行业反腐，而不涉及金融领域的反腐行为，肯定是不彻底的。”有熟悉内地政商逻辑的人士称，如中共真有决心涉入深水，中国新一轮政经更迭的好戏才刚刚开幕。

调查行动屡升级

自中共把反腐当作国内优先事项，三年来反腐行动从一个领域开展到另一个领域。但201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证监系统高官的频频落马还是令人惊愕不已。

11月13日,中纪委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称,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现年53岁的姚刚,是中国股市建立以来证监会被查处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行三会”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自2002年起,姚刚一直负责该机构最为核心的发行监管部门,其在业界被称为“发审皇帝”、“保荐之父”。据陆媒报道,中国证监会长期以来饱受市场诟病,因为该部门大权在握,能够决定哪些公司可以在市场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而这极易滋生腐败行为。

在姚刚之前,证监会还有多名官员落马,其中包括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等。姚刚的老部下、曾主管主板和中小板的发行监管部李量,也于2015年8月落马。同年6月,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亦因配偶违规买卖股票被移送司法机关。

在监管高官纷纷落马之际,不少金融机构高管也被带走调查。就在张育军被调查前一天,其分管券商中规模最大的中信证券总经理刚刚宣告落马。根据中信证券的公告,公司总经理程博明等3人,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

10月下旬,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在深圳的家中自缢身亡。

11月初,新华社援引公安部报道称,徐翔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涉嫌犯罪。“私募一哥”徐翔被捕震动资本市场,不仅宣告其所操控的洪熙投资的传奇时代落幕,也引发各方对这一事件背后所揭露出的资本市场“黑幕”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姚刚被查是在中央第七巡视组专项巡视证监会之后。2015年10月底,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会议宣布2015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将对包括证监会等31家单位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其中,中央巡视组将在证监会工作2个月,巡视时间为10月31日至12月29日。

11月18日,有媒体报道称,姚刚原下

属、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副队长习龙生近日被带走。习龙生早年曾任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处处长,负责发审委员的排期,目前尚未确定是被调查还是协助调查。此外,姚刚妻子胡蓉晖也于日前从“IPO项目大所”——中伦律师事务所离职。

而刮向金融界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11月26日晚间,中国金融界地震再起。当天18时许,大陆最大券商中信证券发布公告,称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两小时后,国信证券也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消息一出,投资者恐慌抛售,所有券商股都跳水下跌。中信证券和国信证券在停牌之前都已经触碰了10%的跌停降幅。在香港,海通证券停牌之前下跌了3.79%。而另一家深陷泥潭的券商国泰君安,曾为姚刚下属的总裁阎峰依然“失联”。

此前,中信证券和国信证券均被指“做空A股”。至此,始于2015年7月的中国金融“股灾”发生之时,由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指挥、证金公司牵头、国内21家券商组建的“救市国家队”,已有包括“领头羊”中信证券在内的6家券商被立案调查。而之前被中纪委带走的张育军,正是彼时的“救市队长”。

曾有大陆财经媒体援引市场人士分析称,张育军主导“救市”,多次召集券商、基金等业内高管研究策略。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享有信息优势的“救市主力”摇身变成“套利先锋”,颇有点“贼喊捉贼”的味道。

报道称,张育军极力推动的业务创新“两融”(融资融券),余额一度高达2.7万亿元,还有1.4万亿元的配资。巨量杠杆资金推动股市暴涨,但紧随其后是暴跌。而中信和海通在11月29日的公告中,模糊解释的被查原因正是“两融”。

对此,一些证券经纪和市场分析人士拒绝置评,认为事件背后涉及敏感政治。《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则发表评论称,从“国家队”查到“监管方”,

至少可以认为金融领域的反腐已经开始进入深水区。其间利益纠葛波诡云谲,更多的还是藏在水下的暗礁。

而据大陆媒体盘点,即便不算藏在水下的暗礁,截至11月底,中国金融界落马、非正常死亡的高管就有43人之多,银行业中,落马高管12人,其中副行长及以上级别就有8人,而券商领域中,落马人数高达15人。

金融反腐路线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Paul Gillis在接受本港媒体采访时表示,此一轮针对金融领域的调查,一开始是要寻找为股灾负责的人,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清理行业的行动:将操控市场的行为驱逐出去,让市场能够更加公平地运行。他认为,这与中国反腐运动的宏大背景密切相关。

事实上,整肃政商关系盘根错节的的中国金融界,早在2014年3月就已初露端倪。当时中纪委机构调整,纪检监察室的数量增加至12个,其中的第四监察室即负责主导金融系统反腐工作。这也是中纪委首度设立有关金融反腐的专门机构。此外,王岐山还起用黎晓宏执掌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黎晓宏之前曾担任华夏证券董事长、中信建投证券董事长、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等职务。

自2014年,尤其是下半年起,针对银行业的反腐调查就已密集展开,多位行长或董事长级别的银行高管纷纷落马。

2014年3月,北京农商行副行长司伟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6月,许昌银行董事长高志民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内蒙古银行董事长杨成林涉嫌重大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9月,内蒙古农村信用社主任武文元被立案侦查、龙江银行监事长杨进先被调查;10月,恒丰银行董事长姜喜运被调查、内蒙古银行董事长姚永平被立案侦查;11月,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案开庭审理。

现在回过头来看,银行业的反腐其实贯穿了整个2014年。不过,人们当时尚不



201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在北京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

能预测，这场金融反腐风暴最终会刮到哪里。而2015年开年，民生银行与北京银行高管的相继被调查，才令外界意识到，金融业已真正被卷入了反腐风暴眼。

2015年1月底，毛晓峰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中国银监会下发通知，免去其民生银行党委书记职务的消息连夜向外扩散。仅隔几日，北京银行又在2月3日公告，该行股东董事、京能集团原董事长陆海军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这之后，金融系统的反腐步伐更快、出手更高，尤其是在2015年6月以后。因此，有评论认为，针对金融的反腐力度逐渐加大，与几个月前中国股市的大幅震荡有关。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姝威甚至喊出了“股市的肮脏是股灾根源，中国股市需要一场反腐风暴”的口号。

不过，外界更多人认为，金融反腐是习近平发起的中国反腐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股市暴跌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针对金融

业进行整肃是中共高层的既有布局。因为据2014年底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传递出的信息，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在2015年重点完成对金融企业的巡视全覆盖。而在此前的一些相关会议上，习近平屡次强调，作为中央直接委派的巡视组，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当好“钦差大臣”。“无论是谁，都在巡视监督的范围之内”。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近期还加大了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督力度。报道援引一位知情官员的话说，自2015年初，中央政策研究室就开始向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发出指示。这个研究室由习近平的首席政治顾问王沪宁领导。此前，这三个机构一般只对国务院负责。

这位官员表示，此举旨在改善上述三家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因它们监管的行业彼此日益交织。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这些机构规模增加，且

愈加复杂。中国多家银行都将触角延伸至券商和保险领域，而保险公司则将业务日益扩展至贷款方面。

“将重点反腐目标锁定在金融领域，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安稳直接关系到本届政府能否顺利开启新一轮改革和推动其他新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表示，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是，发展尚不成熟且滥权贪腐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就集中在银行、保险、券商、基金等主要金融分支机构。国际投行与评级机构，也不断发布着关于中国金融风险的警报。如此情势下，金融反腐显得格外重要。

2012年，王岐山当选为中纪委书记后，舆论就表现出对其在金融领域反腐行动方面的关注。

作为一位金融系统出身的中纪委书记

记,王岐山早年曾出任央行副行长、建行行长等职务,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又主管金融和商贸工作,成功处理过金融风暴下的广信、粤海事件,外界认定熟悉内情的他将成为金融腐败的“克星”。

两年多之后,当年的预言果然成真。

深挖政商关系

在2015年初毛晓峰落马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这已经令全球金融机构感到不寒而栗,但也仅仅只是个开头。上海财经大学马国贤教授就预测,“毛晓峰是令计划落马之后第一个被调查的金融界高管,不过我认为他不会是最后一个。”至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落马,外界的震惊更无以复加。

而不论姚刚还是毛晓峰,都被证实与已被调查的中共高官令计划有交集。在一些业界观察人士看来,这亦是此轮金融反腐带有的“深挖政商关系”色彩。“调查金融机构高管自身腐败问题的同时,排查其背后的政商关系,金融反腐与政界反腐相辅相成,堪称本轮金融反腐的一大特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说。

梳理公开资料,在2014年被调查的地

民生领导层最年轻的人物。在转型尚未完成的中国,这样的履历和身份,显然能够让他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晓峰选择与权力结盟,使得他在仕途飞黄腾达的同时,终究难逃政治轮回的宿命。民生事件后,一位民生银行高层曾向媒体证实,多年来,民生银行内暗藏着一个吃空饷的“太太团”。其中包括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令计划的夫人谷丽萍、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的夫人于丽芳,以及其他只领工资不上班的省部级官员家属子弟,不下十人。“毛晓峰被调查,并非完全因‘个人原因’。”

至于姚刚被调查的原因,据《财经》杂志报道,可能与其在职期间为拟上市企业IPO提供便利有关。此外,2014年年底,姚刚及其家属被传曾牵涉到北大方正高管腐败案以及令计划案件。根据政泉控股的说法,北大方正CEO李友曾借钱给姚刚的儿子姚亮,用于购买方正证券3000万股股票,后获得巨额收益。

以商牵政,或以政牵商。多位业内人士均对此表达了相同看法,中国自古以来官商难离,紧密且深厚的政商关系,至今广泛渗透于政商两界,“水很深”。金融腐败也一

反省和审视的智慧与勇气。

而对于金融反腐的操盘者而言,要求自然更高:既不能因反腐导致金融地震,又要全面推进整肃。一些熟悉大陆政经逻辑的人士猜测,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反腐首当其冲的并不是金融领域的原因。经济有规律,政治也一样,这个道理习近平肯定知道。腐败要反,但不能操之过急,最好不要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也不要影响社会稳定。那就一步一步来,先稳住军队,稳住经济,再大刀阔斧。不过2015年夏天的股灾,还是令金融系统的反腐决战提前到来。

有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作为中共反腐布局的具体执行者,王岐山上任伊始,针对目前一些大案要案多涉及经济、金融领域事务,就要求纪检干部尽可能多学一些财务、经济、金融知识。王认为,纪检干部知识结构一定要全面,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查案情况。他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行业内的内行、学者。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忆,王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

有外媒报道称,中国希望到2020年把上海建成像纽约和伦敦那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拥有一个干净的金融系统非常重要。而无论是习近平力推的吏治整顿,还是李克强主管的金融改革,都离不开一套廉洁高效的金融管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金融反腐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后监管和处理肯定也有震慑作用。但如果决策层能够以此为切入口,制定完善防止腐败的相关基础性制度,中国资本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在上一轮政经更迭中,倒下的行长包括朱小华、王雪冰、张恩照,而这一轮风雨欲来,毛晓峰也好,姚刚也罢,或许仅是开头。起码到目前,刮向金融界的反腐风暴没有丝毫平息迹象。11月26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席审计官马仑在办公室身亡。就在5天之前,他刚刚被宣布接受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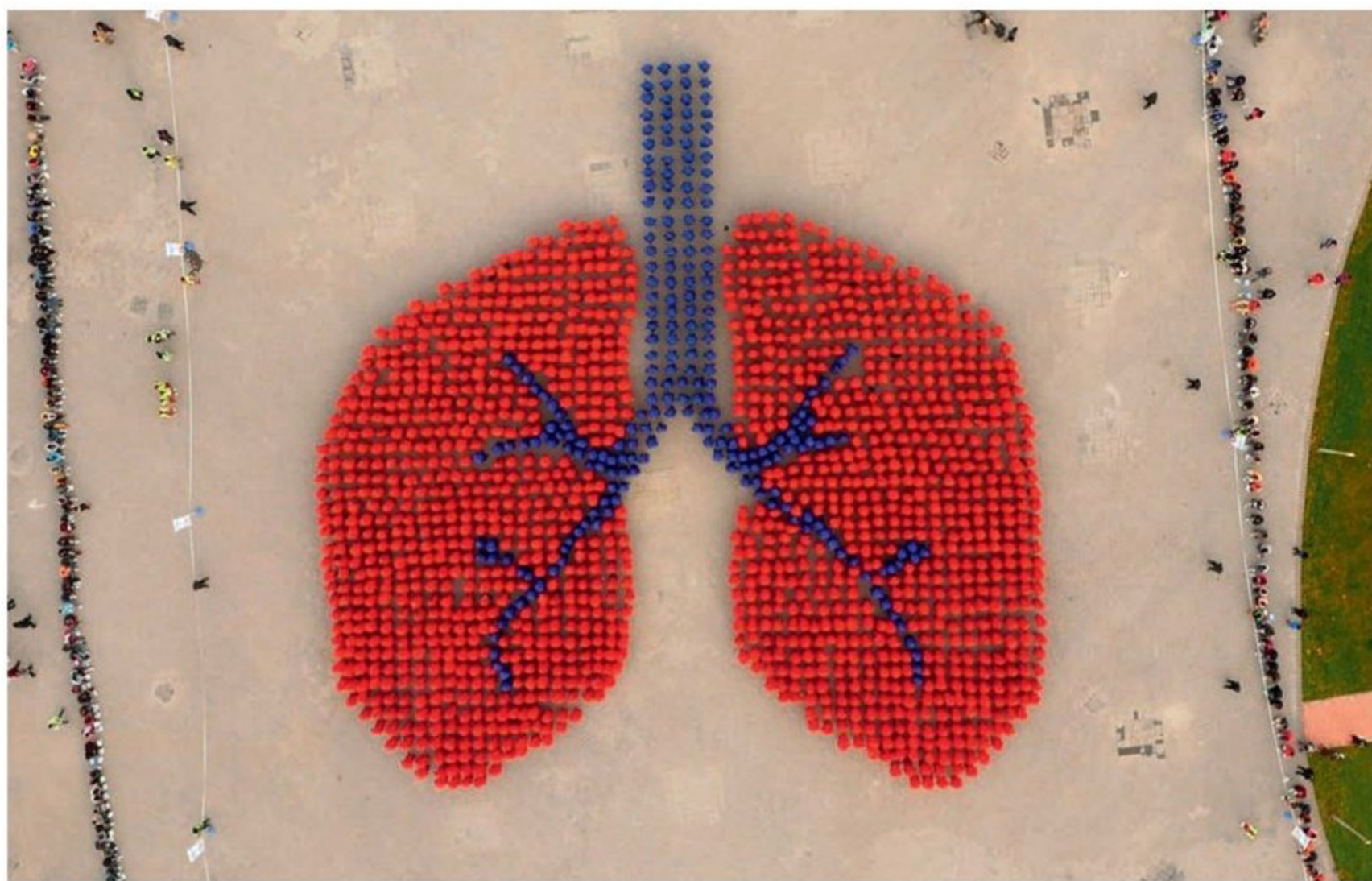
整肃政商关系盘根错节的中国金融界,早在2014年3月就已初露端倪。当时中纪委机构调整,其中的第四监察室即负责主导金融系统反腐工作。这也是中纪委首度设立有关金融反腐的专门机构。

方银行高管中,有半数以上为厅级官员,其中多人有在当地党政系统任职经历。其中,2014年9月被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的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社原主任、党委副书记(正厅级)武文元,就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

毛晓峰更不用说。在弃政从商之前,他曾是团中央系统的政治新星,早年间拥有风生水起的仕途生涯。2008年4月担任民生银行副行长,同时兼任董事会秘书,是当时

向被视为“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专业领域。在新股上市前进驻,暴力拉升股价,在添加多重杠杆后抽身而退,来钱速度极快又体量极大。

从本轮高层的反腐安排与布局上看,这一迹象或许更加明显。有评论人士认为,遍察中国的金融行业,在集团层面、在高管层面,从已知的案例来看,互相之间无不有着千丝万缕微妙的勾连,如何杜绝“藕断丝连”,除了拔除一根根腐败的坏树,还要有



地方政府的吉尼斯冲动

如果将破纪录看成是广告营销活动，大陆各级地方政府长盛不衰的吉尼斯热就不难理解。因为，这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

特约撰稿 / 蒋保信

在一个雾霾天，一场旨在呼吁人们注重肺部健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活动，让人颇感讽刺。

2015年11月15日，整个北京笼罩着浓厚的雾霾。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于此两天前发布的“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并未解除。中午十二点半，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官方微博称，空气仍处于重度污染，建议人们减少室外活动。

此时，来自北京各高校和其他单位的近2000名志愿者已汇集到位于北京市丰台

区的园博园内，他们将要用人体的摆成肺器官图案，以此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是“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启动仪式上的一个活动，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和疾控局联合指导，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活动的总负责人陈先生称，该活动是为了呼吁人们注意烟草对肺部健康的损害，迎接11月18日——世界慢阻肺日的到来。

为了参加这个活动，40多岁的林女士一大早就赶来了。可是，她感到很不解，“我们

顶着雾霾，在这儿站好几个小时，这不就是对肺不好吗？”

戴着口罩的吕先生也是参与者之一，他说自己的肺本来就不好，因为这几天空气质量差，只能戴着口罩来。“但一会儿活动正式开始后，就不让戴口罩了。”

下午两点，参与者开始排队，逐一进入事先规划好的拼图场地，穿好主办方发放的蓝色或者红色的雨衣，戴上帽子，弯腰坐在指定的小板凳上。几经调整，灰色的天空下，顿时出现了一幅由左右两片红色肺叶和

◀ 2015年11月15日,北京,千人组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在丰台园博园内举行,来自高校及社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下午3点10分左右,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Dunn,音译)女士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人体器官图案挑战成功。

蓝色肺管组成的巨大肺部图案。

通过航拍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Dunn)女士确定队形符合挑战要求,主办方宣布挑战正式开始,并要求参与者在五分钟之内严格保持队形。五分钟后,邓恩在查看航拍照片和视频后宣布,此次活动由人体拼成了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图案,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过,一直在现场围观的市民赵先生却表示,他不明白这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什么意义。还有围观者说,“组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财力物力,感觉有些浪费。”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舆论热议。由于最近全国各地频频举办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人们不得不以审视的眼光来打量它。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举动背后,潜藏着哪些理性的动因?

地方政府的吉尼斯热

真正使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公众话题的,是“扬州最大份炒饭”事件。

2015年10月23日,扬州市邀请300名中外嘉宾,共同烹饪了一份总重量为4192公斤的扬州炒饭,成功刷新了“最大份炒饭”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活动结束后不久,即有现场视频曝出,工人们正站在炒饭上,挥舞着铁铲,将炒饭装入垃圾车。在汹涌舆论的追问之下,主办方承认确有150公斤扬州炒饭被拉去养殖场处理,这项世界纪录因此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取消。

2015年恰逢扬州市建城2500周年,主办方本想借这场挑战活动,“发挥扬州炒饭的影响力,扩大扬州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提升名城扬州旅游的吸引力”,不料却“赔了夫人又折兵”,遭到了几乎全国舆论的谴责。大陆媒体纷纷追问,用“钱海”和“人海”堆积出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何意义?荒唐的活动背后,谁是推手?中纪委机

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称,“扬州最大份炒饭”事件轰开了一些地方争抢“世界之最”背后的黑洞。

《凤凰周刊》梳理近些年的公开报道发现,从首善之都北京,到国家级贫困县,都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活动乐此不疲。近年来,至少有北京、湖北、江西、吉林、贵州等15省市的政府部门组织过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网站上,仅2015年9月和10月,就有四个地方政府主导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活动。记者在百度上输入“吉林 吉尼斯世界纪录”,发现近年来吉林省至少有三个地方政府参与挑战活动。某市在其每年都举办的菊花花会上,从2010年起,已连续六年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纵观各类由地方政府主导产生的挑战活动,往往都以“最大规模”取胜,只要能调动足够多的人参加活动,按照一定的规则,就能轻易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探究地方政府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目的,一般都是为了展示城市形象、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借此推动旅游发展。

隶属于贵州省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册亨县为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11月29日,册亨县政府组织了来自各中学的近万余名学生,身着布依族传统服装,手持鼓舞,先后表演了

大陆媒体纷纷追问,用“钱海”和“人海”堆积出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何意义?荒唐的活动背后,谁是推手?

“竹鼓舞”和“转场舞”,成功挑战了“最大规模竹鼓舞”和“最大规模转场舞”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时任县长的邓启鹏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吉尼斯世界纪录能让全世界都知道布依族的优秀文化,他们希望借此打响布依族文化旅游品牌。

2015年10月22日,江西省南昌市一江两岸共293栋建筑参与联动表演的声光秀,刷新了“最大规模的固定性声光秀”吉尼斯世界纪录。南昌市官方称,该活动的目的是表

现南昌城区在布局、建筑 and 科技方面不凡的成就,提升城市形象。

地方政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是如何立项的?地方政府为此花了多少钱?资金来源何处?如何评估活动效果?记者致电多家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这些问题均遭拒绝回答。南昌旅游集团是2015年江西南昌“最大规模的固定性声光秀”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活动主办方,一位办公室主任甚至不解地追问记者:“你问这些有什么意义?”

江西省一位体制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各地方政府喜欢举办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活动,它的冲动来自于想搞个噱头做旅游,以此带动经济。”但她认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并不能真正促进旅游的发展,可是官员在做决策时,并不会论证这一点,只有当错得很离谱时,他们才会发现问题,可那时已经晚了。

吉尼斯的中国生意

自1955年第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问世以来,其逐渐风靡于世界。不过,吉尼斯世界纪录传入中国,则是改革开放之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中华区总裁罗文(Rowan Simons)告诉《凤凰周刊》,中国人是在1980年代才通过一些世界新闻知道了吉尼斯世界纪录。199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相关电视节目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人们才真正了解它。

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罗文介绍说,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是个关键节点,从此之后,每逢国家举办大型盛会,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会参与到打破纪录的行列中。

2009年8月8日,为了庆祝全民健身日和奥运会举办一周年,北京市体育局在鸟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武术表演,共33996人参与,成功获得“规模最大的武术表演(单场

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罗文说。

为满足中国各地政府、企业、社群和个人日益增长的需求,2012年11月,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此后,中国地区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数量逐年稳步增长。2015年,在中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到了大约1000份申请,其中有15%来自于政府和企业。吉尼斯世界纪录纪录管理部门总监王晨(Charles Wharton)表示,“依每年打破纪录数字来看,仍然有增长空间。”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申请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免费的,可以通过其官方网站按程序申请,但至少要等上12周才能收到回复。不过,申请者也可以走“快速通道”,只要支付6000元,就可以在3个工作日内收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回复。

凭借其几十年来所建立的权威和积淀的公信力,吉尼斯世界纪录早已发展出了一套基于认证而形成的商业模式。吉尼斯世界纪录大中华区商务总监费为民(Blythe Fitzwilliam)曾在公开报道中表示,客户永远不可能花钱买到一项世界纪录,但他们有专业的商务部,可以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挑战项目。

对地方政府而言,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都具有门槛低、投入小、回报大、易操作、周期短、灰色空间小等优势,最关键的是一定成功,而且立竿见影。

启心(中国)整合营销机构总经理卢东曾促成多家企业与吉尼斯世界纪录合作。他说:“只需留下联系方式,他们就会随时为你提供挑战纪录的想法和活动创意,当然得付费。”

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服务和收费标准有所区别。2013年,费为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解决方案类的服务门槛是4.5万元”。而在2015年6月《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中,费为民称,“纪录挑战咨询以及邀请吉尼斯认证官现场认证和颁奖

的基础费用仅为8.5万元”。

地方政府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合作,多为商业服务项目。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网站上,江西南昌、四川九寨沟、江西瑞金、贵州册亨、浙江杭州等地方政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案例,都被收录在其网站“最新商业新闻”栏目中。

吉尼斯世界纪录方面并没有正面回应,地方政府成功挑战一次纪录所需的花费。从公开资料中,也难觅准确的数字,但可以从企业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合作中略窥一二。

据《环球企业家》报道,2012年5月,吉尼斯世界纪录为MINI中国策划了一个“前后距离最短的汽车漂移入位”,车手驾着一辆刚上市的MINI,以漂移的方式停入两车之间,前后车距仅为15cm。至今,这仍然是一个津津乐道的成功案例,业内人士评估这项挑战至少能产生100万美元以上的广告效益,而MINI付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费用仅为20万人民币。

2015年初,在广州蓓蕾剧院,一家民营美妆公司组织了1231人同时敷了5分钟面膜,打破了最多人同时敷面膜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称这家公司为

此花费了20多万元,其中包括吉尼斯世界纪录咨询和认证的费用。

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中国火爆的市场,也催生了一些行业追随者,如上海大世界基尼斯、切尼斯世界纪录、扛旗世界纪录、世界纪录协会。同为认证公司,它们的商业模式几乎一致,如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的盈利模式,同样包括纪录申报、出书、与电视台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等。

值得一提的是,因“切尼斯”和“吉尼斯”存在混淆性相似,吉尼斯世界纪录于

2010年向美国国家仲裁院投诉切尼斯世界纪录侵犯其域名,并于2012年向中国商标局投诉要求撤销切尼斯的商标注册。由于域名和商标的性质以及适用法律的不同,美国国家仲裁院裁决切尼斯世界纪录可以保留其域名,但中国商标局裁决切尼斯在中国的商标注册应予撤销。

地方政府为何争破纪录?

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王晨看来,这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使然,因为人类都会有想要展示出自己、公司、甚至国家在某特定领域是“世界之最”的需求。而大众参与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特别的文化和传统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庆祝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认为,这跟中国人的不自信有关。中国社会历来注重外在认可,吉尼斯世界纪录虽然不是联合国的官方认可,但也是世界级的,是高于国家级的,这就像世界名牌一样能让人感到自豪。

其实,如果将破纪录看成是广告营销活动,各级地方政府长盛不衰的吉尼斯热就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为了提高城市知名度、招商引资、带动旅游,还是宣传主政官员的政绩等,对地方政府而言,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都具有:门槛低、投入小、回报大、易操作、周期短、灰色空间小等优势,最关键的是一定成功,而且立竿见影。

在现有体制下,各地方之间实际上是处于竞争关系,怎样在相对有限的各种政治、经济、媒体等资源竞争中脱颖而出,是时刻考验众多地方官员的难题。破纪录则为这些官员提供了一条“终南捷径”。

破纪录活动通常是作为地方上某个展会或活动的一个环节出现的,目的是提高其曝光度。地方政府前期只需结合所要宣传推广的主题,政府自己或委托有关企业策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点子”,联系并向吉尼斯等认证机构缴纳相关费用,在本



地协调场地、购买服装道具并组织群众参与，活动当天邀请几家媒体进行报道即可。由于所破纪录多是关于人数或某些物品数量，因此不可能失败，只要“点子”新奇、有趣，本地乃至全国媒体就会大肆报道。参照企业破纪录约几十万元的费用，地方政府通过破纪录的投入产出比，远比在媒体刊登广告等营销手段要高得多。

如201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各地都组织了相关纪念活动，如何能从众多的会议活动中脱颖而出，被上级领导和社会大众关注，破纪录再次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选择，万人读革命诗歌、巨幅空中海报展示等破纪录活动，就成功吸引了媒体关注。

不过，由于“最大份扬州炒饭”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人们对地方政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多持批评态度。

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主任竹立家这样对《凤凰周刊》说，“这是一股歪风，要坚决刹住！”在他看来，这不仅不能促进旅游，而且还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公共财政和资源，“是一条歪道”。

但在毛寿龙看来，这并非歪风。尽管他认为地方政府出面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是越位行为，但在中国的文化制度都没改变的情况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地方政府应从“最大份扬州炒饭”事件上吸取教训，因为地方政府具有公共性，必须站在公共立场上，要能代表核心价值观，不要伤害社会美德。否则，就会留下恶名声，赢了市场，输了人心，以后要给人好印象，就不太容易了。

毛寿龙建议，政府应该让市场去决定，让社会组织、企业或者个人去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于大型活动，政府可以提供一

2014年11月29日，贵州省册亨县政府组织了来自各中学的近万余名学生，身着布依族传统服装，手持鼓舞，先后表演了“竹鼓舞”和“转场舞”，成功挑战了“最大规模竹鼓舞”和“最大规模转场舞”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些安保活动，避免出现人员踩踏等事故。如果地方政府非要举办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在公共财政和项目资金方面，需要做到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在上述江西省体制内人士看来，如果政府的第一任务还是发展经济，地方政府还会继续热衷于吉尼斯世界纪录。她说：“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政府转型做服务型的政府。我们不是正在建设法治社会吗？那么，法律规定了的，政府就该按照法规去做，法规没有规定的，政府就不能去做，放手让民间社会去做。”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黄静

重度采暖霧霾何日散去？

因建筑用能和采暖带来的雾霾似乎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这一切正在改变，主要的变化因素有二：持续走低的建筑能耗和正在转变的能源结构。

文 / 许鹏（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学院教授） 耿丹（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研究员）

每年深秋时节是内地渐渐进入雾霾天气频发的开始。随着采暖季的开始，黄河以北大面积开始燃煤取暖。2015年的初冬更是屡屡突破新高，沈阳雾霾一度突破1400微克每立方米，北京11-12月份数次持续多天雾霾浓度超过500微克每立方米的爆表值。

采暖对雾霾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方面大量的学者做过统计工作。全国供热采暖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10%，而北方地区约占总能耗的20%。每年北方地区采暖燃煤总量是1.3亿吨，相当于供暖地区一个家庭差不多一个冬天要烧一吨煤。所以燃煤采暖的方式不改变，北方地区很难在冬季能够有效地控制燃煤总量，改善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乡建筑面积大幅增加。当前，建筑业是中国的能耗大户，如果不考虑建筑材料的生产能耗，建筑能耗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2%。建筑总能耗的持续攀升增加了电力需求，也加剧了燃煤发电带来的污染。

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因为建筑用能和采暖带来的雾霾将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一切都在改变，主要的变化因素有二：

持续走低的建筑能耗

中国的建筑用能情况总体上由四部分组成：城镇供暖用能（以北方为主）、城镇住宅用能、商业及公共建筑用能以及农村住宅用能四类。从用能总量上来看，呈四分天下的局势，四类用能各占建筑能耗的1/4左右；从面积上来看，随着建筑规模的增长及平均能耗强度的增长，公共建筑能耗已经成为中国建筑

能耗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

中国的建筑技术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距离发达国家的建筑整体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就北方采暖而言，是中国各类建筑能耗中唯一持续走低的一类。下图为过去十多年中国公共建筑和北方采暖能耗的变化图。

采暖能耗从十几年前的22千克标煤每平方米的水平下降到12千克标煤每平方米，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能耗的显著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新建建筑采用了更高的节能标准；另外一方面是北方地区大规模的既有建筑改造，把原来没有保温的建筑加上了外保温。在北方的主要城市地区，目前室内的舒适度环境已经达到了18度以上的水平，所以未来能耗的增长空间基本上没有了。

在可预见的未来，采暖能耗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北方地区采暖平均耗能是气候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随着绿色建筑普及率的提高，特别是最近兴起的德国被动式建筑技术，建筑的外围护结构保温性能还会进一步提升。根据计算，在中国的寒冷地区，被动式建筑的采暖能耗可以基本降到接近于零的地步。也就是说，除了中国的严寒地区（东北、青藏）以外，建筑将逐步不需要采暖。即使在严寒地区，被动式建筑或者是保温性能极高的建筑也可以把采暖能耗降低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能源的供应形势也正从单一的燃煤或者燃气转变为集中电驱动的采暖功能系统。如天津等地开始大规模兴建地源热泵的集中式供热站，取代以前的燃煤热力站。地源热泵的综合效率可以达到

300%以上，也就是说一度电可以生产出相当于三度电热值的采暖热水。这一方面减少了能源的使用，一方面会显著降低燃煤量，让中国的北方地区摆脱冬季大量燃煤的问题。

建筑能耗的第二大板块——公共建筑的能耗目前在发达城市已经接近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未来的上升空间也十分有限。公共建筑的能耗主体是照明和空调。照明能耗随着LED灯的广泛普及和进一步的技术进步，未来也会持续下降。空调能耗目前还是在增长通道中，但是这一趋势也会被扭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冷机的制冷效率在进一步的提升中，而且集中式冷站在全国也方兴未艾。在江苏省，正在规划兴建中的集中式冷站已达100多个。由于集中式冷站采用能源的梯级利用，综合效率可以在150%~250%之间，远远超过目前的单栋建筑使用的分散式冷站。

正在转变的能源结构

中国的能源结构长期以来倚重煤炭，尤其在2003到2013年，伴随水泥、钢铁等行业的极速发展，煤炭消费量从14亿吨暴增至40亿吨，2015年煤炭消费占比仍为64.5%，燃煤排放被证实是大气污染和雾霾的首要来源，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

中国政府意识到煤炭消费过高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全球能源清洁革命的必然趋势，下定决心调整能源结构，把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作为主攻方向，并提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

2030年达到20%的目标。目前,在政策支持下,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呈现良好势头,主要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2%,以及较为清洁的天然气,消费比重约5.8%,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新增电力结构中有超过20%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水

电仍保持主力军的地位,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后来居上增长最为迅猛。

电力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主要途径,因此未来中国能源结构清洁化调整将通过电力转型来实现。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预测,未来电力将成为中国生产生活的主要用能方式,

电能将在工业、建筑、交通领域实现对直燃煤、燃油、燃气等化石燃料的高比例替代。

2050年全国60%的终端能源需求可以通过电力满足,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而可再生能源将成为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超过80%,由此通过电力清洁化实现能源消费的清洁低碳转型。与此同时,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费得到有效控制,煤炭消费也将以发电为主要途径,并通过集中治理并使用清洁燃烧技术提高发电效率,降低污染排放。

中国实现以可再生能源电力为主的清洁能源系统看似遥不可及,但在未来20-30年间的实现路径已逐渐清晰。世界能源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2012-2014年可再生能源已占世界新增电力装机的48%。延续现有的技术进步路线,未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与规模化效益共同推动发电成本降低,成为未来绿色能源电力系统的主要电力供应来源。

中国将通过深化电力体制改革逐步放开售电侧市场,实现竞价市场机制下的电力市场化交易,使风电和太阳能电力的经济性优势得以彰显。加之储能技术的成本下降和智能电网、需求侧管理系统的完善,使风电和太阳能电力的波动性得以控制,满足稳定的基荷电力供应需求,并更好地调节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实时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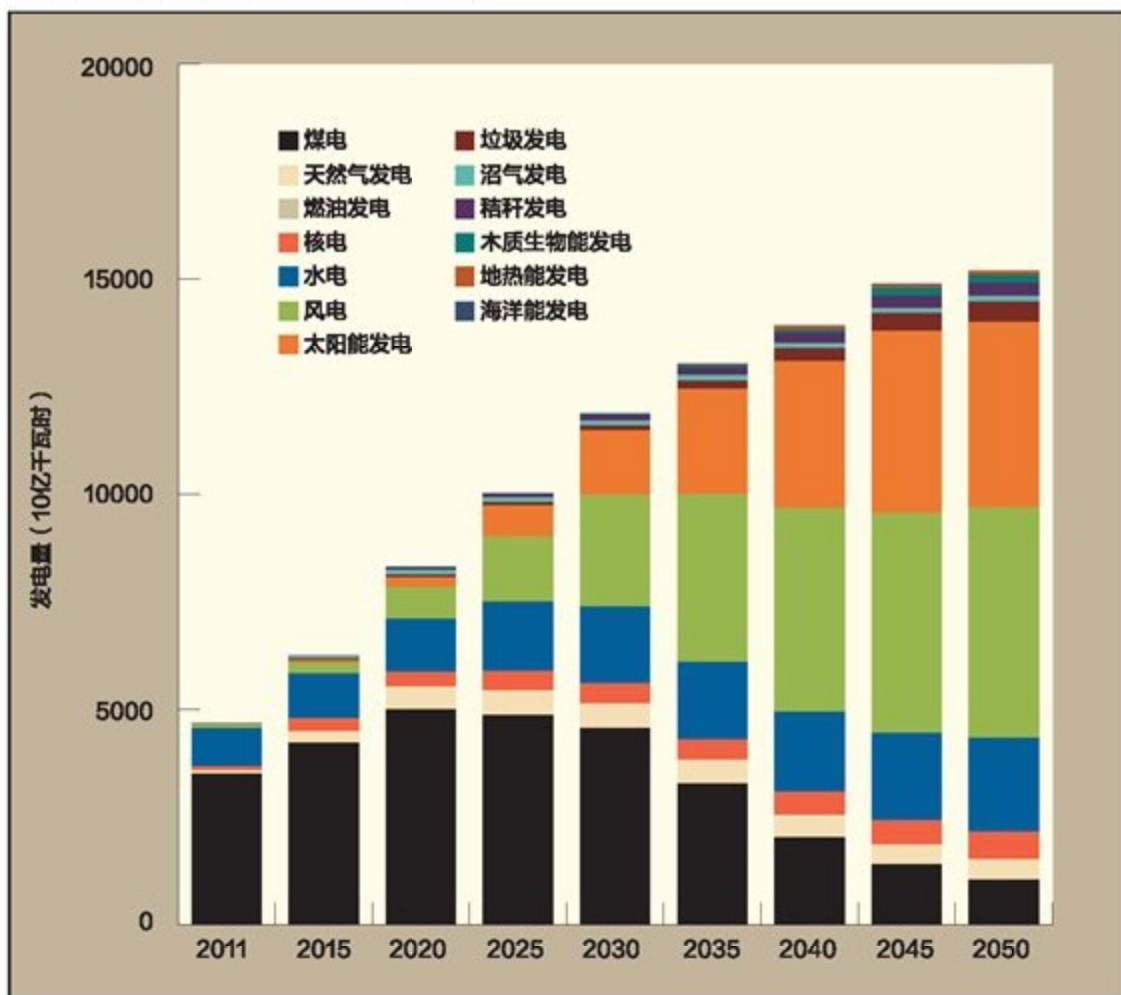
未来中国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将呈现集中与分布式发展模式并举。远离东部负荷中心的集中式电站在电网区域互联传输基础设施的支持下,在更大的调度区域范围内平衡负荷变化,从而获得更充分消纳。以建筑为载体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供能系统集中在中东部能源消费密集地区,在成本经济性和储能设备的保障下更加势如破竹。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预测,203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供应系统,将使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显著降低到1980年的排放水平,雾霾终将散去,重现碧水蓝天。

中国公共建筑和北方采暖能耗变化图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情景发电量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

□ 编辑 李光 □ 制图 美编 黄静

一台空气净化器 艰难进校之路

记者/孙杨

“进了教室一刻别耽误,马上把机器拆封安装,只要生米煮成熟饭,再想反对就难了。”2015年12月14日下午3时许,北京的一场雾霾刚刚散去。朝阳区一所公立小学即将放学,校门外汇集着大批来接孩子的家长。张梦等七位孩子在同一个班级的家长也夹在人群中。不过,他们不仅仅是来接孩子回家的,还带来一台空气净化器,并准备突破“封锁线”送到教室里。

为了将这台净化器摆进教室,张梦和班上的多位家长,已经“斗争”了三个多月。

最淡定的家长也坐不住了

张梦的女儿,就读于朝阳区该公立小学的一年级。2015年9月,刚刚开学不久,受家里教育知道重视健康问题的她发现,眼看着雾霾最严重的冬季即将到来,教室里并没有安装空气净化器。

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张梦,近年不仅目睹了雾霾日趋严重的过程,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和家人健康情况的变化。“入冬后全家人都经常咳嗽,且每次都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张梦说,但是自从用上空气

净化器,大家的咳嗽都缓解很多。“我的家里有两台净化器,公司也有。”她说。

在班主任和全班40余位学生家长都加入的班级微信群内,张梦经常转发一些雾霾危害和防护知识的报道和研究,还提议应该为孩子们教室安装一台空气净化器。不过,北京秋天的雾霾尚不十分严重,家长们有的不太重视,有的对净化器防霾

2015年12月7日,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学的学生在教室内做课间操。12月7至9日,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橙色预警。市教委启动应急预案,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必须停止户外活动。



效果、安全等问题有些质疑,所以讨论过后并未形成共识,便不了了之了。

“十一”黄金周刚过,10月8日的北京,就迎来了入秋后第一场严重雾霾污染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黄色预警。空气污染再度成为家长群里的热议话题。张梦随即表示,愿意个人出资,为孩子所在班级安装一台净化器,并请班级家长协会主席代为向老师转达。她的建议,得到了一些家长的响应。

但是仅仅几天后,班主任尚老师就在班级家长会上,以校方认为空气净化器不是学校标准配置,不属于校方资产,按照有关部门相关规定,不允许随意接受社会捐赠等理由,回绝了家长们的提议。

听到校方的这个表态,很多家长都退缩了,毕竟不值得为了一台净化器与学校较劲。包括张梦自己,也不希望将关系闹僵,所以买净化器的事情又淡化下来。

11月27日,北京出现了2015年最严重的一次雾霾污染天气,在持续5天的污染天气里,PM2.5峰值连续爆表,突破500大关。

这一次,就连此前一度表现淡定,没有表过态的家长们也坐不住了。“大家都觉得雾霾确实是个威胁孩子健康的大事了。”张梦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尽快给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的呼声一下子高涨起来,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也更加具体,例如什么品牌、价位和功能的机器更适合在教室内安装,净化效果到底有多大;如果为了用净化器导致孩子处于封闭空间,会不会产生其他健康隐患等。

“如果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永远不能达成统一意见,总要有人先行动起来。”张梦说,对法律比较熟悉的她,立刻将大家的主流意见,以及其他班级的经验搜集起来,初拟了一份简单的协议。

这一次,净化器由个人捐赠改为集体租借。即由家长集体自愿出资购买,然后作为资产共有人将机器借给班上孩子使用,协议还特别对一些家长提出的安全、责任、费用等方面问题作出解释。

“先把协议发送到微信群里,然后逐一给40多位家长发私信,请他们在群里

表态是否支持,有的没回复,我就再发几次。”张梦说,为了完成这件事,她特意放下工作,抽出一天时间专门用来联络家长,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家长们尤为心齐,到第二天下午为止,就有近40位家长明确表示同意安装,并愿意均摊费用。

得到大家的支持后,张梦还向班主任尚老师征求了意见。“老师给我的答复是,家长这么热心,她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对孩子健康有利的事情,值得表扬。”张梦说,实际上,家长们讨论协议的全过程,同在群里的老师是全程知晓的,从未提过反对意见。

12月8日,新一轮重度雾霾入侵京城,这一次,北京市官方历史上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的最高预警——红色预警;北京市教委也史无前例地发布了“停课”的紧急通知。

这次家长们都觉得,事情一刻也不能再耽搁了。于是很快便锁定了购买品牌和价位,期间,依据家长们提出的问题,张梦还多次修改了协议条款,不仅对品牌、型号、价格、费用、资产共有人、责任人等问题明确标注,还安排好了不同的家长分别负责定期维护、收费、协议公示和保存等细节,甚至为六年后小学毕业,或者中间有人转学,机器和费用应如

张梦甚至还已经做好了为孩子转班、转学的心理准备。和其他家长一样,她也担心因为自己的坚持,令孩子的身心受到伤害。

何处置做了解释和安排。为了尽量少花钱,张梦还通过公司关系拿到了团购价格。

12月11日,在其他几位热心家长的帮助下,班上超过90%的孩子家长签字,手握签名表,张梦再一次向班主任征求意见,尚老师表示,既然大部分家长都同意了,那么周一带着净化器和协议来教室安装就可以了。

一票否决

12月12日一早,净化器到货了,兴奋的张梦立刻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其他家长,但

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麻烦也随之而来。

下午,班主任突然通知张梦,因为有家长找到她,表达了不同意见,所以净化器暂时不宜安装了。

“之前讨论阶段,明明没有人说反对,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听到老师的最新决定,张梦和大部分家长都疑惑不解。“我们都觉得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不能放弃,必须要知道是谁,然后与他再解释和沟通。”张梦说。

虽然班主任应对方家长的要求,拒绝透露身份信息,但是经过反复分析和排除,大家认定,反对者可能来自迄今没有公开表示支持的极少数家长中。但是经过进一步沟通后,大家了解到,其中几位家长系因不愿出钱,所以没有表态,但私下均表示过不反对,只有一位家长从头至尾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只是对行动提出过很多质疑。

最终,大家一致将目标锁定在这位家长身上。张梦仔细地翻查起之前与这位家长的私信留言,发现对方先后提出了如果自己的孩子把机器弄坏了如何赔偿、是否会漏电、协议是否缺少执行和细节等问题提出过质疑。但是每一个问题均已经由张梦做代表逐一进行了解释。

班主任告诉张梦,对方这一次对由家长自行为公立学校教室安装净化器程序是否违规、没有校方签字的协议是否有效、协议有没有进行过公示、选购品牌是否得到老师的同意、如果出了问题如何追责、赔偿等问题提出质疑。但是当张梦耐心地再一次站在法律的角度给老师做出解释,并提出大家可以面对面地进行沟通时,却再次遭到了老师以对方身份需要保密为由的拒绝。

老师突然改口拒绝的消息传来,家长们在微信群里一下炸了锅,有的表示不能理解所谓

的反对理由,有的则对老师处理矛盾的方式提出质疑。大家一致决定,派七位家长做代表,不论用什么方法,先把净化器搬进教室再说。大家盘算着,只要送进去了,就不容易退回来了,使用一段时间后,更是变成既成事实。

但是,后来几天事态的急转直下,向家长们证明,“对抗”不会这么轻易的结束。

当天傍晚,回到家的张梦就接到班主任打来的电话,声筒那头,尚老师情绪激动地质问家长为何未经允许就把机器安装,并要求她立刻来学校一趟。在遭到张梦的拒绝后,又致电其他几位家长代表,第二天务必来校解决问题。

事后,一位家长回忆,在校领导、年级领导和家长们面前,班主任委屈地指责家长的做法是拆她的台,令她难堪,甚至一度因难以控制情绪而离席。

对此,现场的校方负责人则表示,净化器必须经全班家长同意才能使用,可暂时保存在老师办公室至周末。并且还要求家长承诺,今后不在班级微信群里议论,或在校内聚集讨论此问题。

眼看三个月的努力即将前功尽弃,张梦和几位热心家长都异常气愤,更令张梦愤怒的是,自己的女儿也被牵扯进漩涡里。周三晚上放学,女儿告诉她,白天班主任特意找到她带话,“告诉你妈妈,以后不要再管这件事情,学校会有自己的安排。”看着女儿用稚嫩的声音模仿着老师的语气,张梦心里异常难受,不由得担心自己的坚持,是否会让女儿在班里受到孤立和伤害。

一场没有对手的战斗

12月18日,一位细心的家长经过探访后带来的新消息,令家长们更为气愤和焦虑。原来,在该年级全部10个班中,只剩下自己孩子的班级没有安装空气净化器了。

就在同一天,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再度发布最新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指令,北京市教委紧急通知未来四天,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直属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高等院校停止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

与此同时,班主任也给家长代表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周末前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将不再代为保管净化器,请家长搬走。

雾霾中,家长们再一次行动起来,于21日、22日学生停课期间,继续与校方沟通,截至12月22日晚,家长一方的坚持终于获得了暂时的“胜利”,校方口头答应,在家长们签署一份学校免责协议之后,可以把净化器搬入教室使用。

“如果说之前的事情,让我很愤怒,那么现在,我只有深深的无力感。”张梦说。这些天来,她晚上总是休息不好,反复回想着整件事情。其他很多家长也常常一起分析,想找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站在大多数家长对立面的是那位提出异议的家长。生气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一个人的不同意见,就要让全班学生都生活在没有防护措施的空间里。

后来又觉得,谁反对并不重要,是相关老师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双方矛盾的方式不妥,才导致事态恶化。

“直到现在,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对手的战斗,家长们面对的,是一个虽然无形,却异常强大的制度。”张梦说。因害怕承担责任而保持中立,不作为,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公立机构的特点,而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教育制度,更是让公立学校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中立”的身份,出了问题不仅不愿站出来沟通、协商和解决,还总是想方设法把问题掩盖或压制下去。

“在矛盾出现以后,学校曾要求我们自己协商解决,又不允许我们再讨论这件事情,还要求我们不要孤立有不同意见的家长,甚至不能表达愤怒,因为那样我们就会被扣上言辞过激的帽子。”张梦说。

张梦发现,虽然自始至终,一直有十余位家长坚定地支持安装净化器并且热情提供帮助,但是也有一些家长仅仅停留在口头支持上,或者选择随大流,不冒尖。

“都能理解,毕竟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家长们总会担心自己站在学校的对立面,孩子会不会遭到报复或者伤害。所以导致大部分家长,即使是明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过于坚持或者公开反抗。”张梦说。

不仅仅是张梦女儿的学校,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重度雾霾天气,已经令全北京市的市民感受到了健康的威胁,面对民间的呼吁,北京市教委的措施却迟迟未出台。虽然早在2015年7月,北京市教委就表示正在与相关单位进行研究和论证,将根据最后论证的结果来确定是否给全市中小学统一安装空气净化器,但根据北京媒体报道,直到12月28日,北京市教委仍表示,此事还在多方调解,暂无妥善方案保障安装空气净化器后可能衍生的健康问题。

面对官方的迟缓,很多学校的家长都提出了捐赠意愿,但一部分碍于各种原因,进展并不顺利。对于大部分目前尚没有防霾装备的学校,是否可以自行安装或者接受社会机构、家长的捐赠等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和部分学校的不作为,还给一些学生和家長造成了错误的引导,没有足够认识到雾霾的危害。11月底雾霾最严重的那一天,全班只有张梦一位家长给女儿请了假。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意识到健康比成绩等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直到现在,雾霾天上下学给自己和孩子戴口罩的家长依然是少数。”张梦回忆,她曾在校门口目测,雾霾天接孩子的家长戴口罩率不超过1/5。

虽然净化器已经被获准有条件地搬入教室,但是之后会不会再起波澜,谁也不能确定。不论结果如何,净化器张梦都已打算取回了。她寻思,如果实在不允许用,也不能让其他家长损失,自己会全资回购。她甚至还已经做好了为孩子转班、转学的心理准备。和其他家长一样,她也担心因为自己的坚持,而令孩子的身心受到伤害。⑥
(文中张梦、尚老师均系受访者要求化名)

大陆首设海外军事补给基地内情 中国在吉布提追求什么？

记者/钟坚 特约撰稿/李婧怡

近来，东非之角的小国吉布提成为中国海外首个军事补给基地的传闻，几乎已被坐实。自2015年5月以来，中国要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的消息不脛而走，包括吉布提总统盖莱、外长优素福在内的官方人员均承认过此事。

在2015年11月26日国防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隐晦提到“中国和吉布提正就在吉建设保障设施事宜进行协商”，被认为从侧面确认中国军队在海外建军事基地的传闻。在12月3日约翰内斯堡举

行的峰会上，盖莱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还在峰会上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

中国与吉布提作为“传统的友好国家”已有30余年，两国在经贸、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等领域，有着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北京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大陆海军需要有海外战略支撑点，以适应国家海外利益拓展与遂行反海盗、海外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需要。不过囿于长期以来中国对军事走出去的多重顾虑，以及吉布提相对复

杂的国际军事布局，官方相关的表态低调谨慎、不事张扬，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在吉布提的存在

浙江商人、吉布提驻华大使特别顾问何烈辉前些年刚到吉布提的时候，就被这个东非小国所吸引。

▼2015年5月5日，连接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之间的铁路正在修建中。这条全长740公里的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120公里，总投资约40亿美元，其中70%左右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该项目于2012年4月正式动工，2015年年底完成交付。



尽管吉布提资源匮乏、工农业基础薄弱,95%以上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还依靠进口,并且物价高昂,但这个只有92万人口的小国生活安定,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年轻化的社会”:这里99%以上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且开放包容。此外,其国内政局稳定,没有宗教冲突纷争,与邻国索马里、也门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与吉布提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吉布提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物,如人民宫、烈士纪念碑、体育场、门诊楼、外交部办公楼、总统府小型办公楼等,都是30多年来交往的成果。过去的交往更多体现在中国对吉布提从农业、教育、基础设施、通讯等全方位的援助上,如吉布提多功能港项目和牲畜码头项目,就由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和吉布提政府共同投资建设。

吉布提国土大部分是荒漠,可用耕地相当少,唯一的资源是阿萨尔盐矿。该矿产10万吨级的盐业出口专用码头和配套设施以及一条通往盐湖长16.4公里的公路,就是由中资企业援建的。吉布提气候干燥,夏天最热时有50多度。为了防旱减灾,中国还参

与了吉布提蓄水池、管道铺设工程。

吉布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1年其遭遇粮食危机时,中国第一时间紧急援助了总计6000多万人民币的粮食。2015年12月3日,吉布提农业部长默罕默德·艾哈迈德·阿瓦莱接见中国第三批援吉农业专家组时表示,以往其他国家也为吉派遣过农业专家,但大多是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只有中国慷慨地安排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农业专家赴吉开展实验、示范工作,帮助吉农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畜牧业和渔业(海水养殖)。

中资企业在吉布提以建筑企业多见,几乎参与了所有交通道路、港口、机场等重要设施建设,此外,也能看到华为、中兴等国内通讯巨头的办事机构。

何烈辉一年要往返吉布提多次,经常走的路线是从上海直飞埃塞俄比亚,再坐车到吉布提。等到2016年,他就能乘坐埃-吉火车到达吉布提,这也是由中资企业参与建设的吉布提首条电气化铁路。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为吉布提的包括港口、机场和铁路项目等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资金,总额达数十亿美元。

用中国来平衡美法?

吉布提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主要源于其显要的地理位置——它是红海出海口,世界第二大繁忙的航道,每年约有3万艘商船经过该海域进出红海,绕道地中海,通航量仅次于马六甲海峡。

港口服务业也是吉布提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吉布提港,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军舰靠岸靠泊,”何烈辉说,一直以来,吉布提主要依靠给商船和外国舰队的补给服务增加国民经济收入。“这几年亚丁湾地区索马里海盗猖獗,却间接带火了处于核心位置的吉布提的租地买卖,靠租用土地给外国军队,其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除了历史上法国在此驻军超过150年,“9·11”事件后美国在吉布提建立了其在非洲唯一的军事基地——勒莫尼耶军营,该基地有4500多人。日本也在吉布提国际机场以北约12公顷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海外军事基地。该基地配有司令部办公楼、宿舍及巡逻机机库等设施,据称是为了在索马里海域开展打击海盗活动。

或许因为当地各国的海外基地过多,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在评价中国建基地一事时连连否认,“不值得把它夸大为一个所谓的军事基地,哪有相互几个大国把军事基地建在同一个港口的地方。这就是一个补给港口。”

军事基地设施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根据2014年5月签署的最新协议,美国每年要支付6300万美元,作为基地租金,而此前每年仅需支付3800万美元。2003-2013年,法国每年除了向吉布提支付3000万欧元的基地使用费以外,提供的各类援助多达3.8亿美元。仅2009年度,日本就向吉布提提供了高达256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和28亿日元的技术援助。租金、建设费用、经济援助以及军事基地带来的当地消费占吉布提全国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何烈辉在吉布提时经常能看到港口岸



边有多国部队巡逻，外军数量甚至远超吉布提军警。而这也为吉布提带来意外之喜，

“治安出奇的好，可以说是东非的‘和平绿舟’”。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发生后，各国都把侨民撤到吉布提。“当时中国从也门撤走了629名本国公民，当中许多人都被疏散到吉布提，再经由埃塞俄比亚回国。”何烈辉说。

大国驻军给吉布提带来安全的同时，也产生了隐忧。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在2014年的全球报告中把吉布提列为“不自由”国家。报告指责总统盖莱压制民权自由，吉布提政治权利评级几乎垫底。非洲学者阿巴尤米·阿齐基韦则反对美国增加军力。他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说，美国的介入绝不仅仅是为了反恐。“基于越来越多的石油以及其他战略矿产由非洲进口到美国的事实，这才是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指导因素。”

从2008年护航索马里开始，中国军舰也多次靠泊吉布提港口，但由于没有驻军补给基地，舰船维修、人员休整都需要回国，消耗极大。吉总统盖莱对中国驻军表现出极大善意。有学者认为，吉布提希望中国军队长期补给驻点，是为了平衡和制约美、法政治军事生态，其周旋在大国之间，把战略区位置换利益回报的平衡外交发挥到极致。

“双重用途的后勤设施”

据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戴维·罗德里格斯上将日前透露，中国从2014年以来就在跟吉布提谈判，目前已经签署了一份在吉布提为期10年的军事补给基地合同。中国海军补给点的具体位置在勒莫尼耶军营一处无人机基地附近，据称相距只有几公里。

中国的挤入让美国倍感不安，美国情报局担心这会威胁到自己的情报收集工作。有美国官员甚至表示希望盖莱卸任之后，能够换上更符合美方利益的执政者。

2015年11月，吉布提反对党领袖阿普杜拉曼（Abdourahman Boreh）把总统盖莱告上伦敦高级法庭，指控他从国家合约中贪污了数百万美元。盖莱却始终以事务繁忙为由拒绝出庭。美方因此斥责盖莱是独裁



↑ 2014年7月7日，驻扎在吉布提的一位美军士兵带着军犬准备对船只进行安全检查。在当地的勒莫尼耶军营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永久军事基地，驻扎有4500兵力与一支攻击无人机部队。美国国防部每年为其军事基地支付租金约6300万美元。

政府，为了1.85亿美元就允许中国在勒莫尼耶军营旁边建军事基地。

过去20年来，吉布提海港都是由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运营商迪拜世界集团（DPworld）运营管理的，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盖莱在2015年上半年取消了和迪拜世界集团的合约，转而把港口管理权许给中国；为了获得这份合约，中国还承诺会额外投资4亿美元建设吉布提港口的基础设施。

何烈辉则在近来被盖莱政府授权，准备在吉布提建设一个经济特区。该特区位于吉布提市中心的重要区域，目前招商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何烈辉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盖莱总统对中国很友善，吉布提的愿望是吸收深圳、上海浦东经济开发的经验，把吉布提建成新加坡、香港或迪拜。

随着中吉关系愈加亲密，有美国高级官员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称，他们担心盖莱和中国走这么近，可能会限制美国军方对勒莫尼耶军营的控制，比如出台规定限制军

方的活动区域。“这些都将严重影响西方在伊斯兰国家和基地组织的情报搜集工作。”

从2012年的塞舌尔基地，到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以及最近炒作租用韩国巨济岛港口，中国海外军事布局一直广受关注。2015年12月15日，《纳米比亚人报》报道中纳两国正就建海军基地事宜进行深入会谈，对此纳米比亚总统哈格·根哥布回应称“毫不知情”。

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情况下，中国出于海上通道安全，进行适当的反制未尝不可。在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荣看来，北京会在海外奉行“双重用途的后勤设施”模式，而不是沿用美国的基地方式。

“这样的后勤中心将被用于解决中国海外利益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这将缓解中国的海外海上作战的后勤负担（目前主要是打击海盗行动），但可能会扩大到支持有限的行动，如保护中国公民和海外产业。”克里斯托弗2014年曾参与合著了一篇有关中国海外基地选择的研究报告。

这似乎是中国在吉布提所追求的模式——一个针对反海盗行动和潜在突发事件的后勤枢纽。◎

被忽视的死亡杀手——结核病

第46届世界肺部健康大会为儿童结核病患者带来新的药物，也为耐药结核病患者带来新的治疗方案。

记者/李光(发自南非开普敦)

南非，开普敦当地时间2015年12月2日9时，第46届世界肺部健康大会现场，一岁半的结核病患者杰登是年龄最小的参与者。皮肤黝黑、一头卷发的杰登因为结核性脑膜炎，脑部发育受到影响，一岁半的他仍无法行走。这个不安分的男孩没过多久就在母亲怀里哭闹起来，母亲如何安抚也无济于事。杰登显然并不清楚，众多在结核病领域全球知名的科研人员与医务工作者会聚于此，就是为了拯救全球每年新增的100万和他一样的结核病患者。

结核离民众生活并不遥远，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全球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感染结核菌。如果一个人的免疫系统不够强大，就会发展成结核病。中国更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就在WHO担任着防治结核病亲善大使和中国卫生部结核病防治形象大使。

第46届世界肺部健康大会为儿童结核病患者带来新的药物，也为耐药结核病患者带来新的治疗方案，但要实现2035年“终止结核病全球流行”的目标，考验依然严峻。

首个儿童抗结核药物问世

“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为了让他吃药而‘战斗’，我已经为此疲惫不堪。”杰登两个月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三岁的姐姐也未能幸免。他们的母亲莫妮卡每天需要将多达七种不同的成人片剂进行切割，以达到适合儿童服用的剂量，再将它们磨成粉末，用果汁加以搅拌，想尽各种办法尽量让两个孩子吞下。然而，给幼儿服药往往无法保证准

确的剂量，从而影响理想的疗效。

结核病的治疗非常漫长，有的病情长达半年或两年。莫妮卡说，她周围有很多父母都因为无法完成这样的“战争”而放弃给孩子用药，很多孩子因此死去。南非也是结核病的高负担国家之一。

现在，这一情况终于可以改变。全球结核病联盟(TB Alliance)及其合作伙伴在本届大会期间宣布，专门用于儿童的正确剂量的结核病药品问世。这是第一个符合世卫组织2010年发布的指导准则的儿童抗结核药物。此外，这一新的药物能溶解，口感好，更易于让儿童服用。

但各国儿童能否尽快使用这一药物，“将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世卫组织全球结核病项目主任拉维格里奥尼说，“如果我们要在2030年实现结束结核病流

行的目标，就必须让受结核病影响的儿童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当务之急是各国政府应采取行动加速药品引进流程，确保新的制剂到达有需要的孩子们手中，改变每天400名儿童因此而死去的局面。”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年至少有14万儿童死于这种可以治愈的疾病。也有观点认为，儿童结核病的诊断比成人更为困难，因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耐药结核疗程有望显著缩短

一项新的临床研究发现，一种更短的、9个月的治疗方案在治疗耐多药结核方面显示出光明前景，初步结果显示，与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24个月治疗方案相比，使用9个月治疗方案治疗耐多药结核的成功率可达80%。在所有的传染性疾病



第46届世界肺部健康大会现场，一岁半的结核病患者杰登是年龄最小的参与者。

中,耐多药结核是需时最长和最复杂的治疗。目前使用的由世卫组织推荐的耐多药结核病标准治疗方案要持续24个月,这对病人和卫生系统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耐多药结核9个月短程疗法研究是在国际防痨与肺部疾病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的协调下进行的。参与此项研究的科研人员宣布了研究的结果:在全部507个成年病例中,80.9%的病例治疗获得成功,这组病人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9个法语国家。“耐多药结核9个月治疗方案的初步研究结果是非常好的”,联合会主持此项研究的专家阿诺德·特里布克说。“采取短程治疗方案被证明可行,并且相比于标准的耐多药结核治疗方案,效果更加明显。”

上述研究成果是在孟加拉国使用“耐多药结核九个月治疗方案”效果者基础上取得的。但有必要证明它应用在别处的患者中会同样有效,尤其是在那些耐药结核高发病的国家和结核-艾滋双重感染高发的国家。

STREAM随机临床试验同样验证了耐多药结核9个月治疗方案的有效性。这项STREAM随机临床试验第一阶段正在埃塞俄比亚、南非的德班、希仕维、彼得马里茨堡,以及越南和蒙古国进行。

联合会负责协调这项研究的研发部高

级副主任I·D·罗森说:“2016年有望对世卫组织的耐多药结核治疗指南进行更新。我们希望在非洲法语区队列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以及最终的STREAM对照试验数据,会对新的治疗指南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短程治疗方案或许给正在跟持续发展的耐药结核流行进行斗争的国家提供有力的替代方案。”

另外,联合会主持的另一项旨在进一步将耐药结核病疗程缩短到三到四个月的临床试验也已经开始在南非进行。这一实验将目前尚未被大规模使用的三种新型抗结核药物联合使用,目前已经确认对一些广泛耐药结核病(XDR-TB)患者疗效明显,但仍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人群进行验证。

对抗结核需要更多资金

世卫组织2015年11月29日发布报告称,结核病感染首次逼近艾滋病毒,成为人类罹患传染病的主要死亡原因。根据报告,2014年,全球计有110万人因为结核死亡。同一时期,全球因为艾滋病死亡人数为120万,其中包括双重感染的40万病例。

拉维格里奥尼认为,全球结核病项目自2000年以来拯救了大约4300万人的生命。结核病多数案例可以成功治愈,死亡

率却仍处于“不能接受的高”。作为一种几乎伴随人类整个历史的古老疾病,结核病仅在过去200年中就夺取了超过10亿人的生命,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结核菌携带者,在他们的一生中有5%-15%的可能患上结核病。

世卫组织的报告反映了过去10年来艾滋病治疗飞跃,也反映了这两种全球性传染病在资金方面的悬殊:2015年全球用于艾滋病研究的资金达217亿美元,用于结核病研究的资金只有66亿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艾滋病死亡率在快速上升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明显下降,而结核病死亡率只能以每年1.5%的速度缓慢下降。

非营利组织Treatment Action Group (TAG)的数据显示,结核病研究资金的实际需求是每年200亿美元,缺口多达130亿美元。TAG执行主任马克·哈灵顿称,“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变,2030年结束结核病的目标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实现。”

TAG的报告称,2010年以来结核病研究一直停滞不前,制药公司也纷纷减少用于结核病研究的资金,把这一艰巨的任务留给了慈善组织和公共机构。上述儿童结核病药物的研发便是由非营利组织全球结核病联盟(TB Alliance)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等机构合作完成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健康计划总监里察德·克劳斯纳也在2004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宣布,看到结核病肆虐的严酷现状,该基金会决定捐赠8290万美元用于支持新型结核疫苗的研发及未来的大规模接种,但这离实际需求仍有很大差距。

因为鲜有新的研究突破,消除结核病进程目前正因为耐药结核菌而停滞。结核病疫苗研发目前看来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全球结核病疫苗基金会(Aeras)高级战略传播官马特·弗雷德曼告诉记者,目前该基金会正在全球各地进行临床试验的结核病疫苗共有13种,其中的一种正由该基金会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



全球结核病联盟(TB Alliance)向记者展示首个专门用于儿童抗结核药物。

摄影 Reyna

□ 编辑 路琰 □ 美编 黄静

迈向治理型法治

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
国家的行政法治建设也需要
一次升级转型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身处我们今天所在的时空，法治并不陌生。无论是在媒体头条，还是官方公文，或知识界的对话以及大众的呐喊中，法治都是当之无愧的关键词。不过，稍加观察不难发现，在“依法治X”的形式之外，依然存在法治的形式与内核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已经说了什么，而是需要做些什么；不是要不要搞法治，而是要搞什么样的法治。

大陆的传统法治是一种“管理型法治”或者说“管理型法制”，特征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单方面对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事务的管理和控制成为法的内核。“依法而治”或“以法而治”，主要都是围绕行政管理

及控制这一根本目标的外在形式。相应地，这种行政法治以管理者为中心，以便利管理者单方面管控为目标。“管理型法”在形式上往往就表现为“XX管理法”，比如《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管理法》《户籍管理条例》《城市养犬管理办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等；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规则及其构成的体系，在功能上主要是实现对社会中人和事的单方面管理和控制。

无论称其为“法制”或“法治”，其核心在于“以法而治”，而非“通过法律的共同治理”——这就导致了管理型法治与现代政府治理之间的内在紧张。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要求是：面向公共问题，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合作，寻求并实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必须注意，市场、社会及个人是解决问题的主体，而不是问题本身。作为管理和规制者的政府当然是面对问题的主要主体，但并非唯一主体。“管理型法治”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一些情况下将提出问题的人当作了问题本身。这种法治模式在实践中已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比如在此起彼伏的PX事件以及其他形式的

“中国式邻避困境”、群体性事件处理等领域，虽然我们也试图以“法治方式”来应对，但由于管理型法治内在的缺陷，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合作治理型法治的展开

正因此，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国家的行政法治建设也需要一次升级转型，即由过去以政府管控为核心功能的“管理型法治”形态向“合作治理型法治”转型升级。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要旨的“合作治理型法治”，应该成为法治新常态。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法治新常态正在不断展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四中全会又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改革部署。就其内部逻辑看，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法治，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法治应该成为推进现代国家治理的路径，而不是强化过往单向度管理模式的手段。这一共识应该成为法治新常态建设的根本逻辑。

在政府法治改革的实践层面，由管理型法治向合作治理

型法治的变迁在几个重要方面已经初步展开。

第一是政府职能优化的改革。“依法行政”往往强调政府依法进行管理，但依法管理的前提问题是政府是否需要干预和管理。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如果在职能上政府不应该管，即便依法去管，也会与现代政府治理的目标南辕北辙。现代政府的治理需要在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的基础上，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近几年来，政府转变职能的改革有了进一步推进，主要表现为行政许可制度和非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改革，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等一系列“清单式管理”。这一领域的改革旨在反思过去管理型体制当中“无限责任公司”式的政府模式，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府职能真正体现“放”与“管”的结合，从而激活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活力。这一过程是政府职能“瘦身”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充权”的过程。政府职能的优化是推进多元合作治理的前提，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结构现代化的基础。

第二是合作治理程序框架

的改革。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不仅需要主体的充权,而且需要改造行政法治的程序和技术。公共问题的解决,如环境治理、邻避困境等等,涉及到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多元主体利益,因此需要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获得解决方案。作为合作治理的法治框架,应当引入“参与式治理”,超越过往“管控型”模式的弊端。在过去一段时间,政府法治改革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表现为在重大行政决策、行政立法、环境治理、食品治理、基层治理等等领域开始重视并尝试参与程序的改进。比如,2015年初实施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一个重要的改进就是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机制。同时,在环境保护等领域已经尝试的公益诉讼、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将为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社会组织提供一个参与公共问题治理的重要程序平台。

第三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技术改革。从治理的要求看,法治改革的实体目标是推进公共治理的结构体系优化。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进既包括结构性改进,也包括技术性改进。结构性改进主要是指不同主体间关系的改进。包括纵向和横向府际关系,以及政府、专家、大众、个人之间的关系重构。比如,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治理当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乡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实现管理体制所追求的“统一性”与现实治理所面对问题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

是体制改革的核心。管理体制变革还必然涉及到政府、专家、大众、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行政立法、政府规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在议程设定、话语、决策等环节充实专家、大众、个人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权利,是行政体制变革的关键,也是当前行政法治改革的关键。

第四是透明度改革。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需要主体间的信任、有效的利益表达、理性的协商妥协和共识构造,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透明度既是公共治理的要求,也是当今政府法治的核心。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信息公开的实践已经并不断重塑行政法治的地形图。特别是在财政体制改革、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审批制度改革、市场秩序维护、环境污染治理、突发事件应对、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管理等领域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公开实践所带来的治理和法治红利,已成为合作治理型法治建设的主要增量来源。

第五是责任机制的改革。行政法治领域责任机制的改革目标在实体上要求权责对应、权责统一;在形式上则要求法律责任的法律化。就前一个方面而言,无论是在行政决策领域和立法、执法领域,还是行政裁决领域,都开始不断强调权责法定、权责相应;并通过决策的终身问责、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机制来落实责任。在责任机制的改进领域,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案件登记制、受案范围扩展、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司法审查广度强度等方面的改革,行政权力责任的制度化、程序化、外部化追责机制进一步发展。在责任机制的形式方面,责任追究的政治化虽依然是一个突出问题,比如信访指标考核,问责机制的过度内部化、政治化,但这方面的改革共识正在强化,相应的改革措施也正在部署之中

政府法治建设的新思维

行政法治新常态的建设,需要我们超越工具型法治和管理型法治的陷阱,将法治的新衣与现代治理的内核结合起来,将参与、透明、责任等治理的关键要素融入法治体系当中。

在将来,面向治理的行政法治改革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的统一。

第一是法治与改革的统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实际上为法治改革提出了根本方向,那就是变法必须符合变革的需求。法治改革不应无的放矢,为法治而法治,而应当面对改革的现实需求。比如互联网+带来的新兴产业,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这既是改革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改革需要通过法律来实现,但首先需要有重构利益格局的勇气,否则就会出现以保障法治为名而拒绝改革或者使改革成为重申既得利益格局的法律游戏。法治应保障改革的速度,防止改革进程久拖不决,错失改革时机;法治应保障改革的力度,防止选择性改革,防止改革

雷声大雨点小;法治应保障改革的温度,平衡制度转型过程中新旧利益格局的衔接过渡,避免“零和博弈”。

第二是法治与治理的关系。政府法治的未来发展必须以推进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为目标,穿越观念、利益、现实的重重迷雾,不忘初心。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行政法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政府自身改革的问题,特别是政府职能改革、许可审批制度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基层治理,特别是县乡治理的“本地化”改革。

最后,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治理中,需要考虑宏观统一性与微观多样性的平衡。治理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底层创新。顶层设计主要考虑制度基本的统一性,底层创新主要回应地方面对的多样化问题。应当注意到,宏观和微观治理的混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地方治理创新的活力。就改革推动力而言,中国的治理改革和法治改革因为传统的路径依赖,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这当然有其背景和优势,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动员、自我变革的推动力,往往面临在时间维度上递减的困境。因此,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需要新的动力来源。这个新的动力源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也就是通过市场、社会、公众等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组织化和有效参与,推动治理转型和法治新常态的建设进程。

《慈善法》： 内地开门立法典范



杨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下称《慈善法》)十年长跑,一朝提速。

2005年,民政部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起草《慈善法》的立法建议。2009年,民政部将《慈善法》草案上报国务院。此后,慈善法的立法进程一度搁置,总是“排不上队”。

2014年2月24日,《慈善法》的立法进程迎来转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慈善事业立法领导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列出立法时间表和路线图。201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慈善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尽管目前的《慈善法》草案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讨

论,不得不说,如今的《慈善法》吸纳了不少民间意见,与我们当时的悲观预计相比,已是天差地别。

此次立法过程中,民间发挥了超出以往的热情。2014年以来,来自不同民间机构的《慈善法》建议稿共七个版本,在这一年针对慈善立法的民间研讨会也有十余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积极吸收民间意见,立法效率很高。可以说,《慈善法》是内地开门立法的典范。

慈善组织外延扩大

2014年,在各方争议下久拖不立的《慈善法》突然走上快车道。而此次全国人大开门立法,吸收民间智慧,也是慈善立法最终能在2014年得以迅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的立法是先经由行政部门拟定草案,再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然后经人大审议,步骤冗长。此次《慈善法》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导立法,仅用一年的时间即提请审议,效率提高了很多。未来的立法,政府行政部门都不要参与比较好,因为即使行政部门对相关的行业较为了解,但其在立法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考虑

自身利益。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立法伊始对慈善领域了解有限,但能在起草阶段秉持虚心和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出于对自己息息相关法律的关心,民间也积极提供意见,与立法部门保持良性沟通。目前的这个草案版本,是吸收了民间智慧的结果,尽管仍有很多问题,但已经超出预期。

此次《慈善法》实际上让慈善组织没有了“主管部门”,只存在民政部这个“监督部门”。民政部的职责就是慈善组织的登记和监管。对于民政部来说,这不是“削权”而是“统权”。

过去,成立慈善组织既需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也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实行双重管理体制。而如今慈善法推行的是“大慈善”理念,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事业的发展,都可以被定义为慈善,只需依法在民政部申请登记即可。依照慈善法草案规定,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

尽管未来民政部能否良好地执行,是一个待考的问题,但以法律而言,成为“慈善组

织”的标准宽泛了,慈善的大门打开了。

此次草案中专门列出“慈善信托”一章,使企业不仅能以捐赠的方式,还能以信托的方式为慈善事业积累资金。比如有理财公司将客户投资利息的一部分聚合起来为农民做公益性的小额贷款,这样的行为活化了慈善的形式,也即将获得法律的认可。

草案还有一个重大的立法亮点:“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即使没有登记,也可以开展力所能及的慈善活动,但应当遵守本法相关规定,并依法享受相关权益。”

这实际上是一条开放性的条款,让很多愿意做慈善的人找到了法律支持。据我们的估算,目前中国登记的慈善组织为60万左右,而没有登记的非营利组织约在2000万以上。在中国有很多企业、社区都有一些没有登记的组织,大家为了一个慈善目的聚在一起,做完事情就散掉。这些组织其实真的无需登记,却也真的柔化了我们的社会。

相对而言,这也是一条表述模糊的法条。类如“宗教”这类在立法期间就因过于敏感而无法明确在列的慈善组织类

来自不同民间机构的《慈善法》建议稿
共七个版本,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积极吸收民间意见。
慈善立法可谓内地开门立法的典范。

别, 最终也可以援引这一法条进行一些慈善活动。但关于中国的慈善组织如何到境外开展慈善活动, 以及境外的慈善组织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 草案中没有体现。

慈善活动需分层定义

草案针对公募权的开放引发争议。根据草案规定, 依法登记满两年、运作规范的慈善组织, 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这实际上是开放了公募权。在过去只有公募基金会享有向不特定公众进行公开募捐的资格, 而现在, 非公募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 只要满足相关的条件, 也可以申请公开募款的资格。

但草案同时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采取公开募捐方式开展公开募捐”, 这一条款引发很多不同意见, 很多人认为, 个人通过互联网筹集资金, 是无法被限制的, 也不应被限制。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议, 是因为草案没有对慈善活动进行分层定义——区分组织和个人。慈善立法的目的是要鼓励大家都来行善, 无论是帮助自己熟悉的人, 还是为不特定

的公众服务, 都是需要在法律政策上给予鼓励的。比如, 为一个白血病患者捐款, 或者为专门帮助白血病儿童的慈善组织捐款, 两者虽然都叫做慈善活动, 但对二者的规制又应有所区别。

《慈善法》的规制对象应该是组织, 包括未登记注册的组织, 而非个人。对于针对不特定公众的募捐, 要给予他们“公募权”, 而不具备公募资格的组织和个人, 只要不是采取“公开募捐”设定的几种方法(如设置募捐箱、义演、筹办慈善晚会等), 就应允许其存在。

对慈善活动进行分层定义的意义是, 让每一个慈善活动的主体在法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要倡导的, 是更广阔概念的慈善活动, 要让慈善行为辐射到更多非特定的大多数人。

应进一步明确政府与慈善的界限

2014年以前, 我对《慈善法》一直持悲观态度。对于“慈善到底是什么”、“慈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慈善与市场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 我们都没有厘清, 何谈立法呢?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 激发了全民慈善的热潮, 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这一年至今是中国建国以来社会捐赠总额最高的一年——1070亿元, 几乎是人人捐款。但在实际上慈善究竟应该如何运作, 老百姓搞不清楚, 政府更搞不清楚, 只是将慈善视为政府功能的补充——将慈善捐款划归为自身的财政规划, 把民间慈善的资金装进政府的“钱袋子”。

到2010年玉树地震时, 情况更加严重, 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 其中规定, 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需要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 由青海省方面统筹安排使用。这从理念、做法到组织方式上, 都是没有划清政府与慈善边界的表现。

在可从慈善募捐获利的前提下, 政府怎会有立法限定自身与慈善界限的动因呢? 这样做的确可以在早期为政府带来不少效益, 但显然不利于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

此次慈善立法在这方面有明显进步。草案所称“开展募捐活动, 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

派, 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的监督主体, 应该是指政府部门。“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将受到民政部门的警告, 并停止募捐活动。

谁有向单位摊派的权力呢? 只有政府。有了表意, 却在法条上的表述比较模糊。未来, 如果还有政府部门将慈善捐赠划入政府财政, 我们是援引这一条法律进行反对的。这或许是立法者的一种智慧。

但我仍希望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与慈善的界限。慈善是独立的、民间的, 不应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对于民间来说, 法无禁止就可行; 对于政府来说, 法无规定不可禁。政府要厘清自己的职责, 不要越位。推动慈善组织在社会的平台上公平竞争、重组、整合, 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这一点仍是我对《慈善法》未来实施最担心的地方。目前有很多慈善基金会实际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成立的, 如何规制仍然是个问题。法条已立, 监管摊派募款的民政部能否坚定地执行, 有待观察。

(采访整理 记者/徐佳)



韩国“打虎”总统金泳三的成败人生

无论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朴正熙维新政权，还是在血的教训中推进民主化改革的全斗焕政府，都是金泳三带领民众斗争的对象。

特约撰稿 / 王轶

2015年11月22日凌晨0时22分，第14届大韩民国总统金泳三因败血症和急性心力衰竭在首尔大学医院逝世，享年88岁。11月26日，韩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总统朴槿惠、前总统李明博、已故前总统卢武铉和金大中的夫人、卢泰愚的

儿子以及96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参加葬礼的不同环节。曾被金泳三送入监狱的前总统全斗焕，也不顾84岁高龄亲往吊唁。

金泳三之死引发了韩国社会的怀旧潮，“两金（金泳三、金大中）以后的民主主义”成为媒体热议的话

题。但民众对金泳三的评价并不算高，《中央日报》与《中央SUNDAY》杂志曾请100名专家对历代总统的领导力进行排名，在业绩、行政能力、经济能力、法治等10项指标中，金泳三只在“与国会关系”一项获得第一。韩国岭南大学对1500名成年男

女的调查显示,“对韩国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总统”排名中,金泳三位列第六,还不如一直被她视为专制、腐败、无能的全斗焕。

在野斗争三十年

金泳三政府被称为“文民政府”。有媒体将其理解为“文人政府”,并将金氏誉为“韩国第一位文人总统”,实在过于夸张。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也没有当过一天军人。其实,这与金大中“国民的政府”、卢武铉“参与政府”一样,不过是体现执政理念的宣言而已。

“文民政府”之前,韩国经历过30年的军人强权统治。与内阁满是现役将军的缅甸军政府时期不同,这30年间韩国的国会依然存在,在野党照常活动,各部部长以政客和技术官僚为主。三任国家元首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都是陆军将领出身,但在担任总统前已经辞去军职。也正是在这30年间,金泳三完成了从青年政客向总统候选人的转变,见证了韩国政治的折冲变迁。

金泳三于1927年12月出生在庆尚南道巨济岛上的一个渔场主家庭,自小生活优裕。他在二战结束之后进入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学习,身上没有日本殖民时期的负担。在校期间,金泳三因演讲获得外交部长张泽相赏识和提携。朝鲜战争停战后,张泽相出任总理,邀请年仅24岁的金泳三担任秘书官。两年后,金泳三回乡参加国会选举,成为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1960年,李承晚政府因大选舞弊引发民众运动而倒台,接替的民主党张勉政府无力应对政局、提振经济。金泳三和一批议员从民主党中出走,组织新民党从事政治活动,开启了他长达30年的在野斗争生涯。他

反对无能的民选政府、反对腐败的军界高层,也反对深深勾结的政商体制。无论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朴正熙维新政权,还是在血的教训中推进民主化改革的全斗焕政府,都是他带领民众斗争的对象。

其实,在建设国家的诉求和目标上,金泳三与受过美国教育的朴正熙等少壮派军人有很多相同之处。后者针对1960年的大选舞弊案,曾提出中将以上军官应当对此负责、全部退役的要求。1961年政变上台之后,朴正熙也以工业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实现了韩国经济的腾飞。

金泳三视朴正熙为独裁者,利用各种场合发动民众,反对朴正熙的政治行动和决策,被视为在野党的旗手。但朴正熙却始终不能让金泳三在政坛上消失,顶多只能使出些压制的小手段。比起三八线以北几番政治清洗后建立“主体地位”的革命领袖,朴正熙只能甘拜下风。

1979年,金泳三当选新民党总裁。害怕金氏继续坐大的朴正熙,试图通过剥夺议员资格降低其政治影响,所采取的竟然是“金泳三对外国记者发表讲话时存在辱国内容”这种低级理由。更没想到的是,朴正熙还因此丧了命——釜山、马山地区发生反对剥夺金泳三议员资格的游行示威,朴正熙与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讨论应对方案时遭后者枪杀。金载圭表示,这是出于对朴正熙镇压民众主张的痛恨。

朴正熙死后,金泳三一度准备通过选举角逐总统一职,但被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所打断。1980年光州事件后,全斗焕将金泳三软禁三年,但在其发起绝食23天之后让步。金泳三反而因此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民主圣徒,拥有了整合各派在野党的政治威望,不断向全斗焕

政府施加压力。此后,全斗焕逐步解除限制政治活动的措施,对金泳三这位在野党领袖的态度也越来越客气。1986年举行亚运会前夕,全斗焕甚至主动向金泳三提出政治休战,以求避免在会场附近出现大规模政治集会。

通过选举上台的卢泰愚,面对民众运动更加乏力;而相对保守的金泳三及其创立的统一民主党,也在更为激进的民主派政党面前相形见绌,甚至失去了国会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在政治现实的挤压下,曾经的对对手走向了合作,以卢泰愚为首的民主正义党、以金泳三为首的统一民主党和以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为首的新民主共和党合并成为民主自由党。金泳三正是以该党候选人的身份投入第14届总统大选,在朝野保守派的全力支持下当选总统。

以反腐肃贪拉开改革大幕

金泳三在1993年2月25日宣誓就职总统,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的国家。从朴正熙时代开启的“汉江奇迹”,将韩国从朝鲜战争之后的废墟,建设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800亿美元的工业国家。但高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和产业转型的剧痛,在1990年代同时爆发,连续30年平均8.5%的GDP增幅在金泳三就任前一年只剩下了4.7%,经济低迷、出口乏力,亚洲银行甚至将韩国排除在“亚洲四小龙”之外。

强势政府、地缘政治、家族化企业伴随经济一同发展,政客、军人与商人之间结成了一张严密的网,权钱交易与腐败横行。年轻人对政治丧失兴趣,却对消费无比热衷,他们厌恶艰苦的工作,纷纷涌入汉城等大城市淘金、投机、享乐。金泳三评价:

“一度著称于世的韩国人的吃苦耐

2015年11月23日,首尔,一位韩国民众在金泳三画像前鞠躬致哀。

金泳三生平大事记

- **1947.9~1952.8**
在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校期间开始担任总理张泽相的助理，朝鲜战争期间曾加入学生义勇军，毕业前三个月成为张泽相的秘书官。
- **1954.5**
以自由党候选人身份在巨济郡当选第3届国会议员，是国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 **1955.9**
加入民主党，担任青年部长、庆尚南道委员会副委员长。3年后在第4届国会选举中落选。
- **1960.7**
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在釜山市当选第5届国会议员，从此将政治基地转移到釜山，此后直到1992年10月为止，连续9次当选国会议员。
- **1965.5**
加入民众党，担任国会内总务部长，即党团领袖，是国会最年轻的党团领袖。两年后民众党与新韩党合并为新民党，仍任国会内总务部长。
- **1970**
第一次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在党内预选中败于金大中。次年，金大中在总统选举中败于朴正熙。
- **1974.8**
当选新民党总裁，成为最年轻的国会在野党总裁。
- **1980.5**
被全斗焕政府多次软禁。1983年5月17日，宣布绝食，23天后被强行送到医院，5天后全斗焕被迫解除软禁。
- **1987.4**
退出新民党。5月，建立统一民主党，任总裁。
- **1990.1**
民主正义党、新民主共和党、统一民主党合并为民主自由党，担任党代表和最高委员。
- **1993.2**
就任第14届大韩民国总统。

劳精神，曾几何时，已烟消云散。”

就职演说中，金泳三表示：“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治愈已蔓延于整个社会的表现为种种腐败现象的韩国病，实现新的腾飞，建设新韩国。”上任伊始，金泳三便从政府自身开始实施改革，废除各种繁文缛节和铺张浪费，甚至将内阁工作午餐精简到只剩一碗面条。1968年朝鲜特工袭击总统府之后被封闭的青瓦台广场，也被再度打开，允许民众参观，一扫前30

年政府营造的威权和神秘形象。

实质性的反腐肃贪措施接连出台。金泳三就职3个月后，《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得到国会通过，规定包括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国会议员在内的3万多名高级公职人员要在1个月内登记财产并公之于众。金泳三和总理黄寅性以身作则，率先递交了财产清单。5个月后，《关于金融实名交易与秘密保障的紧急命令》发布，要求在两个月内将非实名账户转为实名账户，使高级官员无法继续使用匿名账户隐匿财产。

这一套组合拳很快取得成效。前任国会议长金在淳被发现其夫人存在不动产投机交易，现任议长朴俊圭则在公示财产后被揭发虚报总额，先后退出政治舞台。媒体和民众对高级官员公布的财产报告深挖细掘，发现了不少隐形贪官。驻巴基斯坦大使金正勋拥有4栋住宅、2处商铺，却申报没有储蓄，很快被发现存在贪腐，继而遭到法办。

“打虎”行动甚至波及到了刚上任的内阁成员。法务部长朴喜泰为女儿伪造身份后将其保送进入名校梨花女子大学、建设部长许在荣偷税漏税、首尔市长金尚哲占用公共绿地扩建房屋的行径都被揭发，相继遭到金泳三解职。一年间，有3635名官员被追究责任或引咎辞职。

曾经执掌政权30年的军界也未能逃过金泳三的铁拳。以调查军火采购弊案为开端，前国防部长李钟久、李相勋、李养镐，前海军总参谋长金钟浩、金铁宇，前空军总参谋长韩周奭、赵隔海等人均被惩处。陆军军级军官中的62%、师级军官中的39%都被更换，以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为核心，以韩国陆军军官学校第11期毕业生为骨干组成的秘密组织“一心会”遭到彻底清洗，总统任免高级军

职需要军方认可的制度也被废除。

1995年最后三个月，两只“大老虎”相继落网。10月，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先后被揭发拥有巨额秘密资金，分别高达2000亿、4000亿韩元。11月26日，卢泰愚被捕。12月3日，全斗焕被捕。12月21日，两人同时遭到起诉，罪名除了秘密政治资金问题，还涉及军事政变、镇压民众运动等事项。同时遭到逮捕和起诉的，还包括一批追随全、卢左右的退役将军、国会议员和财团首脑，被视为对30年军人统治的总清算。

1996年8月26日，汉城地方法院判决全斗焕死刑、卢泰愚有期徒刑22年6个月，并分别处以2205亿、2628亿韩元的罚款。经过上诉，全斗焕被改判无期徒刑、卢泰愚改判17年有期徒刑，其他追随者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这场震动整个韩国的“世纪审判”，被部分民众认为是金泳三总统生涯最大的功绩。但全、卢并未在狱中关押多久，1997年12月两人获得特赦出狱。

令人遗憾的谢幕

虽然“反抗军人强权暴政”30年，金泳三上台之后的行事作风同样专断强硬。他推动金融实名制改革的决策，事先连总统府首席经济秘书都不知情，实施时也是以总统令形式下发，又由国会追认的。金泳三推动修改《劳动法》时，又选择在国会休会期间，于凌晨强行表决，以确保监控劳工团体活动内容能够通过。“总统本人过分自信、作风极不民主，经常把国务会议及法律程序和制度置之度外。”历史学者金熙熙评价。

金泳三有改革政治的勇气和定力，对发展经济却没有洞见和恒心。他上任后提出的“新经济五年计划”只执行了三个月便被弃置。五年中更



换了6名总理、7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也使经济改革沦为空谈，最终导致了韩国经济的衰退。对今天二三十岁韩国年轻人来说，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济金融事件使父辈失业、家庭陷入困境，是金泳三时代最深的记忆，甚至有人坦言“对他抱有很大的负面印象”。

金泳三执政的五年间，韩国经济由于财团体制的僵化和产业转型的缓慢，靠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积累的优势逐渐丧失，企业盲目扩大生产，不良贷款逐渐增加。1997年1月，韩国第14位的巨型企业韩宝集团，因无力偿还42460亿韩元贷款宣布破产，成为压垮韩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为开端，韩国最大的酒商真露酿酒、全国排位第8的韩信集团、汽

车业巨头起亚集团等大型企业相继陷入危机。10月间，宣布破产和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达到了28个。与此同时，韩国外汇储备逐渐降低，而外债不断增加，外企接连撤资，各大银行经营陷入困境，只能靠中央银行提供特别贷款支撑。11月，韩国外债总额达到历史纪录1614亿美元，金泳三只得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救援申请。到这一年年底，韩元跌至2067元兑换1美元的最低点。

家人身涉弊案，同样重创了以清廉自居的金泳三。1997年4月，韩宝集团董事长郑谱根承认曾以488亿韩元贿赂诸多政界人士以换取政策支持、政府补贴及指令性贷款等，金泳三的次子金贤哲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受贿金额达到66亿元，成为第一个卷

入腐败丑闻的总统之子。金泳三也只得承认，“儿子的错误就是父亲的过错”。1998年2月，金泳三在一片谴责声中卸任，离开了青瓦台。

金泳三的总统生涯中，有一件失误的影响延及身后。1994年7月，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去世，原定在该月底举行的朝韩首脑会谈及离散家属见面会只得推迟。但金泳三随后下令禁止韩国民众前往平壤吊唁，使原本趋向热络的南北关系迅速冷却，也使两国首脑会谈推迟到6年之后才开启。或许正因如此，朝鲜一反应对韩国总统逝世的前例，对金泳三去世一事十分冷淡，中央通信社、劳动新闻等官方媒体毫无报道，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更是连一封唁电都没有发。

↑ 1987年韩国第13届总统选举，金泳三退出新民党后组建统一民主党参与竞选。因反对派阵营的分裂，卢泰愚以微弱优势当选。

□ 编辑 陈祥 □ 制表 美编 虎妹



大陆引进苏-35歼击机内情

可以预料，苏-35主要被中国用来平衡邻国陆续服役的“4+”代水平的战机，并在某种程度上抗衡即将在周边扩散的美国F-35隐形战斗机。

特约撰稿 / 田聿

↑ 2015年9月15日，一架参加完军事演习的苏-35战斗机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关于向中国交付苏-35的长期谈判已结束，我们签署了合同。”俄罗斯技术集团公司（Rostec）总经理谢尔盖·切梅佐夫日前在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的采访时证实，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供应24架多功能苏-35歼击机的合同，交易额达20亿美元。在2015年11月18日举行的俄中军事技术合作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上，双方还确定了军技合作的优先方向。

作为2003年开始研制的苏-27深度改型歼击机，苏-35运用多种第五代歼击机的技术，一方面作为苏-30MK双座歼击机到第五代T-50歼击机服役前的过渡机型；另一方面，也通过气动性能已被摸熟的苏-27机体来验证五代机的航电技术、加速测试进度。更重要的是，

苏-35从项目伊始就被定位为超越欧美与俄罗斯现役四代机的“4++”代机，在某些条件下用来抗衡F-22、F-35等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24架”具有实战意义

长久以来，俄空军内部围绕米格-31的去留问题争吵不休，一种意见是要开发全新机型，另一种意见认为米格-31仍可堪大任，特别在北极等边远地区执行拦截高速目标任务时无可取代，因此主张重开生产线。但经过反复协商，俄空军最终选择了用苏-35替代米格-31的方案——无论从航程还是武器打击效能来看，苏-35都是最适合的“接班人”；而今，中国空军同样也需要苏-35承担类似任务。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披露，

中国计划引进的首批苏-35歼击机为24架，与1992年引进的第一批苏-27SK歼击机数量相当，但如今解放军的实力与技术层次与1992年不可同日而语，部署方式也天差地别。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空军主力是歼-6、歼-7，并不具备现代化的超视距作战能力，发展中的歼-8IIM勉强具备发射半主动雷达制导超视距导弹的能力，但也不成熟，而同时期的日本却有F-15J。当时苏-27SK的到来犹如“甘霖”，迅速担当起大陆防空大任。这一现代化进程相当艰苦，当台湾空军340架“二代战机”于21世纪初全数到位时，大陆装备的苏-27系列战机才突破100架。直到2005年前后，苏-27系列才达到300架，终于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战机规模相当。

如今，解放军所拥有的苏-27/30、歼-11（苏-27SK的国产化版本）系列已达400架左右，另有具备空战优势的歼-10截击机、能空中加油并发射超视距空空导弹的歼-8F截击机、专门从事对海对地打击的歼轰-7歼击轰炸机也形成相当大的装备规模，总计已有数百架。与此同时，中国还持续推出歼-10B、歼-20、歼-31等更加先进的战机。

比起当年苏-27SK的“应急”角色，对中国而言，如今的苏-35则变得没有那么紧要。由于具备自制歼-11系列重型歼击机的能力，中国未必会用“一对一”的方式去拿苏-35替换陆续达到服役年限的原装苏-27SK。就算未来追加从俄罗斯进口苏-35，数量也不会达到90年代进口百架苏-27SK、苏-30MKK那样的规模。

可以预料，苏-35主要被中国用来平衡邻国陆续服役的“4+”代水

平的战机，并在某种程度上抗衡即将在周边扩散的美国F-35隐形战斗机。大体而言，美国的亚太盟友空军基础是数百架处于第四代或“4+”代的战斗机，即F-15C/D、F-16C/D，拿中国空军现有机型性能与规模与之较量，总体不落下风。

而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正在急剧变化中，美国近年来提高向亚洲盟友兜售更高规格战机的层次。例如韩国空军引进的美制F-15K战斗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在探测距离与多目标接战方面远胜此前装备的KF-16战斗机，在超视距作战方面达到“一架顶数架”程度。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也已确定购买美国F-35隐形战机。这样一来，中国空军又面临某种“力量失衡”问题。不过考虑到F-35终归是单发的战术飞机，无论作战半径还是实际的地缘政治关系，这些国家就算拥有F-35，也多半是发挥防御功能，难以对大陆纵深构成重大威胁。

因此，面对这些“潜在对手”，解放军可通过增加现有机群规模、提高装备完好率等方式来应对，从容等待自己的下一代隐形战机（如歼-20）问世。

目前，美国军方正按照“亚太再平衡”的总战略规划，积极向亚太部署先进战机，特别是在日本冲绳的嘉手纳基地轮驻具有强大威力的F-22隐形战斗机，该基地具有足够战略纵深，可对中国东南沿海防空阵地实施打击。面对这一威胁，具有对抗隐形机能力的苏-35进入中国，其最佳的部署位置应是接近嘉手纳的南京军区基地（如浙江等地）。因为这里具有连通南北的地理优势，往北与往南分别可以控制黄海、台海局部空域。

因此，倘若将苏-35部署在南

京军区，24架的规模已能平衡嘉手纳基地的美国F-22机群；再借用苏-35的指挥控制能力指挥现有的苏-30MKK、苏-27SK机群，综合国产指挥网络，能与现有机群发挥相乘效果。因此，“24架”这一数字是具有实战意义的，绝非是买来仿制那么简单。

对台湾岛的“绝对威慑”

当解放军通过部署苏-35来争夺“第一岛链”以西的制空权时，仍会使用传统战术，即探测空域、发现目标、拦截目标。具体到台海作战方面，苏-35的独特性能使其能够运用全新的战术。

据俄罗斯《航空航天杂志》披露，苏-35对米格-21大小的飞机目标探测距离达350-400公里，识别距离在300公里以上，相当于解放军空警-200预警机不出海岸就监视整个台湾上空。此外，该机的“雪豹-E”相控阵雷达天线可以机械式外转60度，以电子扫描与飞行方向夹角120度以内的区域，也就是苏-35可以在福建内陆南北奔走，始终以侧面斜向监视台湾。

谈到类似的俄制武器，解放军装备多年的苏-30MKK歼击机也可携带，但其探测、火控距离较近，因此台湾的战机、地空导弹有机会通过打平台的方式“釜底抽薪”。但苏-35可在福建上空发射这些导弹，这意味着对台湾防空体系而言，面对的已不再是苏-35这个平台，而是其发射的武器：它们的数量是飞机的数倍、体型比飞机小，既可能是掠海飞行、先爬升后俯冲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速度偏慢的滑翔制导炸弹。

这样一来，即便台湾当局在未来10年能引进美制F-35隐形战机，也很难对抗福建、浙江上空的苏-35，因

为中国大陆以极宽的正面朝向台湾，彼此距离又近，可用现代化防空雷达从多个方向探测台湾上空，这时隐形战机的隐蔽效果已然大为降低。

或集成中国国产武器

由此可见，苏-35的作战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特殊的武器系统，尤其是射程达200-300公里的导弹。有了那些导弹，苏-35才可以影响地区力量均衡，否则只是“相对于敌机有优势”罢了。正因为这些武器的采购与否、数量多寡会直接影响苏-35的作战效能，可以预料，这类武器在日后可能会成为中俄外交谈判的筹码。

据俄媒披露，目前中俄围绕苏-35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集成中国国产武器。如果这一谈判成功，解放军的苏-35使用射程100公里以内的武器的基本战斗力不会有问题。不过，这也要看未来中国能否有自己的200-300公里级武器。2014年珠海航展上，中国曾展出外形与性能都酷似俄印合作的“布拉莫斯”的超巡-1（CX-1）超音速反舰导弹，可见未来这种趋势的确存在。

至于有大陆媒体推测苏-35可能改装国产火控计算机、雷达等，可能性则微乎其微，一来这些产品未必性能有飞跃性提高；二来这等于重新开发新飞机，时间与成本都不划算。

此外，引进非外形隐形的苏-35与中国发展国产歼-20隐形战机也并不矛盾。毕竟，要发展性能兼备的隐形战机在技术与资金上都不太容易实现，战场上也不是非用隐形战机不可；如果使用非隐形平台作为骨干，隐形战机作为少数的“奇兵”，能发挥“以正合，以奇胜”之效。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苏-35部分性能对比

- ◆ 正常起飞重-空重比为1.53，五代机约为1.5。
- ◆ 推力-空重比达1.75，五代机约为1.7-2。
- ◆ 燃油系数达0.41，为当代之冠。

苏-35或针对中国客户的改造

- ◆ 敌我识别系统：战机出口到任何国家一般都会针对客户要求改装该系统；
- ◆ 控制系统：苏-35有类似北约Link-16的数据链系统，也有兼容于苏-30MK、苏-27SK的波段，因此可以与解放军现役的苏-27SK、苏-30MKK/MK2协同作战。

“龙肩”经济 强劲南京

记者 / 隋淙淙

如果说上海、武汉分别是长江经济之龙的‘龙头’、‘龙腰’，那南京就是‘龙肩’。”这句被《求是》理论网引用的话，认知度颇高。

“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已成国家战略，“黄金水道”自然指货运量居全球内河之首的长江，而作为长江流域水陆联运和江海中转主要枢纽港的南京，其“长江脊梁”的角色，则一笔圈定了她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经济重心”的位置。

南京当仁不让。2015年10月23日，南京市统计局亮出前三季度经济发展成绩单：2015年1-3季度南京完成地区生产总值7002.01亿元，9.2%的经济增速跑赢全国6.9%和江苏8.5%的水平。这正回应着习近平主席对江苏提出的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要求。

“强富美高”同样是这座城市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经济强”写在卷首。

产业竞争力 & 科技创新力：南京经济的 JPL

JPL，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这个坐落在美国小城帕萨迪纳的以无人飞行器探索太阳系的机构，其飞船已到过全部已知大行星，代表着人类走向深空的智慧和勇气。翻看南京经济发展年表，就能强烈感觉到，用这个有点极客的词形容产业竞争力之于这座城市经济的强劲推力、以及科技创新力所带来的新鲜血液，再恰当不过。

南京推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图谱上，最亮眼的一道光首次出现

于2013年底：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首次超过传统产业。这是南京结构调整的“里程碑”。

强光并非转瞬即逝。2014年，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5372亿元，同比增长15.5%，超过全市工业增速10.2%，继续强势领跑。

曾经的重工业城市南京经历过漫长的阵痛，化工、钢铁、汽车在工业总产值占比一度高达70%。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座城市更是面临着由“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挑战。

南京始终风雨兼程。她做出的数不清的改变可以用两句话概括：改造传统产业、破除政策桎梏。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储东涛如此评价：“虽面临困难，但种种举措确能推动南京跟上转型升级的步伐。”

经济转型升级之外，集聚优势正为这座城市的产业竞争力提供双重引擎。南京是个新兴产业扎堆儿的地方，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披露一组数据，截止到2015年上半年，南京全市落实27个新兴产业基地的规划选址，形成软件谷、生物医药谷、智能电网谷、无线谷等“6谷”及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南京卫星应用产业园等“21园”。“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尽管市经信委主任谢志成如此概括“6谷21园”的发展格局，但它们其实在做同一件事：创新。

创新，正在成为南京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个看着抽象、实则更复杂的原理应该能借一种叫做“无氟组合聚醚”的创新产品讲个明白：因为固化时间从原来平均水平的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这种由高淳区红宝丽集团自主研发的、用于冰箱空调的隔热保温

材料“占领了全球大部分市场”。从此延展出去，《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写道，“2014年，工业新产品产值1335.11亿，增长15.2%；新产品产值率为10.1%，比上年提高0.9%，这意味着每100元工业总产值中，就有10元是新产品创造的。”这篇社论题为《创新，驱动南京经济转型升级》。

于是我们不得不重列一遍公式：科教资源富矿南京集聚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带来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催生创新产品，创新产品形成新产业，新产业促进经济升级——一连串的良好反应。

南京将自己经营成一座经济实验室，频繁尝试、快速迭代，她的探索正走得更远。

农业生产力：南京经济发射架

2015年10月16日开幕的第十一届南京农业嘉年华上，开启“逛吃”模式的游客兴奋不已，花博园、锦鲤园、农创园等11大板块人气爆棚，这里有20万斤生姜搭出的童话城堡、能根据果蔬颜色判断能否采摘的收获机器人和最远喷射25米、每小时喷洒面积60亩的农药自动喷雾机。

想知道嘉年华为何向来是南京城市名片，可以登录它的官网。只消瞟一眼首页，就能把南京农业的出挑之处看个十之八九：现代农业园区、休闲农业游、农民增收、农业新科技……都在链接关键词里。

农业地位不言自明。“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2015年已是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2次聚焦“三农”，而明确写出“‘经济强’要强在农业生产力”的南京，盯紧的是“新常态”和“农业基础”。

在“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南京搞农业，



必选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而现代农业园区则是最好载体。南京现代农业版图上有地方不得不提:溧水区的白马国家农业科技园。这个有30年蓝莓种植史、占据全国半壁蓝莓产业的地方,如今聚集着江苏省农科院、南农大、南林大等农创资源和15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以其为中心辐射出的“农业硅谷”正在形成。

南京制定“一谷四园”规划,以白马国家农业科技园为载体建设生物农业谷,浦口区建成一批休闲农业旅游园,六合区建成1个省级、5个市级农业园,江宁的六大农业园成为南京现代农业重镇,栖霞的农业园更是占到全区耕地面积的60%。截止2015年3月底,南京市级及以上28个现代农业示范园规划总面积84.1公顷,总产值95.65亿,南京市被农业部列入第三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而“生产要素集聚、经营机制创新、示范带动明显、综合效益良好”的南京经验也被贴上了农业部网站。

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罗格夫妇曾于青奥会期间访问的高淳区武家嘴热带风情谷,是“省内最缤纷热带植物园”,园区满种世界各地奇花异草,异域风情离不开现代科技农业,后者又离不开科创人才。南京鼓励

农林专家进村入园科技帮扶、在农业园区建设基地、产学研结合,农业科技两对接带来的是63.1%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32家高校院所组成的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和124个对接成果。

而智慧农业、互联网+农业正上线。筹建中的南京智慧农业中心将对全市农业实行大数据管理,“电子商务、连锁配送、农产品田头预冷加工、运输销售的冷链物流网络、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在路上”,市农委相关负责人对《南京日报》记者提到“南京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三年计划”,“物质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推广水平有效提升”,正是呼应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

企业发展活力: 南京经济燃料舱

2015年6月15日,南京国、地税局联合张贴出了2014年度纳税百强英雄榜,Top100企业共交税入库845.3亿元,对全市税收贡献占比过半,而较2014年度20.4%的纳税增幅超出全市平均线7.2个百分点,更突显出其对经济的强力拉动。

企业旺经济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当地经济发展的燃料舱,南京当然懂得

这个道理。于是这个城市的政府在燃料舱中灌入了强力助燃剂。2015年9月,南京出台《加快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若干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根据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政策扶持,鼓励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园区自主科技创新全链条建设。“我们希望通过创新创业政策的引导,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和加快发展的动力。”南京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闵一峰说。

政策颁布的背景是江北国家新区的获批。2015年6月,长于发展电子信息、高端设备、生命健康、节能环保、汽车的江北新区成为全国第13个、江苏首个国家级新区。以“育苗”为主要职能的南京高新区自建立以来,“亲手培养”的本土企业已达上千家,仍在孵化的企业有400家左右,其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科技园丁’,不是到处挖苗、移大树,而是低下头自己育苗。”刚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评为“2014年度优秀(A类)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南京高新区中国南京留学人员创业园主任郑斯彦如此分析。

“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重要力量”,“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经济日报》2014年9月19日的社论如是说。南京的智慧就在于“育苗”的耐心,不论是在全国率先试点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放科技创新券,为大学科技园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减免营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税,还是鼓励中小商贸企业法律服务中心挂牌,都在向企业彰显政府保护、扶植与服务的初心。

南京式努力已见成效。2015年10月20日,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放出消息,南京34家企业闯进首届江苏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200强”,他们将拿到意向最高1000万元人民币、利率上浮不超过10%的以信用为主的优惠信贷支持,优先享受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金融服务支持——引擎点火,推进器送入轨道,航向的是更遥远的未来。这就是可控又良性的科技与经济的裂变反应。

国企改革2015: 谨慎前行

国企改革目前仅仅画了一个逗号,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还是外部的监管机制,离改革目标都还有相当差距,仍需攻坚克难。

记者/邱锐

对中央和地方15万家国有企业以及其数千万职工来说,2015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国企改革总体方案落地。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外公布,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式开始。

这篇被媒体称为“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指导意见》主要包括: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等内容。按照《指导意见》设定的最终目标,到2020年,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将形成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不过,纵观2015年中国国企改革的各项进展,却不难发现,上述目标的实现仍然任重道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悲观地告诉《凤凰周刊》,新出台的改革方案诚意不足、老调重弹,仍然没有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封锁。相对乐观的人士则认为,国企改革目前仅

仅画了一个逗号,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还是外部的监管机制,离改革目标都还有相当差距,仍需攻坚克难。

或许,这正体现了中国改革的一贯规律:“蹄急而步稳”,在改革的方向上是坚定的,在改革的推进上是稳健的,基本上不会出现跨度较大的激进式变化。

国企改革动作颇多

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人事调动层面,2015年国企改革动作都颇多。据陆媒统计,上海、辽宁、湖南、天津等22省区市已出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意见》。河北、陕西的改革意见已审议通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看来,一系列政策全面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企改革思路。《指导意见》明确改革要坚持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均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对国企改革的要求。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

长管清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国企分类是《指导意见》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有助于各界厘清对不同类别国企职能的认知。“公益类国企未来应该不是完全市场化,甚至不是市场化的发展方向,而商业类应该完全市场化。”管清友认为,如果国企分类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向执行,未来的空间将非常大。

除了出台文件,新一轮国企改革也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付诸努力。部分国企掌门人和高管,因深厚的政治背景,早已在各自的领域形同独立王国,于政商两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条块分割之势。为此,2015年中共中央第一轮巡视派出了13个巡视组,历时两个多月时间,巡视26家央企,近20名高管被查。据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老虎级”国企“一把手”有9人“落马”。

大陆官媒2015年3月曾刊文称,相比较前几轮巡视,本轮正在进行的巡视中,把重点放在“为国企改革清障”上。巡视组除了找问题,还要对那些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深入剖析,并且为后续国企改革提供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倒逼改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此前在接受《凤凰周刊》采

访时则直言:“现阶段,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靠反腐败开路。央企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去反腐就不能创造一个改革环境。”

与市场预期差距较大

国企改革很大程度上源于环境的倒逼。15万家国企在2015年不仅没能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成绩单,甚至已经沦为拖累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2015年1-10月,国企利润降幅达9.8%,比1-9月8.2%的降幅扩大了1.6个百分点。在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企利润增速已是多月领跌。例如,1-8月,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0.3%和1.7%;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319.4亿元,同比增长了7.3%。

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明显受创,所以更加渴望大力度、激进式、全局化的改革。但上述国企改革的种种措施所展现的,却是一幅渐进式、中国化、试点型的改革图卷,这和市场预期存在较大差距。

许多业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以《指导意见》为主的一系列文件,或许并没有显示出

直面国企痼疾的勇气,对于许多重大问题都采取了一种暧昧态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如此向《凤凰周刊》形容:“文件中道理说的都正确,但没有告诉大家如何执行”。

2015年1月1日施行的《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被媒体解读为“限薪令”——实施后一般国企领导年薪不得超过60万元。但早在2014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曾暗示该政策落实的难度:“三中全会要求,国企、事业单位要去行政化,国企领导人要职业经理人化。薪酬如果按照职业经理人来说,现在国企的薪酬是偏低的,如果按照行政官员来说,他们是偏高的。我想这事儿挺难,我一边学三中全会,一边就挺为国资委发愁的,他们牵头,怎么搞?”

另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国企产权改革。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测算,2015-2024年,如果每年仅对代表国有部门产出5%的国企进行实质性的产权改革,可以使GDP增速平均每年提高0.33个百分点;如果加大改革力度,每年对代表国有部门产出10%的国企进行改革,就可以使GDP增速平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

产权改革一条重要路径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现有的国有企业逐步转向真正具有市场化机制的企业。9月23日印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该《意见》并没有给出一系列问题的



▲ 2015年11月9日,唐山友发钢管厂的一名工人走过库存。两会前后,一些国有钢铁企业深化国资改革的动作或意向屡有披露。

答案:混合所有制允许民营资本介入,指继续保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然后民营企业可以分一杯羹,还是彻底消除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否需要接受审计署审计?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的身份应当如何管理等。

《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的出台,还加剧了民营资本的担忧。优品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柳成杰表示,之所以说目前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进展有限,究其原因是一些国企本身害怕被扣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民间资本也担心被认为是“侵吞国有资产”。因而造成各方对混改疑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产权保护没有得到保障。

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早在1993年,国

家就提出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2004年起,开始在中央企业开展建立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但直到2014年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2家央企中,董事会试点企业也仅仅74家,尚有近50家未向公司制转变。

2015年,《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毅在发布的官方公告中也称,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如何处理党管干部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党的领导体现在治理结构里面到底指

的是什么?这内容并没有得到细化。”金碚说。

在金碚看来,改革方案的种种问题源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明确——国企的性质是什么?是一般企业还是特殊企业?“如果国有企业是普通的企业,那其唯一的目标就是盈利,改革的方式就是放开市场,政府少管,完全按照公司法来运作,国家没有必要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制度和政策安排。如果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那就要明确其特殊的方面以及应当发挥的特殊作用,权衡其一般性与特殊性。但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的理论认识还不很清晰。”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局长、新闻中心主任卢卫东也坦承:《指导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等都非常明确,但是涉及国企改革的定位、路径等方面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因此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高层驱动 中国IPO注册制乘风而来

已经超预期提速的注册制，看似是股灾反思的产物，实际上却是经济转型棋局中的重要一步。

记者/曹蓓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决定自2016年3月1日施行，期限为两年。

此前的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股票发行注册

制草案。

注册制虽然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提出，但一年来快节奏的推进，仍被视作是超预期的行为。舆论普遍认为，这与中国高层的共识密不可分，有学者称，与大多数改革不同，注册制可视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改革的动力，也早已超出了资本市场本身。

与目前实施的核准制不同，证券发行注册制度下，主管机构只负责审查发行人提供的信息和资料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而无需进行实质审核，即对公司的价值做出判断。

“注册制提速跟整个的社会环境有关系。”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凤凰周刊》

称，经济增速在放缓，在由重化工业向轻资产的新型产业转型过程中，无资产抵押，甚至无盈利的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而他们不发展，整个经济转型就难以推进。“注册制可以扩大股权融资的规模，让更多企业可以加快上市融资，对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帮助。”



注册制与核准制

以美国《联邦证券法》为代表的注册制,实质上是一种发行公司的财务公开制度。在这一制度下,证券发行申请人依法将与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信息和资料公开,制成法律文件,送交主管机构审查,主管机构只负责审查发行人提供的

信息和资料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发行注册的目的,是向投资者提供据以判断证券实质要件的形式资料,以便作出投资决策,证券注册并不能成为投资者免受损失的保护伞。如果公开方式适当,证券管理机构不得以发行证券价格或其他条件不公平,或发行者提出的公司前景不尽合理等理由而拒绝注册。

与中国目前实施的核准制最大的区别是,注册制只需要形式审查,至于发行人营业性质,发行人财力、素质及发展前景,发行数量与价格等实质条件均不作为发行审核要件。申报文件提交后,经过法定期间,主管机关若无异议,申请即自动生效。

而核准制则不仅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状况,审核机关还需要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进行实质审核,即对公司的价值和风险作出判断。

简单理解,一个业绩不好、前景不好或发行价格不合理的公司,在中国现行的核准制下,完成上市募集资金可能性几乎为零。而注册制实行后,只要其将与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信息和资料公开,制成法律文件,送交主管机构审查,且提交的信息和资料真实有效,那么理论上讲,这家公司就可以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核而完成上市。

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功能之一,股票发行制度上的变革对资本市场而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是资本市场能否顺利、高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

虽然此前已由监管层多次

提出,口径也由“研究推进”变为“加快推进”,但此次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仍被市场评价为超出预期。

股灾是催产针

两年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被当时的市场称为“提法新颖”,更多的人倾向于从长计议。此后也一直有传言称,管理层内部意见不一,导致注册制被数次搁置。但近期这一进程被提前,最直接的原因,与2015年中的股灾以及股灾后的追查与反思密不可分。

证监会称,在过去20余年里,股票市场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股票发行融资制度也经历了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不同发展阶段。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发展,核准制的缺陷和不足逐步显现,必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2015年7月的股灾就让这种缺陷和不足集中放大。

从5178.19点一路下滑至3373.54点,7月份的A股市场经历了罕见的过山车行情,最大跌幅达到34.85%。随后财政部、央行、国资委、证监会、公安部等多部委,联合中金公司、

“注册制可以扩大股权融资的规模,让更多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上市融资,对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帮助。”

券商、基金、上市公司等机构组成“国家队”,开始一场艰苦的救市战役。

股灾过后,金融领域刮起了落马风暴。

中信证券、国信证券多位高管被查,原因均为做空A股。国信证券总经理陈鸿桥自缢身亡,媒体分析原因时称“国信曾因做空被监管层约谈”。

8月,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刘书帆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随后,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以及被称为“发审皇帝”的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相继落马。

“目前的核准制是人为控制供给,导致资本市场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炒作、坐庄、造假、权力寻租等违规情况频发。”郭田勇说。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最终的结果会大到监管层难以承受。

此前,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曾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发行审核权力运行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会上称,该意见是证监会对发行审核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权力寻租和腐败风险的事项和环节进行全面梳理排查的基础上,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完善和改进措施。

这一意见的出台被业内解读为向注册制靠拢,监管层的解释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注册制加快出台的背景之一。

经济转型的一步棋

这仅仅是表面。作为金融的核心枢纽,资本市场的这一制度变革,显然有更深的社会背

景,影响显然也远超出资本市场的范围。

对于推出注册制的作用,证监会称,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各负其责的体系,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扩大资本市场包容性和覆盖面,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保护投资,便利融资,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多位专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由核准制向注册制,意义绝不仅仅在资本市场,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步棋。

“选在这个时点推出,跟社会的大环境有关系。”李迅雷称。

他指出,很多传统行业是重化工业,主要融资渠道是银行,因为有重资产可以向银行提供抵押物。但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更多的需要发展轻资产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没有更多资产可以抵押,有的企业甚至没有盈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们就难以发展,结果会直接导致经济转型难以推进。

“注册制可以扩大股权融资的规模,让更多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上市融资,对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帮助。”李迅雷表示。

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功能之一,股票发行制度上的变革对资本市场而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是资本市场能否顺利、高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

“转为注册制后,监管层只要保证提供给投资者的是真实情况即可。”郭田勇称,“这符合供给侧改革的思路。”

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提“供给侧改革”,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期在公开场合表示,之所以经济下行,原因是供给侧发生了问题,包括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也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改善供给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

等在门外的700+

证监会称,注册制正有序推进。

按照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授权决定后,国务院将根据授权,对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的公开发售,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股票公开发行核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具体事项作出相关制度安排。证监会将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制度安排,制定《股票公开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注册条件、注册机关、注册程序、审核要求、信息披露、中介机构职责以及相应的

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等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公布实施。

陆媒援引接近监管部门人士称,目前证监会和交易所层面有关注册制的规章和规则已经比较完备,法律授权问题一旦解决,即可公开征求意见。

虽然尚未有具体的时间表,但高层的态度和舆论的感染,足以令正在排队和准备排队的企业欣喜。

据媒体报道,2015年11月19日,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在公开场合提出,希望通过注册制的逐步推进,解决当前IPO排队难题。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日,中国证监会受理首发企业694家,其中,已过会58家,未过会636家。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616家,中止审查企业20家。

等待上市的企业绝不止这将近700家,“如果核准制改为注册制,会有更多的创新型企业有机会上市融资。”李迅雷说。

“中国式”注册制

注册制推行带来的IPO扩容,增加了市场对股市是否将迎来新一轮巨震的担忧,甚至有分析人士称,泄洪很可能导致另一场股灾。证监会对此表态称,对新股发行节奏和价格不会一下子放开,不会造成新股大规模扩容。

港媒把中国即将推出的注册制打上“中国特色”符号,按照监管释放的信号来看,不无道理。

第六届创业板发审委专职

委员卢雄鹰在发表文章中提到,“决定注册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过渡期里各项措施的变动方向和变动频率。如果过渡期各项措施的变动太大,超出了市场的承受能力,改革就有受挫的可能。所以,好的注册制改革方案,是对核准制的否定中有肯定,变化中有不变。”“注册制改革要契合国情。”

中国国情的背后,直接反映出现行体制下推行注册制的诸多困难和障碍。

李迅雷认为,对注册制最大的挑战将是发行定价如何放开。他指出,目前发行指导价是不超过24倍市盈率,但全市场市盈率的中位数(扣除经常性损益后)是135倍。这就可以解释目前绝大部分新股上市后的溢价都在3-5倍之间。相比之下,美国等成熟市场的市盈率水平,即便在牛市高涨之后,也只有17-20倍左右。而中国则是在如此高的估值下,既要维稳,又要改革,难度不可谓不大。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则称,除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还需要有监管、信息披露、退市以及相关法制完善等方面的配套,这些更为重要。

郭田勇则更多关注管理层对中介机构的监管。他认为,一切程序性的问题都不是难点,摆在监管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中介机构管理好。

“今后证监会的职能和监管重点要有所转移,应集中更多力量在市场稽查方面,一旦发现违规行为,能够及时发现、跟踪和处理。”

链接

经济新常态 必做到“十个更加注重”



解读

多行业破产重组潮将至

【本刊综合】据大陆官媒报道,中央正在酝酿重拳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将加快建立更为有效的退出机制,钢铁行业首当其冲,还包括电解铝、水泥、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全产业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破产重组潮,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调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9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4个“歼灭战”,其中包括产能过剩。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李克强也提出,争取用两年多时间,花更大力气对旧动能进行改造升级。接近官方的人士称,从整体布局上来看,“坚决淘汰一批,更多地改造、升级一批”是总体思路。“在过剩严重的行业,2016年将加快整合调整和兼并重组,集中力量做大一批大型企业。”中央的思路是尽量缩短改造升级的时间,让传统动能持续发挥效用,同时为新动能的发展赢取时间和空间。

去库存强化房地产支柱作用

【本刊综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会议明确,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化解房地产库存”被写入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中,房地产时隔两年再次被提到,会议以罕见的大篇幅对房地产去库存进行了论述。“住房”一词在2015年的会议公报中共出现7次,引起广泛关注,“去库存”成为热词。学者认为,去库存有助强化房地产支柱作用。但鼓励农民工购房要有一个过程,政策红利不可能马上被释放,去库存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农民工在城市能不能乐业是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另外,还牵涉到户籍改革、购房意愿等问题,农民工购房后,是否能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否与原有市民享受同样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不仅仅是购房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综合的考量。

焦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刊综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2016年中国经济部署及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落定。会议不仅在落实“十三五”规划部署、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做了部署,还就2016年政策取向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作出了安排。

会议对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基本背景作出了定调,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在此基础上,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亮相。有关学者认为,这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思路与以往有极大的差别,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中国经济未来的政策部署和考核指标都会发生改变。总体来看,强调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心思路。会议强调,要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具体的改革领域上,本次会议提出的国企改革、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和社保改革等四个方向,也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有望将具体经济发展任务和最近官方多次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在新常态共识下,会议在具体改革思路上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认为,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去库存

兴边富民 共赴小康

——红云红河集团兴边富民工程对口帮扶工作纪实

文/金兑

清凉的甘泉从井中喷薄而出,滋润了土地,也滋润了百姓心田;平坦的水泥路仿佛玉带通村连户,连接着希望和幸福,伸向远方……如今,云南省的贫困地区——临沧市镇康县、沧源县以及文山州富宁县,山变美了,水变清了,进村的公路变通畅了,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为帮扶这些地区脱贫致富,红云红河集团倾注了心力。自2005年起,红云红河集团用真情温暖着云南贫困老百姓,让上述曾经的贫困山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指示要求,红云红河集团自2005年起对口帮扶临沧市镇康县、文山州富宁县,从2009年起对口帮扶临沧市沧源县。按照三年一轮实施的帮扶,在2005—2013年三轮帮扶期内,集团向镇康县投入帮扶金3536万元,向富宁县投入帮扶金2400万元,向沧源县投入帮扶金1500万元。自2005年到2014年,含已实施完成的3轮帮扶计划,集团共向镇康县、富宁县、沧源县投入帮扶资金8036万元。

涓涓溪流汇成海,件件实事见真情。十年来,红云红河集团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自觉行动,将对口扶贫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与偏僻边远的云南山区结对帮扶的近十年时间里,红云红河人用颗颗爱心,滋润了山民们干涸的心灵,点燃了贫困群众思变求富的希望。

为富宁“造血”

富宁县曾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云南省启动“兴边富民工程”以来,红云红河集团作为全省扶贫工作的先

遣队,率先与富宁县结成了帮扶对子,并探索走出了一条符合富宁县情的路子:结合实际对特色产业重点扶持。在红云红河人看来,如何有效地加强“造血”功能,加快部分地区的脱贫速度,使老百姓看到脱贫致富的曙光,是对口帮扶的一项重要课题。

富宁资源丰富,适宜多种作物生长,但由于种种因素限制,群众增收渠道少、增收困难。红云红河集团实施对口帮扶后,摒弃“输血式”扶贫,集团领导多次深入当地调研,为群众增收找准路子、找好项目。通过实施产业项目,增强当地群众自力脱贫的造血机能,较好地解决群众增收难的问题。

以前,富宁县田蓬安良养牛场由于缺乏资金,始终处于小打小闹的境地。为扶持壮大养殖业,建好示范样板,红云红河集团决定注入资金对养牛场进行厩舍扩建改造和草场建设,培育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通过扶持,存栏牛从2005年54头发展至目前2000头,实现经济效益达50余万元。同时,通过该企业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周边村寨群众发展改良牦牛180多头,直接经济效益达40余万元。2010年,红云红河集团又投入资金,在归朝镇洞洋村建起了百亩甘蔗示范基地,基地里甘蔗长势良好。在洞洋村周边,随处可见种植甘蔗的群众,他们正忙碌着为甘蔗除草施肥,等待着丰收……

特色产业的发展,提升了项目区群众的致富信心,带动辐射了富宁的发展。2014年末,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6.6亿元,比“十一五”期末的33.7亿元增加32.9亿元,增长97.6%,提前完成“十二五”期末规划数66亿元的目标。

帮镇康“止渴”

“多亏有红云红河集团的帮助,饮水工程才得以顺利实施,不到一年时间,田坝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起红云红河集团资助的饮水工程,南伞镇田坝村王习宁感慨万分。他告诉记者,过去村子里用水要到两三公里外的山沟里挑,旱季大家还得排队打水。

镇康县隶属云南省临沧市,位于祖国西南边陲,南汀河下游和怒江下游南北水之间,西与缅甸果敢县接壤,受地理、环境、交通等因素制约,“边、山、少、穷”成了镇康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代名词。

田坝村人畜饮水工程是红云红河集团“兴边富民”工程行动中确定实施的首批帮扶项目。该工程已于2006年竣工,总投资100.22万元,架设主管道19.778公里,进户管道30.96公里,新建蓄水池7个,这让田坝村1600人和牲畜饮水难的问题得以解决。

镇康县勐堆乡村民彭木山感动地说:现在我们都用水窖水,水的质量也相当好,现在整个村子解决完了,不需要去远处挑水了,家家都有水窖水吃了。

“这些虽然看似只是一个小项目,又分布在各村各寨,但都是实实在在的帮扶。”镇康县发展和改革局的一位领导介绍,自2005年云南省实施“兴边富民工程”以来,红云红河集团按照“有组织、有资金、有项目、有计划、有协议、有落实”的扶贫管理模式,真心务实地挂钩帮扶镇康,开展扶贫扶困扶智工作,对镇康的发展倾情相助、真心帮扶,出巨资、出智谋,因地制宜地帮助镇康发展教育文化事



业、兴建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扶持新农村建设。

2015年，红云红河集团下拨到位帮扶资金200万元，镇康县已启动：木场乡黑马塘村大河边自然村人畜饮水项目和木场乡勐撒村新村自然村人畜饮水项目。项目实施完成后将可有效解决近227户1000人及80头大牲畜饮水困难问题，提高群众饮水的质量、改善卫生条件、减少疾病发生。

临沧前市委书记李国伟告诉记者，红云红河集团在“兴边富民工程”中，把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融合在一起，真心帮扶，真诚奉献，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促进了临沧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

为沧源“助学”

2014年春节，红河集团收到一封署名为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的感谢信。信中写道，“十年如一日，贵单位在沧源定点帮扶工作中，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真心诚意，真抓实干，不断创新帮扶形式，从下派干部到捐钱捐物，从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建设到新农村建设、文化产业开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县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和谐作出积极贡献。”

沧源，全国唯一佤族自治县，与缅甸佤邦毗邻。佤族是直接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著名的“摸你黑”狂欢节就起源于这个民族。这个地区孩子失学问题严重，县里的县长、科长们都直接挂钩到学校帮助解决学生的读书问题。

红云红河集团针对这些难点，制定了重点扶贫计划，采取“智力”扶贫思路，希

望小学与建设职教中心成为红云红河对口帮扶沧源县协议的重要内容。希望小学是解决孩子就学难的有效举措，而职教中心，一方面为初高中毕业的学生提供了就学的方向，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对边境县(市)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工作，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金融危机形势下，职教中心的建立为全国贫困边区如何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贫困边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途径。

2009年7月，红云红河集团正式对口帮扶沧源县，共投入600万元，主要用于职教中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爱心助学工程、希望小学建设、投保南滚河国家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伤害保险4个项目。

其中，2009-2010年两年期间对沧源对口帮扶建设项目资金400万元。协议共4个帮扶建设项目：协议期间投资160万元兴建两所希望小学，并配置相应的教学教具，逐步帮助改善地方办学条件；由红云红河集团投入资金200万元建设职教中心；投入资金20万元，主要资助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本科、专科)的品学兼优且家庭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本科生8000元/人，专科生6000元/人。

此外，红云红河烟草还援建县国门小学报告厅、县职业中学实训楼和单甲乡永武希望小学、芒卡镇马落红云红河希望小学、南腊民族小学的教学综合楼等；捐资助学助教，让96名学生圆了大学梦，组织教师培训550人次，为不断提升佤山群众整体素质奠定了基础。

付出总有回报。红云红河集团的努力

↑左图：沧源县国门小学报告厅落成。

中图：富宁县田蓬镇安良养牛场。

右图：镇康县勐堆乡大包包自然村建成投入使用的小水窖。

赢得了当地百姓的阵阵赞誉。沧源自治县教育局工程办陈永明激动地说：“五年来，红云红河集团给予我县教育教学工作很大支持，共捐资570万元助学助教，不仅帮助部分学校援建教学综合楼，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还资助佤山学子圆了大学梦，集中开展教师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扶贫长风舒画卷，春潮满目涌山村。十多年时间里，红云红河集团动真情、办实事、求实效，与云南边陲的贫困百姓们艰苦奋斗，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发展篇章。昔日一座座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如今正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迎头赶上新农村建设的脚步，在红云红河集团的帮扶带动下，变得更加漂亮、富裕、和谐。

2015年起，集团将进一步汇聚力量，按照云南中烟“报国有责、惠民有爱、树人有方”的企业使命，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建立健全集团扶贫攻坚“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定点挂钩扶贫工作长效机制，扎实开展“转作风走基层遍访贫困村贫困户”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全面完成省委省政府和云南中烟交付给集团的扶贫工作任务，为确保云南省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做出红云红河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击敌”，1944年，摄影记者阿纳塔莉·艾格罗夫（Anatoli Egorov）拍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苏联政府要求所有人都要拿起武器为保卫“苏维埃母亲”而战，新闻摄影也绝不例外。这张照片描绘了硝烟四起的战场上，苏军下士Stepan Vasiljevich Ovcharenko在车上用机关枪扫射敌军。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师艾格罗夫在二战的战斗中负伤，也成为了英雄。

苏联往事

封闭时期的苏联往事，如亚马逊丛林深处的神秘传说一般，时时挑动世人的好奇心。这片庞大而寒冷的土地，既缺乏自由的表达，也少见艺术的活力，政府机器凌驾于所有个体之上，当代史料中常见的苏联文化，包括摄影、戏剧、电影和文艺演出，看起来总是一副刻板无情的冷面孔。

不过苏联体制在它存在的数十年间并非一成不变，铁幕曾经历过开启和关闭，硬土也曾遇见松动和萌发。管制严厉的特殊环境中，文化也曾有过高涨的革新冲动、暗地里的触碰突破。

当以“看见生活，看见世界”为创立宗旨的美国著名新闻摄影杂志《生活》(Life)在西方世界畅销时，苏联也拥有过一本重要杂志，名为《苏联摄影》(Soviet Photo)。这本杂志记录了从1926年到1997年间的摄影作品。莫斯科卢米埃尔兄弟摄影中心(The Lumiere Brothers Center)曾经举办了一个摄影回顾展，展出了很多这本杂志的照片。

这些摄影反映了苏联几十年的摄影进程，堪称苏联的摄影编年史。苏联的优秀摄影家们留下了比外界想象的更加多样且富有不同创造力的作品。其中一些摄影师堪称苏联的艺术先锋，他们的摄影作品展现了前卫和实验精神。

早期的苏联摄影作品中，摄影师们的革命热情尚未完全褪去，倾尽才华促进民众对政府理解。苏联政府甚至鼓励不同寻常乃至激进的艺术形式，因为他们认为这可以作为政治巨变的一个象征。“照相机就像枪一样，是阶级斗争中一个重要的武器。”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彼时也这样宣称。那时苏联的文盲率达到70%，插画和海报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在艺术上的观点才变得保守。经历过二三十年代的活跃氛围后，文艺的铁幕渐渐收紧。

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画意派是苏联当时主要的摄影流派。有摄影评论称，现代主义的活跃摄影家在艺术形式上是革新的激进派。但当时，现代主义不受苏联当局待见，

被批判形式大于内容,不符合无产阶级品味。一起被批的还有画意摄影派,因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没什么用。现实主义则最令当局欢迎,它能描绘出令人满意的社会形象,反映意识形态。

日后的苏联摄影愈发受到不断变化的政局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局甚至会干预照片的内容和构图。卢米埃尔兄弟摄影中心的策展人亚娜·伊斯卡科娃(Yana Iskakova)说,最开始规定的摄影主题是死亡和苦难,以加深人们对恶劣敌人的憎恶感;后来战争接近胜利时,《苏联摄影》杂志中就出现了更多抒情和诗意的战争图片。

到了1950年代,摄影师们被禁止从高于建筑二层的地点拍摄,摄影展的策划人娜塔莉亚·波诺玛尤娃(Natalia Ponomaryova)回忆当时莫斯科摄影爱好者的境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莫斯科拍照,经常会有苏联政府的人找到摄影师,将他们的底片曝光或者直接没收相机。摄影师只能偷偷透过汽车车窗拍摄”。总之,一切被苏联政府认为有损苏维埃形象的照片都被去除,摄影活动变得愈发困难。

其实苏联摄影师一直在夹缝中尝试新奇的方式。从1920年代开始,当时成立的左翼艺术同盟“十月”就倡导前卫派的摄影,尽管政府并不喜欢他们。策展人伊斯卡科娃说,他们既不激进,也不是很理性地看待苏联人民的生活,这为苏联所不容,这个组织最终不得不解散。到了1980年代,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摄影师又开始创作概念的、抽象的和图形的摄影作品。

现在这些历史图片可以重回世间,让人们有机会镜鉴当下,想一想生活车轮如何碾过,又将走向何处。(曾鼎)



“洗澡中的无家可归者”,1927年,阿卡迪·夏科特(Arkady Shaikhet)拍摄。这张照片属于苏联早期纪录片风格的摄影作品:孩子面容肮脏,在同样肮脏的环境中洗澡,一副勉强配合的模样。照片似乎展示了那个苏共新政权鼓吹自信和理想的时代社会角落里被忽视的一面。摄影师夏科特日后声名显著,1917年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才19岁。在军队中服役归来后,夏科特于1927年创办《苏联摄影》杂志,即此组摄影作品日后刊登的平台。

“开始”，1959年，摄影师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夫 (Vladimir Stepanov) 拍摄。1950年代后期，斯捷潘诺夫开始拍摄“开始”系列摄影。这张照片展示了一款新生产的相机。经历过二三十年代的活跃氛围后，苏联文艺的铁幕渐渐收紧。摄影工业除却二战后自德国运回的大量原材料生产出一些好东西外，其后每况愈下。到了1990年代，苏联制造的胶卷极其简陋，甚至没有塑料包装筒。斯捷潘诺夫说，他第一次拍照片是在1957年。当时年仅17岁的他正在少先队小组学习摄影，虽然相机很便宜，但是他却拍出了自己想要的照片。



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格鲁吉亚的一个集体农庄共进午餐，1963年，摄影师瓦西里·艾格罗夫 (Vasily Egorov) 定格下这一瞬间。当时，一度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刚过去半年，卡斯特罗在苏联全境旅行了38天之久，在当时外国领导人访苏中实为罕见。这次外交对话得到苏联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宣传。赫鲁晓夫颁发给卡斯特罗金星列宁勋章，以热情的语言歌颂卡斯特罗，“普罗米修斯把永恒之火传给了人类。你，为了自由而战的勇士，把十月革命的圣火传到了西半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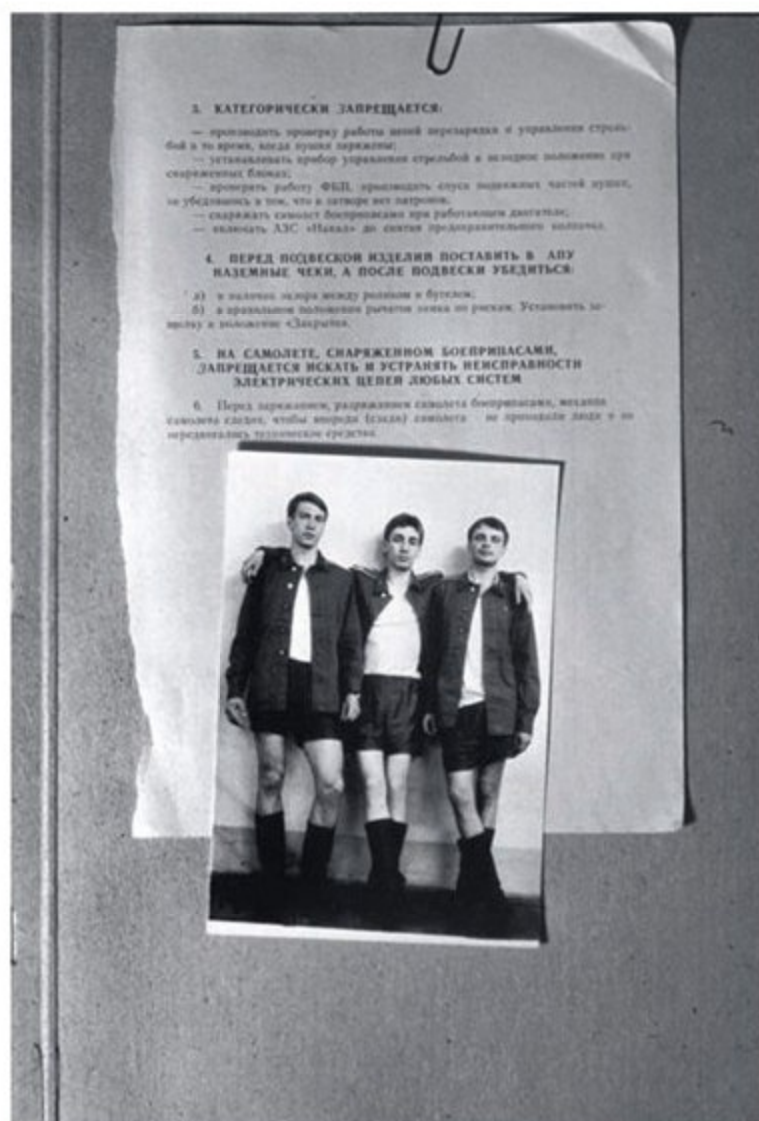




“第12号交响曲”，这张照片代表了当时苏联人物摄影风格的转变：此前，苏联的人物摄影基本是摆拍，而这张照片由摄影师塔拉瑟维奇在作曲家演出间隙休息时，偷偷抓拍。1961年，摄影师伍瑟沃罗德·塔拉瑟维奇（Vsevolod Tarasevich）拍摄。被拍摄的人物是苏联著名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留在苏联，却是当时少数名气能传至西方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苏共政权中获誉颇丰，但也曾因为与斯大林主义冲突而遭谴责，他的作品也一度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被苏联政府禁止演出。第12号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加入苏共后，为纪念列宁及十月革命而创作的乐曲，政治宣传味道浓厚。它被称作是其所有交响曲中最不受市场欢迎的作品，过往除了在作品全集中被灌录外，鲜见单独的录音制作。



“莫斯科大剧院荧幕背后”，1983年，弗拉基米尔·维特金(Vladimir Vytkin)拍摄。维特金多次担任过荷赛奖评委，他曾尖锐批评一些荷赛奖获奖者：许多摄影冒险家几乎没接受过什么专业摄影指导，仅仅依靠简单的自动对焦，抓下痛苦瞬间。他们的镜头就像是一位毛躁的菜鸟外科医生手中冰冷无情的手术刀，生生切入尚在流血的人类痛楚和苦难之中。



“军队日记”，1989年，瓦迪姆·古斯切(Vadim Gushchin)拍摄。其出生于1963年的古斯切，1988年开始从事摄影艺术创作。他的职业生涯初期正好赶上苏共执政末期，古斯切后期的摄影善于赋予原本卑微的物件深刻的意义与强大的情感共鸣。“军队日记”以相关文字和文件为背景，结合军人照片作为一个整体拍摄，他说这种处理方式“不将他们刻意表现为英雄，而在于展示从事一项工作的普通小伙子”。



“青春年少”，1937年，鲍里斯·伊格纳托维奇(Boris Ignatovich)拍摄。当时的苏联政府强调摄影的“社会主义”，但又要求摄影不要止于描绘现实，而要展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这张充满阳光和活力的青年男女照片展现了摄影师的态度。伊格纳托维奇是一位苏联摄影大师，他生于1899年，卒于1976年，被认为是苏联先锋派摄影代表人物之一。伊格纳托维奇曾为左翼艺术同盟“十月”摄影协会的核心人物，他的照片在那个时代甚为出彩，其创新视角让作品变得独特，常被誉作“摄影散文”。

1933年，参加长城战役的29军将士，正高举大刀展现军威。29军继承了冯玉祥西北军的传统，大量配发大刀用以近战，实际上是解决刺刀匮乏的临时手段，因为刺刀的制造工艺比大刀复杂。



抗日大刀队神话背后 宋哲元集团夹缝求生记

文 / 王敬

五百名大刀队袒臂冲锋，爬登长城。敌素轻视中国军队不足一击，忽遇此非常硬汉五百，措手不及，千余日军，悉被砍杀……”。

放在今天，这样的场面一定会被读者视作“抗战神剧”，嗤之以鼻。但在1930年代的北平，当市民从报上读到这些消息时，为大刀队的战绩如痴如狂，将大刀视为对付

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法宝，威力远胜大炮和机枪。

这段传说在今天仍未消散，卢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着几柄大刀，不时有游客拍照留念。走在市内的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上，还能听到街边的老人拿“大刀队砍得日本人戴上铁脖套”作为谈资。只是，大刀队背后的宋哲元第29军集团及其在华

北的兴衰过程，已经在有意忽视和无意遗忘之中，变得模糊不清了。

抗战神器或义和团老把戏？

宋哲元集团在平津市民中的亮相，极为精彩。1933年3月13日，各大报刊载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的通电，声称：

“日军连日以步炮空及钢甲车联合向

我喜峰口宋部阵地大举进击。宋(哲元)部大刀队初伏壕不动,后故佯退,同时调动佟(泽光)、赵(登禹)两旅分左右两翼抄袭。敌人不察深入,大刀队突起砍杀,奋勇直前,激战三昼夜,双方层层包围。此时敌人机炮均失效用,而我方士卒,咸抱必死决心,白刃相接。敌军初犹顽抗,继被砍杀过半,慌遽求饶,其两个旅团正缴械中。喜峰口经此血战,敌几告肃清”。

日军入侵热河以来,东北军溃败、承德弃守、长城各关口告急,噩耗接连不断。突然有了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市民顿时沸腾。几天后的报纸上,登载了第29军缴获日本坦克的照片,虽然样子近似纸糊的花车,仍然被市民视作大捷的证据。

悲观情绪弥漫时最需要英雄,大刀队的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个空缺,顿时成为华北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军长宋哲元、师长张自忠、旅长赵登禹等人也因此暴得大名。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共有13个军,但各地捐赠的款项和物资,纷纷指名涌向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第29军。

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们千里迢迢赶赴北平劳军,特别指名要去喜峰口的第29军,还举着大刀拍了照。指挥长城抗战的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对这一套很有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她们好像只知道喜峰口的神秘大刀队,不知道其他各口的部队,同样在那里做壮烈的牺牲,而不去慰劳。”

战后,黄绍竑见到《申报》的老板史量才,问他:“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吗?”史量才回答:“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许多年后,第32军副官长唐永良揭破了另一个秘密,所谓第29军“俘获”的坦克是为了让士兵认识日军装备而用木头、纸板搭成的,正是他本人“出于一时的游戏”拍了照片投给报纸。

大刀队没有守住喜峰口,也拦不住日军冲向平津,长城战役最后以签订《塘沽协议》告终。但平津市民不相信中国人的大刀敌不过日本人的机枪,自发帮宋哲元分析

原因:日军打不过大刀队,于是从伪满皇帝溥仪的警卫军中抽调精谙单刀的官兵赴长城作战,以灵活的单刀压制大刀队的长柄刀“双手带”,才让大刀队陷入劣势,坏事的还是中国人自己。这套说法,当然是中国传统评书人对现代战争的凭空想象。

即使在第29军自己的内部记录中,大刀队冲锋的伤亡也十分惨重。3月9日争夺喜峰口东北侧长城最高山顶的白刃战斗,击毙日军百余人,自身伤亡四百余人。3月12日大夜袭,赵登禹亲自带领的一团砍死日军五六百人,自身伤亡也达六百余人。而日军战史中记载同样战斗的自身伤亡,更是寥寥。

此后,大刀成了宋哲元第29军的标志,官兵人手一把,行军、出操蔚为壮观。1935年第29军入主平津之后,站岗、巡逻的大刀队也成为北平城中一景。每当与日军发生冲突对峙,林立的大刀队都被市民围观赞叹。第29军设宴招待日军的时候,旅长李致远看到日本军官席间舞刀,“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劈了一趟滚堂刀回敬。”

宋哲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刀队仍然是媒体关注的对象。《世界日报》报道“日军二百余名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被斩首者占三分之一”。《申报》称“津日军医院百三十余床位,均为日负伤将士住满……日军官负伤三十余名,内以受二十九军大刀队割掉臂部者为多”。远在上海的作曲家麦新新闻创作了《大刀进行曲》,众所周知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后的歌词,最初版本便是“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只是,大刀终于没能保住平津。7月28日,日军突袭南苑第29军营房,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战死,官兵伤亡2000余人,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第29军从平郊的拒马河一线退到冀中的滹沱河一线、再到冀南的漳河一线,400公里的退却只用了不到3个月。

一股新生力量的崛起

大刀队背后的宋哲元集团,脱胎于冯玉祥西北军。北洋政府时代,冯玉祥所部号称中央陆军,却因没有固定地盘,十几年间游击全国,常常落魄如丧家之犬。宋哲元在民国元年便追随冯玉祥,是其“五虎上将”之一,备尝颠沛之苦,深知地盘与财源的重要。

1924年,冯玉祥得到苏联援助,在绥远五原率部誓师参加北伐,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并称四巨头。他不甘居蒋之下,更不愿接受战后军队编遣处理,于1930年会同汪精卫、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蒋,发起中原大战,最后以失败告终。

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西北军,自此崩溃。退入山西南部的西北军各路残军,经后起之秀张自忠奔走联络,被入关助蒋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收编为第29军。撤退中几成光杆司令的宋哲元,因德高望重、资历深厚被推举为军长。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各掌一师,秦德纯、萧振瀛等为幕僚佐贰,就此形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

宋哲元、张自忠们将官兵视为最重要

的资源,即使缺衣少食、弹药寥寥,也要坚持每天野外训练6个小时、课堂教育4个小时。冬天煤柴不足,就拉到操场上跑圈取暖。对军队中下级军官更是关怀备至,在军饷有限的情况下开源节流,冬天发皮袄,夏天发布料,为子女开办学校,竭力维持团体士气。正因如此,第29军官兵的团结精神与战斗能力,在杂牌部队中名列前茅,成为宋哲元集团发展壮大的基石。

1930年代的华北,不甘失败的冯玉祥及其旧部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冲突不断。但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取得共识,不愿再随老长官瞎折腾,一贯秉持中立态度,决不轻易表态。1931年7月,西北军旧部石友三发动叛乱,先是自浦口炮击南京,继而调头袭击张学良所部。冯玉祥、石友三接连致电宋哲元,要求他念及“西北同僚”之情,出兵娘子关、石家庄以掩护后方。但宋哲元不为所动,石友三终于被蒋、张讨平。

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之后,冯玉祥到张家口发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收复失地为名进攻伪军占领的多伦、康保等地。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处理此事极其艰难——坚决抗日是民族大义、人心所向,但打不过日军是血淋淋的现实,一旦引来日军再度入侵,好不容易保全的北平、天津势必沦陷,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国民政府迅速调集部队逼近张家口,又不敢贸然开火镇压。

局势让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更加尴尬。他真刀真枪和日军打过,明白停战来之不易,视冯玉祥的举措为纸屋里玩火,不愿意随他一同孟浪。但他也不能与冯玉祥为敌。第29军以互相扶助、延续团体为号召凝聚,宋本人常以忠孝仁义的传统道德教导官兵。如果对老长官用兵,对内

会丧失约束部下的道义制高点,对外也没法向韩复榘、孙连仲等西北军袍泽交待,第29军势必分崩离析,他本人也将因不忠不义身败名裂。

因此,宋哲元对冯玉祥说客的答复是“我不打先生(指冯玉祥),但是也不跟着他胡闹”。以不变应万变,是明智与无奈之间的唯一选择。宋也并非坐观成败,而是积极周旋于若干势力之间。当年并肩反蒋的庞炳勋被指定为进攻张家口的先锋后,宋便派冯治安、秦德纯去威胁,“如果真的要打,那么,我们就要对不起大哥(指庞炳勋)了!”。

中立持重的态度几次为宋哲元博取最大利益。石友三叛乱之后,蒋介石、张学良感谢宋哲元的表态,任命他为察哈尔省主席,使第29军终于有了地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以内讧加剧、冯玉祥通电下野结束后,宋哲元又成了最大的赢家,不仅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收回了察哈尔的地盘,还收编了大批流散的同盟军部队,弥补了长城

抗战的损失,进一步壮大了部队实力。

“成”也日本,“败”也日本

在大刀队神话渲染下,宋哲元集团坚决抗战做先锋的形象,从上世纪30年代便深入人心。但日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将宋哲元与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绥远傅作义并列为可以被策动、运用的地方势力,甚至将宋哲元视为重点谋略对象。

喜峰口战斗期间,日军天津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便与宋哲元有所接触。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机密作战日记记载,板垣“就宋哲元在北平发动问题,经数次周密商议,双方成立协定……他响应(四月)二十一日夜北平的政变,立即率全军向北平前进,阻止中央军脱离北平”,“宋哲元若实行此举,华北形势必将为之一变”。

所谓“北平的政变”,是指板垣驱使失意军阀张敬尧等人意图扰乱中国军队后方的行动。张敬尧在六国饭店被国民政府特工处决后,板垣仍然宣称“宋哲元决心进行反蒋军事行动,先撤退至遵化、石门镇间集结兵力,然后策应日军对古北口方面的攻击,推进到中央军的背后”。

第29军并未如约行动。日方记录究竟是宋哲元的戏弄敷衍,还是板垣的自以为是,已经难以细究。但宋哲元与日本方面的关系,随着时局的发展继续走近。

1935年5月,日本方面借口亲日的《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在天津日本租界被杀,以及孙永勤部抗日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划定的非武装区事件,压迫国民政府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免职,将中央军、东北军撤出华北。

同月,宋哲元也因扣押日本特务的“张北事件”,被免去



大刀队的真实装备情况是,大刀需要配合驳壳枪使用,这类部队战时作为突击力量使用。



“七七事变”前夕，守卫在卢沟桥上、永定河畔的29军战士。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著名的宣传照片之一。

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所部撤退到平绥铁路沿线，一时间不知所往。6月底，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汉奸白坚武率部丰台镇暴动，驾驶铁甲列车开到永定门外炮轰长安街。第29军在萧振瀛等人奔走下得到北平军分会认可，迅速入城接防以稳定局势。

蒋介石认为宋哲元“尚明大义”，视之为

有此基础，宋哲元集团自然水涨船高。几个月间，宋哲元由平津卫戍司令而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化解日本发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决定成立具有相当程度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被任命为委员长，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萧振瀛等相继接任河

媒体宠儿大刀和大刀队终究没能保住平津，七七事变以来，第29军10万余人从平郊的拒马河一线退到冀中的滹沱河一线、再到冀南的漳河一线，400公里的退却只用了不到3个月。

中央力量退出后，能在华北与日本抗衡、为抗战准备争取时间的关键角色。日本方面则认为宋哲元是可以利用的对象。日本驻北平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称，“他们（指宋哲元及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等人）在不欢迎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制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与日本军部驻外机关的利害也是一致的”，只是“对公然叛变却持消极、慎重的态度”。

北、察哈尔省主席和北平、天津市长，全面掌握华北军政大权。

宋哲元、张自忠们在华北一方面截留税收、扩充军队，仅仅两年，第29军就发展到了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5个独立旅和大批直属部队近10万之众。另一方面在交通、航空、煤矿等领域抛出了一系列“中日合作开发”计划，还在冀察政委会内聘请日本顾

问、吸收亲日分子担任委员。时人评论，华北只知有冀察政委会，不知有南京国民政府，在宋哲元的意识里，“三民主义还不如三国演义”。

其实，三国演义的核心是“汉贼不两立”，宋哲元也确实重视名声气节，以苦心孤诣、维持主权自居。对使用亲日分子，他解释是“这些人生活没办法，穷极生变，就会捣乱。我姓宋的不敢想当孟尝君，只希望这些人能生活下去，无形中也是替他（指蒋介石）减少麻烦”。在对日交涉方面，则以“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但“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为原则。

不接受又不谢绝，如此矛盾的原则，只能靠敷衍糊弄实现。宋哲元对付日本人时常由部下出面应付，自己退居幕后避免冲突。萧振瀛是宋哲元办理对日交涉的主要助手，专门以开空头支票的方式应对日本人事关主权的要求。到了无法兑现时，萧振瀛辞职出国一走了之，宋哲元则以“这是萧某人答应的，宋某人不能代为负责”为理由继续推脱。

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专田盛寿则认为，宋哲元是“对蒋对日都做出笑脸，谁也不得罪”，专以维持其在华北的利益。这样的心态难免对时局变化感觉麻木，对任何事件都趋于应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后，宋哲元在蒋介石一再要求他到保定指挥抗战的情况下，依然返回天津试图与日方和谈，丝毫没有意识两年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终于导致平津沦陷。张自忠也因为形势判断错误，留在北平试图与日方继续谈判而身负汉奸骂名。

宋哲元也在此期间耗尽了精神，虽然先后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但没有继续带兵，而是退居四川绵阳养病，于1940年4月病逝。一个月后，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牺牲于湖北宜城。在此之前，曾经显赫一时的宋哲元集团已经分裂，不再是统一的整体了。⑥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黄静



朝鲜和东德的隐秘友谊

朝鲜战争结束后，除苏联和中国援助朝鲜重建外，诸多东欧国家也施予援手。东德向朝鲜派遣了450多名技术人员，含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工程师等，同时大量朝鲜青年去东德留学。当时26岁的吕布克，为咸兴市安装自来水管系统，回国后一直保持与朝鲜朋友的联络，直至他逃往西德后才中断。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翻开相

册说：“当时的咸兴市就是这样的，我们从零开始。这是我们为朝鲜建造的第一家大商厦，这是为建筑工地运送物资的队伍，你看他们用的是牛车。”

不少朝鲜留学生与东德姑娘相爱并生下孩子。1961年柏林墙建立前夕，加速闭关的朝鲜从东德一夜之间撤回所有朝鲜公民，包括350名大学生，很多人都来不及与德国爱人和孩子告别。德国姑娘

德国女士雷娜特·洪捧着当年与朝鲜丈夫及孩子的合影。

雷娜特·洪是跨国恋中的一员，丈夫洪奥全回朝鲜时，他们已有了第一个儿子，她有5个月的二胎身孕。德国姑娘们去外交部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产生了外交纠纷。时至今日，这些年迈的德国妇女依然想念一去不回的恋人，多年后有人带着孩子获准来到朝鲜成功探亲。2005年，韩国导演宋亨町把这段悲喜往事拍成了纪录片《相爱、相恋、失去伴侣》。

伪满维护山海关“国境线”



伪满政权建立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依然在山海关保有不在条约之上的领地，这现象源自“庚子之乱”后各国在天津至山海关沿线上的驻军，有驻军就有属于自己的地盘。“边境”划分上，伪满与各列强同样存在矛盾。1937年的一个夜晚，法国人在长城外200米处打下12根界桩，欲扩大占领地。当地伪满警署上报新京，得指示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以强制收回土地。

伪满为尽量减少国际纠纷，把带队的法

国军官骗来开会以作为人质，全副武装的伪满警察在日军支持下开赴现场。每根界桩边站立一名警察，等待统一拔桩的命令。法军则在长城上架起枪炮，伪满自然也不甘示弱地做好射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不出所料，碍于首脑在对方手中，法军终究不敢先行开火。法国军官被释放回去时，12根界桩已经被伪满方面拔起并扛走，双方未开火。一场“边境”闹剧悄然收场，12名拔桩的伪警察都受到了奖赏。

纳粹改写《灰姑娘》童话

德国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全面控制了全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内政部在1934年12月颁布草案，规定每一堂课开始的时候，全班起立，老师站在全班前举起右手高喊“嗨，希特勒！”全班接着举右手回敬“嗨，希特勒！”



学校的所有教科书都充斥着纳粹的理念，生物课让学生分辨雅利安人的生理特征；地理课强调德国需要广阔的生存空间；数学课上会有这样的提问：一个家庭必须要有几个孩子才能确保德意志民族的血统得以延续？国家养活所有残障人士的开支可供多少对新婚夫妇的借贷？

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框架下，连童话都无处可躲，灰姑娘故事被应景改编

成第三帝国独有的版本。灰姑娘和她的生母都具有纯正德意志血统，灰姑娘不幸摊上了一个异族的狠心继母。性格善良、意志坚定的德意志姑娘，在异族坏女人的压迫下坚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位血统纯正的德意志王子，于人群中一眼看见她后，凭借他在种族主义上的敏锐直觉，受到了“血的呼喊”的召唤，便拯救了灰姑娘，亦收获爱情。

该照片约摄于1934年，在教室后墙上，悬挂着纳粹德国总统兴登堡和总理希特勒的照片。

乌龙！日军用刺刀捅死己方记者

提及1937年年底的南京保卫战，大陆的文史作品多半会重复一个感人的小故事。12月10日，粤军156师为消灭躲在射击死角——光华门洞里的一小队日军，用缆绳将敢死队吊下城墙，以众击寡剿灭掉这部分日军后，剩余中国军人怀必死之心冲向日军战线，无人返回。

事实上，中国敢死队并未消灭城门洞里的全部日军。个别日军躲在角落里幸存下来，其中就有《福冈日日新闻》记者比山冈雄。为避免伤亡，残存者们不再向城墙上的中国军队射击，他们默默等到了日军大部队在12月12日攻破光华门的一刻。等候多时的比山冈雄，从尸体堆里爬起来欢迎自己人，孰料被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日军士兵用刺刀捅死。不乏有战地记者死于己方炮火和地雷，但比山冈雄这种死法是独一无二的。12月18日下午，日本陆军和海军在南京联合举行战死日军的“慰灵祭”，祭奠对象包括了上海登陆以来阵亡的随军记者和摄影师，比山冈雄就在此列中。

战俘营里的失恋者

“抱歉，已经和你父亲结婚了”，落款则是“母亲”。一个在德国战俘营里的英军中士收到了恋人寄来的短信，戏剧性的结局让所有狱友们大笑不停。受国际条约的保护，二战期间盟军战俘（除了苏联）大体能正常收到国内来信，但战争时期世事难料，信中常有不好的消息。

女友或妻子的拒绝信，是最伤人感情的，不过也难怪女方，长久的分离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考验。接到此类爱情噩耗的战俘们，很容易出现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为此，英军内部形成一种习俗，大家把这类信件钉在战俘营的公告板上，就起到群体疗法的效果，大

1942年8月，突袭法国北部的港口迪耶普失败后，一队英军战俘在德军看押下列队经过迪耶普市的街道，他们即将进入战俘营。这次失败的两栖作战，为两年后的诺曼底登陆积累了无可替代的珍贵经验。



家一起分享受伤者的痛苦。

美军把这类信件称之为“亲爱的约翰”；英国空军则称其为“美索”，这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简称，控制该地的英国空军长驻了5年，直接导致了不低的离婚率。独特

的战俘营文化，构成了军队文化的一部分。整场二战中，几千名在欧洲的盟军战俘通过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专门办公室，与千里之外的妻子签署了离婚协议，这也是一种独特而真实的二战体验。

□ 文 陈祥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黄静



导演徐皓峰： 用电影还原真实的武林

记者 / 刘荣

《师父》导演徐皓峰为演员演示招式。

三年时间，导演徐皓峰誉满江湖。这一天，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小时后是《师父》电影座谈会，他一边飞快地给新书《坐看重围》签名，一边竖起耳朵听我提问，已顾不得吃饭。

“白发怎么又多了？”我问，上次见面是《一代宗师》上映后，徐皓峰华发初生，彼时，他说满打满算，只剩20年黄金时间搞创作，要分秒必争。今日，他顺势幽了一默，“白发说明血热，我还是少年。”说着把茶杯往我面前客气地一让，手势干净利落，像练家子。

人：文武徐皓峰

徐皓峰习武。坊间传说，某次饭局后，他和一个习武的朋友抢着埋单，双方都下意识地把手探到对方腋下。又传，一山东哥们儿找他认同门师兄弟，他伸手就摸那人小腿，练没练过形意门功夫，要先验小腿肌

肉。更有神乎其神的，说他气功护体，五层楼跳下，没事。对这些传说，他神秘一笑，不置可否。

他的武脉，靠文脉来接。他曾闭门八年写作，前后出过十本书，都在武术、武德、武林和武行上用力，包括《大日坛城》《道士下山》《武士会》和电影《师父》的短篇原著，皆为故事好看，人物饱满，儒、释、道兼收。他还参办过一本杂志，最后一期的主题叫《最后的妖精》。于是作家圈子里的格非嘀咕说，“这人怎么什么都懂？”

十年前，他刚出版《逝去的武林》，武术界笑话他，你当真练过吗？后来，他给王家卫《一代宗师》当武术指导，打得连大武指袁和平都叫好，还连拍三部武行电影《箭士柳白猿》《倭寇的踪迹》《师父》。也许是成败论英雄，后来，江湖认他了。形意门收徒弟，师父们先拿他写的《逝去的武林》当

见面礼。

2015年12月10日，我在电影院看完《师父》最后一个镜头，听见身后的一对情侣说，听说打戏都是导演干的，他威武，长得像“魔鬼肌肉男”。我看了看眼前的徐皓峰，他实在与想象相去甚远——发福，圆鼻头，皮肤滑润，眼睛笑成一条缝，过于慈祥——他是好友眼中宠辱不惊的南极仙翁、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心目中的大神。

徐皓峰懂电影，乃电影学院导演系科班出身。毕业8年后，老师请他重归母校，教授大课《试听语言》。他写的一本武术电影影评《刀与星辰》也颇受好评。身份种种，作家、导演、武术指导都是他，但每次上课，还得老老实实应学生的一声呼唤“徐皓峰老师”。至于那帮被大师徐克、胡金铨们熏陶得无比挑剔的学生，搜集了他上课的百条金句，发上网络，引为美谈。

道：刀背藏儒道

八年前的正月，我首次采访徐皓峰，他带来了一本书《逝去的武林》。

书里带出了一个清末民国初年的武林，这基于他为《武魂》杂志数年如一日的采写整理。这个武林里，囊括了京津冀一带有史可考的传人们，包括八卦掌、形意门、太极等诸多门派，他们有规矩，有传承，有故事。其中，他的二姥爷李仲轩就是这部口述史的活见证。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徐皓峰惊动了白岩松、崔永元等传媒大咖。这事儿的直接影响是，徐皓峰生生把已成模式十几年的港台武侠电影，逼成了“想象中的武侠”，而他自己另辟了一条“硬派武术”电影之路。

交谈中，徐皓峰好用手势。他在我面前比划出一个阴阳太极鱼般的“圆弧”，好似一切矛盾都是合理存在的，天然圆融。“武林人有了，那什么是武道？”他笑眯眯地看着你，笑容里没有侵犯性。这个潜心钻研传统冷兵器，能让刀、枪、箭成为自己电影焦点的男人，告诉你——武道的核心是“止戈为武”。

溯源到大院子弟徐皓峰的少年生涯。生于1973年的他，初习武艺是在15岁，“当时，老北京世风开始变痞。”那时候，李连杰的《少林寺》已经有了，《上海滩》的引入带来了黑帮情结。记忆里，一代年轻人的青春期荷尔蒙无处释放，于是学校里分帮结派，打群架。徐皓峰也被人唤过“大哥大”。对此，他另有看法，“文革武斗，把世情变得粗鄙无礼”，他眼中的小马哥，却是个盗亦有道、受过文明洗礼的绅士。徐皓峰喜欢老北京文化“有理有面儿”，于是，移情

到海派黑帮身上，觉得那是“儒”的精神。

所以，他不混江湖，跟着二姥爷李仲轩学武术。李仲轩也是个奇人，得了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的真传。34岁突然从武林退隐，晚年在西单一家电器商场看门。

李仲轩的隐，是“道”的精神。徐皓峰少年时代与另一位道教宗师胡海牙的接触，同样影响至大。毕业十年，徐皓峰也迷茫落魄过。人事磨炼，他修出了坐看“山河大地，万古星辰”的一颗闲心。他在《刀与星辰》中写到，“道家比儒家高明，儒家谈善恶，道家谈自然”。还索性出版了一本《道士下山》，露出说教的职业病，“道心原本宽广，可容万物”、“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道心宽广，故东西文化也可相容。徐皓峰津津乐道一个太极拳传人的故事——一个71岁的中俄混血儿！真东西为何教了洋人？他自问自答，儒家也是这个道理，“有教无类。”

在电影《一代宗师》里，他用叶问的大半生，问了武人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执着，越会为人所夺？”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咏春的交手口诀，更是人事规律。

庄子要“齐物”，说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而儒家求进取，也似武人的一生，被他放进了刀的意象里。刀背之下，可藏武人之身。他反复思考自己关起门来读过的金庸与梁羽生、庄子与孔孟。于是在《一代宗师》里，东北漫天大雪，宫家大弟子马三正要反出师门，宫老爷子出来替徐皓峰说话，武道与儒、道有什么关联呢？“刀有鞘，不是为了杀，是为了藏。”

术：武行电影课

《一代宗师》上映后，徐皓峰已趋不惑之年，武行电影三部曲正在陆续酝酿出品中。

大得声名，影响了他多少？“他是个有七分，只说三分的人。”他的朋友、编剧史航，在微信语音里给我留言说，徐皓峰并未改变初衷。

徐皓峰愿意说出来的“三分”，指的是中国武术电影的当下去留和推陈出新，到了箭在弦上的关头。

从《逝去的武林》开始，回望近代武术的源流，武术从生活走向戏曲，再走向书籍和电影，一百年已经过去。鼎盛多年的武侠电影正在衰落和转型期，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片，在整体上已走向末路。港式的“飞天”和“炫技”手法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挑剔的受众，更在制作手段上远远输给好莱坞。

相比前两部低成本电影《箭士柳白猿》和《倭寇的踪迹》，《师父》是徐皓峰为武术电影“说话”的一次实践。它遵照了商业片制作模式，104分钟时长，有情感段落，有武术场面，廖凡、宋佳、蒋雯丽、金士杰，演员阵容颇为可观。

死守自己的“三分”，徐皓峰就有了风格。“我是用真实的武打，在电影里还原真实的武林和武行。”他在电影《师父》和电影笔记《坐看重围》里，变回了那个“徐皓峰老师”。

不论对方是影帝还是武替，他一拳一脚亲身传授，而且要求演员真打，连淑女蒋雯丽都在《师父》里动了手。此前，张震拍



《一代宗师》，武术特训一年，成了半个高手。而廖凡在徐皓峰特训下，用两个月就出现了武者气象。“你可以打咏春了。”徐皓峰通知他。

史航读过徐皓峰所有的出版物后，评价他那没说出口的“七分”，“他想让你们看到，传统中国人是怎么做人的。武行人的分寸感在哪儿。”这做人的分寸感，包括规矩，对武道尊严，都来自徐皓峰对武林与武行的理解。

徐皓峰的小说和电影往往是对位关系。比如电影《一代宗师》和小说《武士道》。王家卫用三年时间遍访民间武林人士，发现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清朝灭亡后的1912年，北方的武林人士企图建立中国武士道，统一

北方武林，企图成为社会名流，以改变社会的性质，核心机构就叫中华武士会。于是，徐皓峰在《一代宗师》的剧本里说了个故事，中华武士会的第三代人何去何从？他们和南方的叶问有交集，叶问也延续了中华武士道的精神。而小说《武士会》是电影的前传，写的是中华武士会的第一代人。

后来，徐皓峰又用三部武行电影想要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行业有尊严，人以自己的职业为荣。要表现真正中国人的境界，职业必须成为载体。而所谓武行，必须以城市为基础，不同于民间的游侠和匪帮，是有固定职业生活的人，比如武馆、镖局。《一代宗师》中的大师群像，《师父》中的武行底层生态，都脱离不了这个真实的行业载体。

“我会写出具体行业的人际关系和运作规则。”他写武行和武林，小到规矩，大到阶层的命运，都在社会大环境里。他看到了近代一百年的战乱，如何促成又消解了武行这一阶层。“他们企图改变国民性，可惜只传了三代。”

徐皓峰在电影里还想上另一课——传统文化的去留。“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都在否定传统文化，中医被人瞧不起，武术是中国人保留传统的最后底线。”他在《一代宗师》里，用“天地、众生、自我”标注了武人和武术的三个境界。即使在探究人性复杂面的《师父》一片里，也给武德留了个余地。对规矩死不撒手的天津武行人士，最终想起了自己的武道和“士”风，放走了陈识，咏春拳最终得以南传。❶

《师父》道出了民国武行的规矩

文 / 徐皓峰

“武林”的概念始于1920年，由民国的小说家“发明”，指身份地位较高的武术家组成的江湖。当时的武术大师如同明星，受到颇高礼遇。而后来梨园行里的武打演员则被称为“武行”，武生谭鑫培和杨小楼为其中翘楚。

普遍来说，港台编排武术电影的思路、组织动作的方式都直接承袭于谭和杨。比如早期武侠导演胡金铨，他不会武功，却是个明史专家、戏曲票友，武术来自生活，而戏曲即生活的演绎。在执导过程中，胡金铨更像一个武术顾问，提供招式，负责编排，但具体怎么打由武术指导来负责。

《师父》与以往的武侠电影的不同，不仅在于没有“飞天”等炫技手法，而是“硬碰硬”的功夫，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些社会学思考，道出了民国武行的规矩。规矩是用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因此它一定是保守的，不是选优机制，而是保证在无序竞争中不动摇行业底线。清朝末年，我们吃够了规矩的苦，新人难以出头，大家都在想如何更快地出头，比如，到日本

留学一年，或许能成为某个领域的领袖。而清朝覆亡之后，我们又受够了没有规矩的苦。可见，规矩有利亦有弊。

《师父》讲的是规矩的变异，清末民初，北洋政府瓦解，军阀割据，社会结构被武力改变，从一个社会群体丰富的社会，变成了相对单一的官民和军民社会。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叶问的经历，当时的香港，有很多大陆去的名门大派，脱下军装教授武术，像咏春这样的小派很难出头。叶问找了一个黄数，本来想培养他三年，没想到他学了一年就开始踢馆。这也是以前的规矩，传统社会没有说踢馆可以直接和馆长打的。

影片主角陈识不是叶问的师父，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这个名字和军旅作家沉石有关，他是做纪实文学的，我在1997年毕业后，一度生活得很茫然，2000年底遇见他，他支持我做了一段时间的话剧。这次拍电影，“师父”用这个名字，是感谢他最初像师长一样帮助我。叶问和陈识两个名字，也是一组对应关系，“问”是询问和

探寻，而“识”是识别和知道。

之所以将故事安排在天津，源于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全国上下都在想办法改变国民性，北洋军阀提倡的一项举措是扶持武行人士开武馆，让国人强身健体，企图以武术重塑国民性。民国时期的武林以京津冀为中心，而天津又是北洋政府的财政中心，铸币厂等重要机构都在天津，故而，河北、山西等地的高手都被吸引过去，武林与武行人士作为一个阶层出现。

然而，这个过程是短暂的，随着战争频发、军阀割据，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持续，武行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打破。到了1949年前后，武术家基本上都在军队或政府里兼职，武行阶层彻底消失。那些战后幸存的武行人士，如果对蒋介石失望，就没有跟去台湾，但是以前杀过共产党人或者当过汉奸的，畏惧新中国，基本都去了香港办武馆，这才有了叶问的故事。❷

（采访整理/记者 刘荣）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中日恶性互动的前车之鉴

回望百余年的中日关系史，历次恶性互动都酿成战争灾难或局部冲突，双方应牢记前车之鉴，警惕日本极右翼势力的挑逗，从而引起双方过激的民族主义反应。

文 /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是百年来中国绕不开的话题，也是百年来数代中国人面临的大难题。今日，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较量角力，出现了诸多恶性互动，只有从历史视野考察，才有可能对这一问题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

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具有复杂的两重性。一方面，一百多年来，日本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两次中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留下了深重的苦难记忆。虽然战争结束已经70年，但中国人对中日战争的痛苦记忆仍然存在，对日本人有一种长期的不信任感，有时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宛如“惊弓之鸟”。这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应激性的民族主义反应，已经扎根为民族生存经验中的潜意识。这种应激性民族主义，只有经历过深重战争灾难的民族，才会特别强烈而持久。一般情况下，这种潜意识处于隐性状态，但一旦有特别的刺激，就会被重新激活，它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逐渐消解。

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教育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比如，对日本的介绍沿袭了过去的很多看法，造成国人对现代日本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甚至把过去的刻板印象继承了下来。

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受惠于日本现代化的成果，中国近百年来的改革家与革命家都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与赞助。中国人对日本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就由衷钦佩，比起英美等国，日本作为东方民族，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是充满兴趣的，日益增多的旅日游

客，对日本国民的教育水准与文明素质之高，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因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的情景与环境下，中日关系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

中日关系的可能趋势

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教育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比如，对日本的介绍沿袭了过去的很多看法，造成国人对现代日本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甚至把过去的刻板印象继承了下来。以前，我们只泛泛知道日本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教科书在日本各中学的采用率，只占日本全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千分之几，而现行的绝大部分教科书都并不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情况，甚至大多数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都未必了然，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

正如前文所说，一方面，我们对日本长期不了解，对它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潜伏于心；另一方面，又对其现代化建设成果很是

钦佩，这种二元态度就造成了中日关系完全有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向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一种方向是，随着两国交往加深，通过良性互动和相互了解，历史上形成的疑虑逐渐化解，双方在良性互动中走向和平友好的新时代——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争取的。

另一种方向是，由于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或者日本某些右翼人士主导的突发事件，把中国人内心深处潜在的对日本的疑虑与不安全感重新激活，形成了应激性的紧张反应，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向激进与亢奋。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天生对外部环境有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在这种不安全感的支配下，日本大众可能转而形成对右翼势力的支持。于是，日本民族主义与中国应激性民族主义之间，就会形成恶性的互动，如果矛盾不能化解，就有可能从双方的高度不信任走向冲突，甚至经由持续冲突走向战争。

这种双方的恶性互动趋势，在上世纪30年代就出现过。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可能性再次出现。中日关系将向何处去？当下正处于关键时刻。

近30年来发展回顾

为了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回顾一下中日关系的恶性互动趋势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很有必要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关系相对稳定，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到华访问。日本青年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许多人临别时还流下眼泪。当时日本与中国对彼此的观感都相对良好，从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双方对对方的好感率均高达80%以上。日本右翼是极少数，没有多少影响力。日本和平宪法的基础也很牢固。

90年代以后，虽然由于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影响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但随着中日经济与文化交往的不断加深，两国



↑ 2014年12月13日，南京，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关系还是稳定地向良性发展。

在2005年到2012年中期，双方关系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虽然安倍是日本右派，但2006年他作为日本首相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那次访问被称为“破冰之旅”；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访问日本，被称为“融冰之旅”；此后，日本的新任首相福田在同年又对中国进行访问，被称之为“迎春之旅”。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日关系都表现得相对友好而平稳。虽然彼此有分歧，但都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民间街头自发的反日游行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

然而，风云突变，2012年下半年，日本右翼人士引发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是双方关系从良性互动转向恶性互动的转折点。其实，右翼势力在日本的实际影响，远不如国人原先想象的那样大，它与日本和平主义的主流价值观相比，只是处于边缘状态。右翼人士的宣传车在东京市区呼啸而过，但并没有多少市民对它感兴趣。

七八年前，我去日本旅游也有过直接的感受。在参观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时，放

映厅里，日本右翼人士拍摄的纪录片中，出现日本军队在南京入城时的镜头，偌大的剧院里，只出现几声稀疏无力的掌声，给人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靖国神社外面的广场上，却是成千上万日本青年男女在纵情享受阳光。我当时就有强烈的感觉，日本右翼势力真是如同汪洋中的孤舟。

恶性互动如何形成

在日本，许多学者都指出，右翼势力在日本社会并没有多大影响力，然而，却在最近几年起到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强大作用。这是因为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的失落感与焦虑感，使他们终于找到了中日关系中的一个“软肋”，并且作出了超常发挥，从而改变了中日关系的走向。

石原利用其作为东京都知事的权力地位，提出了由东京收购钓鱼岛的计划。不幸的是，这又进一步引起了野田佳彦内阁错误的处理，野田从“土地权所有者”手中将

钓鱼岛“国有化”。他似乎想用“政府购岛”这样的举动，让钓鱼岛继续荒废，从而减轻该问题对中国的敏感性。但是中国人却倾向于认为，两者是一种“唱双簧”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可以说，正是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引发了中日关系的“蝴蝶效应”。

日本右翼的极端态度，激发了中国人的强烈不安全感，沉重的不幸历史记忆由此而被重新激活，中国进入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应激期。2012年，中国国内街头民族主义运动，在许多大中城市出现。这一应激性反应在网络上及部分中国人的行动中表现得相当激烈。有人提出“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反日游行抗议中砸日本车致使司机重伤等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一年多以后的2013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将钓鱼岛包括在内，中国政府对日本不得不表现出强硬的态度。

日本方面对中国反日游行中的某些过火行动的不满，对中国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不满，再加上此前朝鲜导弹飞越日本领土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出于不安全感与逆反心理，转向对右翼政策表示支持，右翼势力得到民粹支持而变本加厉。从历史上看，日本右翼一旦有了民粹基础，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互动过程中就会形成膨胀的势头。2014年2月，东京选举中极右翼大胜，从前一年的30万票上升到60万票。这一成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中国人觉得，右翼与民间力量的结合，是日本右翼势力进一步崛起的信号。中国反应性的民族主义也因此水涨船高。中国2015年9月进行抗战胜利日的大阅兵。日本方面对此作出回应，国会轻松顺利地通过了“新安保法”，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是自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以来的30多年间，历届日本首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这样一种恶性互动已经在形成。

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有人说，“中国与日本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流血了。”一旦流血，百年来的旧仇新恨，不知

要哪年哪月才能再消解。

在中国,有些“名嘴”不负责地说,中国可以“在半小时里把日本灭掉”;在日本,也有人说,他们的核废料也足以造两千枚核弹头。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这样的“硬硬互动”,使擦枪走火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让人们不由得回忆起历史上双方互动的历史阴影。

两次惨痛的前车之鉴

从历史上看,中日双方的恶性互动是有前车之鉴的。重温这段历史,对两国人民都十分重要。

甲午战争后不久,中日曾出现过双方关系向好的局面,中国的变法人士与革命派都不断得到日本方面善意的支持,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东北避免成为俄国殖民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死伤达数十万人,仅战死就达10万人,耗费了20亿日元。由于各种原因,战后日本并没有取得中国的东北作为殖民地。1905年以后的十年里,中国向日本学习达到高潮。

然而,这样的良好关系,却由于少数日本右翼势力而发生逆转。1915年的日本右翼

贷款博得中国方面的好感,但两国之间的恶化过程不幸已经形成。

受“二十一条”的刺激,1928年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强烈的民族主义“革命外交”政策作为回应,在自身国力尚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外长王正廷高调提出,要在短期内单方面地取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的各种东北权益(例如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中国民间也出现对日本商人的过火行动。北伐军进入南京时,也有少数军人对日本侨民有杀害行为,这又引起日本民间的仇华心理。于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军国主义者与民族沙文主义者,得到了日本民众的支持而如虎添翼地嚣张起来。这一恶性互动趋势,是“九一八”事件的深层原因,此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得寸进尺,而中国民族主义则不断强化对抗,直至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

可以说,在中国和日本已经有了两次恶性互动的经历后,我们有必要考虑内部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就是双方的高度误解以及双方的高度不安全感。中国作为一个受害国,对日本是高度敏感的,而日本岛国的孤独状态,也使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对外部

日本方面应该看到,要防止右翼人士通过挑战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来刺激中国的不安全感,从而激起应激性反应。中国对日本的高度敏感是历史上形成的,只有在比较漫长的时间里才会脱敏,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极端右翼人士有可能利用中日关系上的“软肋”。虽然极右翼势力是少数,但这个边缘化的政治势力,却往往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他们有可能借助日本人的岛国不安全感,成为“蝴蝶效应”的起点,而这种“蝴蝶效应”所产生的后果,却要由两国人民来共同承担,所以应该要警惕这种力量。

而中国人也应该看到,日本战后70年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和高科技,满足本国各方面的需要,战争扩张主义已经失去了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对战争痛苦理解与体验最深的民族之一,日本民族性格的变化之大,恐怕只有13世纪的蒙古民族接受黄教后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与之相比。

日本和平主义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这种和平主义是随着与中国人一起抵制日本极右翼保守势力而兴起的,如果两国人民在良性互动中加深理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很小。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我们不怕日本右翼分子兴风作浪,但也不必杯弓蛇影,有人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不管怎么说,中国与日本就在一条船上,船上存放着汽油,有极少数人就是要让汽油着火。一旦着火,将成为船上所有人的共同灾难,在彼此相邻的船舱里生活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更是首当其冲。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人,阻止这样的人破坏难得的幸福与安宁。正如无数历史所告诫的,如果我们不能从中获得警示,人类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日本和平主义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这种和平主义是随着与中国人一起抵制极右翼保守势力而兴起的,如果两国人民在良性互动中加深理解,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很小。

内阁向袁世凯政府秘密递交“二十一条”要求,逼迫中国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极为苛刻的条件,以此来逼迫中国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作出“补偿”。当时连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也惊呼,日本直接把中国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中国作为弱国,不得不接受了其中大部分条款。从此以后,中国人对日本产生极大的警觉,抵制日货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强大,“二十一条”也成为几代中国人无法挥去的痛楚与屈辱。此后上台的日本文官政府中的温和派,也曾为缓和这一局势作出各种努力,其中包括以优惠的西原

世界具有高度敏感。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发动的事件,激起了中国反应性民族主义,日本中间民众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引起他们对右翼势力的进一步支持,从而使双方的恶性互动得以形成。

警惕“蝴蝶效应”

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走向健康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完全有希望的。要避免中日关系陷入恶性的互动,双方都应该努力,也需要两个民族共同发挥自己的智慧。

“世界秩序”的基辛格之道

世界秩序的危机，要么来自权力的分布状态发生变化，要么是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重建世界秩序成为当下最重大的时代议题。

文 / 孙兴杰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新作《世界秩序》，自出版以来备受瞩目，尤其是中国知识界、政治界和媒体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与讨论。2015年底，基辛格参加北京“京城国际论坛”纵论世界秩序的图景，虽然他声称并不知道未来世界的样子，却提醒观众，“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秩序，但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秩序，来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否则，国家间的冲突可能会摧毁人类所有文明。”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深谙世界历史又饱经外交风云的智者的箴言甚至谏语。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可怕的是，“世界秩序”的驾驶舱中居然空无一人，门口倒是几个船长在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如果你对未来迷惑不解，那就回头看看历史吧，寻找世界秩序演变的来龙去脉，这也是基辛格的独门秘诀。

武力征服不能带来秩序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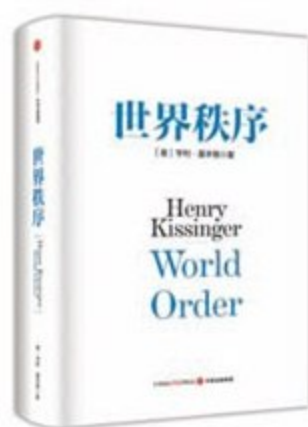
如今，“世界秩序”已经变成公共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新闻媒体中频频出现，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都愿意为世界秩序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恰恰说明，现在的世界秩序出了问题，很多国家和民众对现状不太满意，就像基辛格所推崇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说的，“武力征服不能带来秩序的合法性”。

久经外交考验的基辛格，也为当下的政治家提出了一项高难度任务：“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失败的后果不一定是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排除这种

可能），更可能的是，演变成特定的国内结构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种种势力范围。”每一种势力范围都可能要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这与当下全球化的格局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恰恰是全球化带来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让历史上已存在的世界秩序议题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这也是当下国际关系面临的根本性悖论。

在欧洲人还没有崛起并统治世界之前，世界是非常多元的。1648年当欧洲人打完了“三十年战争”签订和约的时候，东方的清帝国根本就没有关注此事，而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还没有衰落。国际关系史的教科书，总是从“三十年战争”开始写起，但是相比于混乱的欧洲，当时更受期待的是一种帝国秩序。

甚至可以说，几千年来，帝国一直是主流的政治秩序。煌煌帝国与普世宗教的结



《世界秩序》

亨利·基辛格（美）著
胡利平译
中信出版社



合，塑造了一种可以自我解释甚至自我圆满的“世界秩序”。东亚地区比较流行的是朝贡体系，是一种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中国是这个秩序的中心；而伊斯兰世界则存在着伊斯兰之地和战争之地的区分，圣战变成了一种维护秩序的手段，神权高于一切。

世界秩序的多元性是一种常态，直到最近的100年里，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帝国，以一种强制性、压迫性的力量，暂时终结了世界秩序的多样性。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他者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单一性，美国独步全球的格局出现裂痕，在这些裂缝中，曾经作为复数出现的“世界秩序”在复苏。

这也是近代以来又一次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基辛格显然意识到了这次“未有之变局”的本质，他说，“当今时代，探寻世界新秩序需要我们首先了解那些基本不为外界所知的社会。所有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克服这种神秘感——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正因如此，未来世界秩序是各种局部秩序发生化学反应之后的结果。

均势秩序对帝国秩序的胜利

世界秩序并不一定覆盖地理空间上的全世界，但是为什么复数的世界秩序变成了单数呢？基辛格说道，“我撰写本书时，以上所有秩序概念中，唯有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础。”审视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就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的世界秩序成为全球性秩序的基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的世界

秩序是一种“均势秩序”，而这一领域恰恰是基辛格所熟稔并推崇的。

从他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就专注于欧洲均势的“黄金时代”——维也纳体系，再到后来的《大外交》《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等，都体现了基辛格对均势秩序的偏爱。而他在1970年代叩开中国大门，并非仅仅要跟中国做朋友，而是要重塑世界的均势格局，因为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强劲，而美国陷入越战泥潭。果不其然，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中、美、苏三边互动，改变了美国的被动局面。

从本质而言，欧洲的均势秩序是对帝国秩序的一种反叛，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可以独占那块叫作“欧洲”的地方。查理五世失败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失败了，拿破仑也没有成功，随着这些有帝王之心的枭雄相继失败，欧洲的均势秩序的范围不断扩大，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的冷战，让均势变成了全球化。也正因如此，基辛格得以将19世纪的智慧用于20世纪。

如他所言，“17世纪巧妙地缔造了威斯特伐利亚式和平的谈判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一个全球适用的体系奠定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和平是建立在世俗王权的基础之上，也就是王权战胜了神权，从此之后，宗教不再是引发欧洲战争的主要原因。世俗国家的胜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每个国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战争或外交，每个国家都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干涉他国内政或者“灭国”不再受欢迎，拿破仑几乎将欧洲大陆收入囊中，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国家又复活了。

恐惧与不安全感是欧洲体系内在的特质，一个大国获得绝对安全，就意味着另一个大国绝对的不安全。因此，均势体系并不能阻止战争，但是可以限制战争的规模，尤其是框定了战争的目标，即恢复均势。维也纳会议之所以受到基辛格的推崇，就在于战胜国没有将法国排挤出战后安排之外，只是让法国收缩到“自然边界”之内。

有限制的战争，以及频繁的结盟都是维持均势的条件，而得到各方基本的认可是

均势合法性的来源。如果结盟体系走向僵化，或者彼此已经不再认可权力安排的合法性，那均势就会慢慢瓦解，一战之前，欧洲形成了越来越僵化的同盟体系，大国对小国盟友做出了清晰的承诺，最终因为一场危机，各个大国如“梦游一般”掉入战争之中，欧洲的明灯熄灭了。

不可否认，均势体系内在的竞争性使欧洲保持了活力，分立的列国体制没有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琼斯就认为，欧洲是一个技术共同体，也促成了欧洲工业革命的传播。借着一流的军事技术，欧洲人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化了。这不仅是欧洲国家的胜利，更是欧洲均势秩序对各式帝国秩序的胜利。最终，世界秩序的含义简化了，即非欧洲地区是如何一步步接受了这一套世界秩序规则的。

均势秩序的基础是世俗化

世界秩序的危机，要么来自权力的分布状态发生变化，要么是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当下的世界在这两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因此，重建世界秩序就变成了当下最重大的时代议题。

从权力分布而言，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已经成为趋势，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结束时那样，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并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秩序合法性的流失，体现在美国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在中东地区出现了“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势力，对现代主权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态的合法性提出了直接挑战。均势秩序的基础是世俗化，这一基石在中东地区一直没有奠定。

要建立新秩序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也许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梅特涅、卡斯尔雷，当然也包括基辛格。世界如此纷扰，人心躁动，而基辛格在世界历史的沉潜中，提出了值得每一个人倾听的金玉良言。◎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书屋

《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

凯利·E·克拉格(美)等著 季我努译
重庆出版社

丛书(第一辑)

共四册，分别为《地狱航船》《不义之财》《太阳旗下的地狱》《樟宜战俘营：1942-1945》，分别讲述了日军用船只运送战俘充当奴隶劳工、日本财阀使用战俘和平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日军逼迫战俘修建缅甸铁路和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虐囚等罪行。



《褚时健传》

周桦著
中信出版社



这是唯一经传主授权的一部《褚时健传》。褚时健的人生几经起落：早年丧父，辍学、烤烟、种地，以此帮母亲谋生；青年，重新求学却遭遇战争，扛过枪、打过仗；解放后没能逃脱“右派”的命运，却能埋头搞生产；年过半百，接手玉溪卷烟厂，然而巅峰跌落，陷入牢狱……

《大国志》

严明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摄影家严明的随笔集，也是一本精美的摄影作品集。全书追溯了作者从事摄影艺术的源头，点明了摄影的关键要义，同时对大国上下古典浪漫的消逝和文明的流失发出了无限感慨。

《看中国》

马国川著
中信出版社



作者对18位国际重头人物的采访合集，其中既有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莫德罗等世界知名政治家，也有科斯、科尔奈、青木昌彦等经济学大师，还有福山、尤努斯等著名思想家，他们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